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任 方赛妹

副主任 杨应棉 邓爱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方赛妹 邓爱霞 刘伟炬

刘明禄 杜国辉 张 山

陈童敏 杨应棉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主 编 邓爱霞

副主编 张 山 陈童敏

编辑部

主任 张 山

副主任 余 伟 陈童敏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 99 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2001xb@126. com

gdsy_xbbjb@gd. gov. cn

出版日期：2025 年 7 月 28 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5.00 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重要理念及实践——以《习近平在福建》为主要蓝本 潘宏纹 (0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发10周年学习研究征文选刊**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妈祖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粤东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杜元兰 (11)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浅析习近平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 文福贵 (1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三重逻辑 郭毅铭 (2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应急管理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提升 王妍 (27)
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以蔡廷锴的政治实践为微观考察 卢观铤 (31)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独特价值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丰皮影戏为例 许康杰 (35)
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以宗教团体内部规范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为切入点 任志强 (42)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研究

- 新时代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实践规律与创新路径研究 吴茂金 (47)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地方政府对台交流合作中“XX·台湾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兼论建立“梅州·台湾周”的可能性与发展路径 张应雄 (53)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论《共产党宣言》中的大统战思想及其法理意涵 陈 灊 (59)
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朱振辉, 朱宗友 (66)
社会主义学院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研究 李际卫 (73)

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秀波 (79)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 人民政协的历史溯源与新时代启示 常庆林 (85)

中华文化研究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文化认同研究 常 静 (91)
文化自觉视域下统一战线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 杨 宁 (96)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潮州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研究 肖 錄, 陈驰欣, 黄秀芝, 林润锋, 蔡润东, 罗兰帆 (101)

一家之言

-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探究 陈英杰 (107)

Main Content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n the Management of Folk Beliefs: Based on "Xi Jinping in Fujian" as the Main Blueprint	Pan Hongwen (05)
Research on the Cult of Mazu and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View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Eastern Guangdong	Du Yuanlan (11)
A Probe into Xi Jinping'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Wen Fugui (16)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o Yiming (22)
Advantages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ang Yan (27)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 Micro Study of Cai Tingkai's Political Practice	Lu Guanting (31)
Research on the Unique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 Taking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uhfeng Puppet Show as an Example	Xu Kangjie (35)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Legaliz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Governance in China: Taking the Linkage between Internal Norm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Laws as the Starting	Ren Zhiqiang (42)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Laws and Innovation Path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Private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New Era	Wu Maojin (47)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XX · Taiwan Week" Model in Local Government Cross–Strait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On the Possi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Establishing "Meizhou · Taiwan Week"	Zhang Yingxiong (53)
On the idea of the great United front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its legal connotation	Chen Can (59)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Mechanism of the New Era United Fro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Zhu Zhenhui, Zhu Zongyou (66)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socialist colleges in adhering to,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 Jiwei (73)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Xiubo (79)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e New Era.....	Chang Qinglin (85)
Research on cultural ident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asting a solid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Chang Jing (91)
The excav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united fron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Yang Ning (96)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aozho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Combination".....	Xiao Ting, Chen Chixin, Huang Xiuzhi, Lin Runfeng, Cai Rundong, Luo Lanfan (101)
Exploring the New Changes in Capitalist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Chen Yingjie (10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 工作的重要理念及实践

——以《习近平在福建》为主要蓝本

潘宏纹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 民间信仰集“教”“俗”“巫”于一体, 是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 也是我国宗教格局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 立足国情、地情、民情、侨情, 积极推动地方民间信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开展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 做法成效创全国之先, 为后续国家启动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地方考察中就民间信仰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新时代做好党的宗教工作, 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指航定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工作的重要理念及实践,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习近平; 民间信仰; 管理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05-06

民间信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即有“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的记载。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 我国古代先民创造了繁杂的巫鬼神灵体系, 其中, 尤其以行业神、民族神、节庆神等为典型。民间信仰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衍生了独特的“志怪”体小说形式, 在现代社会呈现“非遗性”特征。民间信仰集“教”“俗”“巫”于一体, 是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 具有场所数量多、信众规模大、个体差异突出、神仙谱系庞杂、历史年代久远等特点。上世纪 90 年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 立足国情、地情、民情、侨情, 带领干部群众转观念, 抓重点, 建机制, 围绕民间信仰该不该管、先从哪里管、今后由谁管、管了如何用等理论实践问题, 推动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 做法成效创全国之先, 为后续国家启动民间信仰管理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部署宗教工作, 并就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新时代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指航定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重要理念与实践,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丰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但目前, 学界对此鲜有述及, 相关成果也极为稀少, 值得引起关注。

一、解思想之惑: 做出民间信仰管理亟待加强的科学判断

虽然民间信仰是我国先民古老的宗教形式, 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底, 但从民间信仰的演进

收稿日期: 2025-05-30

作者简介: 潘宏纹 (1982-) 女, 汉族, 黑龙江佳木斯人,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宗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宗教学理论与政策、基层宗教治理。

变化进路看，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发展，民间信仰在组织上被吸纳，在地位上被边缘化，自我主体性减弱，逐步游离在政府监管之外。

夏商周时期，这是我国原始宗教（也可以说是民间信仰的前身）萌发的阶段，在文献古籍中有“夏道尊命”、殷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1]的记载，神灵祖先崇拜为氏族部落、宗族、邦国塑造了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帮助各部首领实现了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但由于这一时期我国仍处于原始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还无从谈起。

秦代，始皇统一六国后用神权加强皇权，利用宗教服务于自己的统治。一方面秦始皇把自己政治抱负的实现归功于“赖宗庙之灵”，不断增加对名山大川的祭拜，留下“泰山封禅”的典故。另一方面在政教关系处理上，强调“天人之分”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从而强化了皇权。

西汉后，我国在文化上确立了儒家独霸的治国策略，建立了合乎儒家礼制规范的国家祀典制度，民间信仰因含有巫术、卜筮、问卦、星相、神仙方术、阴阳五行之学等成分，被冠以“怪神”、“淫祀”^[2]，统归为谶纬之学，成为统治者和政府兴学教化的对象。更在特定历史阶段，因为“靡财妨农”“长乱积惑”^[3]等原因而遭禁毁。

到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中国有无宗教”^[4]的争论，受西方文化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发表了中国无宗教的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界、学术界对我国宗教国情的合理认知，从上而下，对民间信仰普遍存在“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情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政府在应对西方“洋教”的种种挑衅破坏中已经焦头烂额，更加无暇顾及民间信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各大宗教进行民主改革，开展“四清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积极对各类宗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受到“左”“右”倾运动影响，民间信仰在社会领域消沉。^[5]因为人数少，规模小，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管理场所这一时期处

于“存而不管”的自发状态。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复苏，民间信仰作为传统信俗的一部分，日渐活跃，并演变为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个社会问题，但关于民间信仰到底是不是宗教、该不该按宗教问题管理等原则性问题，政府部门、学术界、宗教界争论不一。

199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见》正式提出：“对属于当地民间信仰的小庙，应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6]1998 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指出：

“省民间信仰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管理亟待加强。”^[7]表达了地方党委、政府在民间信仰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回答了新时期民间信仰问题该不该管的认识论问题，为基层推进此项工作扫清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思想认识。

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政治敏感度高，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置风险和治理难度大，是基层干部和基层部门躲着走、绕着走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对于关于民间信仰的认识尚不完全清晰，党内很多干部还拿不准吃不透民间信仰的定性，心理上普遍存在困惑顾虑。习近平同志立足地方实际，尊重地域民情民俗，在民间信仰问题上想的深、看得透、把得准，根据民间信仰发展趋势作出要把民间信仰管起来的前瞻性判断，强调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破解理念之惑，为政府掌握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主动权打下了基础，有效遏制了民间信仰无序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导”的工作方法具体体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8]民间信仰不能“放”，一放乱象丛生，更无法“收”，收也收不住，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政府得当有力地主动作为，把民间信仰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上来。从后来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个案经验教训看，对民间信仰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是极为科学正确的，部分地区正是由于前期

对民间信仰发展态势重视不够、预判不足，导致辖区内重建、新建、扩建、乱建宫庙数量较多，为后来当地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埋下了诸多隐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间信仰该不该管的思考与探索具有重大的思想与行动意义，依法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理，规范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确保民间信仰活动有序开展，既有利于党的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有利于引导民间信仰积极融入社会，造福人民，为地区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发挥正向积极作用。

二、解方向之惑：提出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的工作方法

民间信仰与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学者姊崎正治的田野调查里概括为“庶民性”（与统治者正祀对应），在社会学家杨庆堃的学术架构里体现为“弥散性”（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对应），在乌丙安等民俗学者的研究里表现为“民族性”（与宗教普世性对应），在曾传辉、邱泽等宗教学者观点里又新增“地缘性”（与宗教的国际性对应）。此外，张祝平、习五一等专家学者也有独到的归纳，不一一赘述。集各方观点之要可知，民间信仰是集俗、教、巫于一体的复杂文化体系。它涉及人、财、事、物各方面，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统筹历史、传统、民族、法律等多重关系，牵涉范围广，管理难度大，工作任务重。在民间信仰管理体制机制等各项工作保障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基层管理部门是很大的挑战。即使到了今天，宗教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宗教工作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日益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在民宗系统干部中仍流传着“多一座庙，就多一群鬼”的说法，侧面反映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难度。

民间信仰点多面广，情况复杂。在实体层面表现为信众参与人数多、宫观庙庵场所多、节庆祭祀活动多，社会影响大。以广西为例，根据自治区民宗部门的统计，截至2022年，全区拥有各类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达3.12万处，其中20平米以上建档编号场所5994处，参与民间信仰的各族群众达

千万。一村一社（社庙），一村一庙的现象很常见，世居民族如壮族、瑶族、侗族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如布洛陀、达勒甲、甘王庙、盘王及撒神等，民间信俗活动众多，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独特人文生态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福建省为例，福建省也是民间信仰大省，2002年福建省民宗厅就曾在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全省范围内，几乎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9]。目前，“全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总数有数以十万计。据不完全统计，全省10平方米以上的场所达26130座”^[10]。从现有官方公开数据来看，云南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1000多处，广东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1100处，浙江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34880处。湖南也是民间信仰大省，个别省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数量甚至超过了本省行政村的数量。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地域、民族重要的人文标识，与各地的地情、社情、民情交织交融。管什么、从哪里管都是很大的课题，特别是囿于基层宗教工作力量薄弱的现状，给地方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提出了“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11]的工作思路，有效化解了工作量大、人手严重不足的矛盾，快速打开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事实证明，从“活动”着手的决策是正确的，从错综复杂的事物联系中抓住了民间信仰的本质，发现了民间信仰活动的主要症结，找到了主要矛盾，沿着“活动”上下溯源对民间信仰开展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场所众多的工作力量投入不足问题，也避免了信众流动性大管理松散的问题，充分利用民间信仰“人因事而聚”“庙因事而兴”的特点规律，以活动为中心发力施策，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牵住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牛鼻子”，实现了对场所、人员的同步管理，实现了“导之有效、导之有力”。

从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五大宗教的管理也是从对“活动”的管理开始的。1994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宗教行政法规，即：国务院144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就是从外籍人士的宗教“活动”开始，开启了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治化进程。此后，我国宗教法律法规逐步从活动扩展到场所、人员、团体、院校、财务、互联网宗教各方面，宗教工作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逐步健全完善。同时，针对各大宗教特点实际和现实需要，又对涉及各大宗教具体教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细化补充。比如，针对藏传佛教历史传统，专门制定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针对伊斯兰教朝觐的要求，专门制定了《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针对宗教院校人才师资培养特殊性，专门制定了《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等等。

三、纾体制之困：明确民间信仰活动工作由民宗厅主管、其他部门配合为好的体制机制

建国后，我国即在政府机构系列设置了专门的宗教事务部门，负责全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但民间信仰因为定性问题并未列入宗教事务部门职责范围，长期以政府默认、群众自发的状态游走在宗教、宣传、文旅等多部门监管之间。直至1996年中办[1996]38号文件的印发，民间信仰问题才开始纳入国家治理视野。但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管理工作并未进入实质阶段。所以，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时仍将我国宗教信仰格局表述为“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民间信仰未列其中。

2003年，民间信仰管理工作出现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给中央有关方面提交的

福建民间信仰报告中，首次强调政府要从“大宗教观”的视野来观察民间信仰问题并将其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004年，在长期调研试点基础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对民间信仰实行归口管理，成立了承接民间信仰业务的管理机构，将其纳入业务职责（2018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民间信仰管理机构仍得以保留，职能得以延续）。至此，民间信仰正式成为国家宗教事务部门的业务对象，结束了长期无主管部门的历史。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关于做好民间信仰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对民间信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对民间信仰予以有效管理。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也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和立场进行重大调整，书中首次明确：“中国还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以官方名义确认了民间信仰在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199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强化党对民间信仰工作的领导，确立了省内民间信仰归口民宗部门主管的原则，协调推动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在全国率先设立“民间信仰工作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民间信仰问题应该有一个部门主管起来，设置临时管理机构与机构改革的精神不符，还是由民宗厅主管、其他部门配合为好。”^[12]2000年，在省级机构改革工作中，福建省民宗厅的职能设置增加了“研究和实施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一项。2002年，在接受《中国宗教》记者采访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也解释了“归口管理”的考虑：“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政府必须进行管理，我们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角度出发，把管理民间信仰活动的工作交给了省民族宗教厅，这样比较合适。”^[13]此后，“归口管理”的做法也被湖南、浙江等地学习效仿，并在今天成为民间信仰管理工作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得到一以贯之。

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是权责统一，各序列行政机构的运行机制与职权划分有密切的联系。各部门间依靠职责分工规定职权界限。在“归口管理”原则确立以前，民间信仰的管理模式有老人会、理事

会、文物、宣传、文旅、民宗等多元模式，各部门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条块化问题突出，彼此间对自身的职责定位分歧较大，推诿扯皮谁都不想牵头负总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工作的统筹性和整体性偏弱，直接影响部门工作合力的效能。简言之，多头管理产生的责任模糊、落实难等问题较为突出，“人人有责，人人不负责”的旁观者效应比较明显。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在闽确立民间信仰“归口管理”原则，堵住了民间信仰管理体制机制上的漏洞，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在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中的主次关系，压实了民间信仰管理主体的责任，克服了过去工作中部门分工不清、责任不明的弊端，通过完善机制推动工作落实，实现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实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开创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对福建、包括国家的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福建能够成为全国民间信仰管理标杆示范省份的关键所在。

四、破引导之难 强调文化遗产要保护好、传承好的重要理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塑造社会公序良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推乡村文旅产业、增强社会聚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当前，全国各地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利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路径，一些地方，沿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把民间信仰异化为引流推广、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招财工具，大兴各类民间信仰活动。一些地方将民间信仰视同封建迷信，一禁了之，导致舆情增多，政群关系紧张。还有的地方不愿不敢作为，对民间信仰的监管安于现状，以不惹事不出事为上。在如何引导利用民间信仰，使其最大程度抑制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问题上还没有成功破题。属地管理、分类管理的监管机制虽已确立，但如何利用、用在何处的引导机制缺没有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着眼当地的海、台、侨工作资源禀赋，特别是着眼对台工作需要，从党和国家扩大两岸人文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的战略大局出发，强调要利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特殊资源优势，充分注重发挥妈祖、关帝等民间信仰在陆台交流、民心相通中的人文纽带作用。妈祖崇拜、关帝崇拜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已从区域性信仰发展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共有的精神符号，承载着海外游子深沉的家国情怀、浓郁的乡愁归思，具有特殊的情感文化意蕴，是开展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文化媒介。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妈祖故里湄洲岛调研指出：“要丰富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妈祖文化。”^[14]并为湄洲岛广场建设筹措资金，嘱咐岛上干部群众：“把广场做大一点，让台湾同胞来得多一点。把种树的地方留大一点，将来邀请台湾同胞过来种树。”^[15]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在关帝文化产业园考察，听取当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时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关帝文化产业园内的东山关帝庙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

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作为海峡两岸共同文化根脉和精神纽带，已经深入两岸同胞心灵，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符号，在增进两岸同胞心灵融合、精神融合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用妈祖文化、关帝文化联结两岸人民的情感，以文化促共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台工作上的深思远虑。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间信仰历史人文价值的引导利用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灵活的统战工作艺术方法，给各地在管好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如何发挥地区民间信仰资源禀赋、用好民间信仰提供了参考。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交流活动”，进一步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

间所做一些工作的前瞻性、开放性、战略性。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工作的重要理念解思想之惑、方向之惑，纾体制机制之困，推动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对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考与探索既有一域之效，也有全局之功，积累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党和国家认识民间信仰问题、做好民间信仰管理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就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的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仍处于试水起步阶段，与较为成熟的宗教事务管理相比，无论在人员组织力量上还是政策法规保障配套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归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所做的思考与探索，在守正创新中担当实干，不断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
- [2] [汉]应劭撰,杜泽逊审定.元本风俗通义:卷九 [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244.
- [3] 朱迪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拾遗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58.
- [4] 李培林,谢立中.社会学名著导读 [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359.
- [5] 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第6卷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2613.
- [6] 浙江党建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见》的通知 [EB/OL].(2016-06-12)[2024-08-24].https://www.zjdj.com.cn/zt/lxyz/dzdg/201606/t20160612_1620241.shtml.
- [7] 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如何走向善治 [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2.
- [9] 习五一.简论当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 [J].世界宗教研究,2008(2).
- [10] 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我省民间信仰基本情况 [EB/OL].(2007-09-18)[2024-08-25].http://mzzjt.fujian.gov.cn/xxgk/gzdt/dsdt/fjzj/mjxy/200709/t20070918_2078187.htm.
- [11]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209.
- [12] 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如何走向善治 [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13] 陈红星,田悦阳.努力做好新世纪初的福建宗教工作——访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J].中国宗教,2002(4).
- [14] 吴伟锋,郑已东,黄凌燕.莆田:妈祖从这里出去 [N].福建日报,2023-10-13(2).
- [1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253.

【责任编辑:秦院院】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发 10 周年学习研究征文选刊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发以来，有力地推动统战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贯彻落实《条例》精神，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专题学习研讨，将贯彻《条例》纳入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指导地市社院开展理论研究阐释，并在《条例》颁发 10 周年之际，面向全省社院系统开展学习研究征文活动，形成一批理论研究成果，经精选后在 2025 年第三、四期刊发。

妈祖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粤东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杜元兰

（中共普宁市委党校，广东 普宁 515325）

摘要：本文以世界级非遗“妈祖信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妈祖文化的历史根源、传播轨迹，阐述粤东妈祖文化传承概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揭示粤东妈祖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上的时代价值，并提出非遗系统性保护、构建年轻化传播生态、深化两岸及国际协同机制、融入国家战略全局等保护传承的路径。

关键词：妈祖文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粤东现代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5)03-0011-0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凝聚侨心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目标，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将文化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纽带，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举措，强化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作为我国第一个信俗类世界级非物质遗产，妈祖文化以“立德、行善、大爱”的核心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妈祖文化不仅是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资源。本文基于粤东现代化进程的视角，通过挖掘妈祖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传播方式和深化两岸及国际合作，初步探讨其保护传承的路径。

一、妈祖文化的历史根源及传播路径

（一）历史根源：从巫女到海神的信仰演变

1. 起源与早期信仰

妈祖原名林默（960～987年），出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因救助海难、医术济世而被民间尊崇。其原型为百越后裔的“巫觋文化”产物，最初以巫祝身份活动，擅长预知祸福、治病消灾，死后被立庙祭祀。唐宋时期，中原移民与闽越后裔的文化互动推动了妈祖信仰的本土化，逐渐从地方神祇发展为航海保护神。

2. 官方认可与神格提升

宋代是妈祖信仰官方化的关键时期。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路允迪出使高丽遇险得妈祖庇佑，朝廷赐“顺济”庙额，妈祖首次获得官方认可。此后，历代帝王多次敕封，至清代封号达64字，尊为“天上圣母”，神格从地方神升格为国家级航海保护神。

收稿日期：2025-05-30

作者简介：杜元兰（1971-），女，汉族，广东普宁人，中共普宁市委党校科研管理室主任，经济学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地方文化。

3. 文化融合与信仰扩展

妈祖信仰兼容并蓄儒释道等文化元素，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创新性，其精神内涵核心与儒家伦理道德高度契合，妈祖造像融入佛教菩萨慈眉善眼“相好”特征，祭祀仪式又结合道教严格神圣仪轨，这种多元文化元素融合使其成为跨越文化、宗教及地域的普世信仰，其信众达3亿多人。

（二）传播路径：从沿海到全球的文化辐射

1. 国内传播：海洋贸易与移民驱动

宋元时期，依托泉州、广州等港口，妈祖信仰随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江浙、广东等地。明清时期，闽粤移民将妈祖带入台湾、东南亚，台湾妈祖庙数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形成“妈祖宫庙联盟”网络。近现代，通过“下南洋”移民和华侨社群，妈祖庙遍布五大洲近50个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美国等地。

2. 国际传播：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纽带

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元代海运漕运、郑和七下西洋均以妈祖为护佑神，船队每至港口必建妈祖庙。作为文化交流载体，妈祖文化与沿线国家宗教、民俗融合，如日本“妈祖会”、菲律宾“天后宫”，成为跨文明对话的桥梁。2009年“妈祖信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湄洲妈祖祖庙入选“海丝”申遗点，其全球文化影响力不断被强化。

二、粤东地区妈祖文化传承基本概况

粤东地区毗邻福建，古属百越，自然环境恶劣，台风、地震、海啸、暴雨、干旱、瘴疠等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构成巨大威胁，再加上战乱、海盗时不时侵扰，由此导致潮汕族群极度缺乏安全感，故而“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楚辞章句·九歌序》）。潮汕人是一个敬重神明的族群，有强烈的敬神乐生意识。因此，粤东是妈祖文化在广东传播的核心区域，其文化传承与福建妈祖信仰同根同源，但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本土特色。

粤东的妈祖信仰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随着福建移民迁徙传入。明代以后，闽南渔民、商贾大

量迁入粤东沿海，将妈祖香火分灵至当地。如南宋时期由福建闽商所出资修建的南澳岛深澳妈祖庙，它是潮汕地区最古老的妈祖祭祀地点。明清时期，粤东各大小港口，满载货物的红头船沿着中国海岸北至天津，南达珠三角及港澳、海南，直下南洋各国。潮汕人富有风险意识与感恩之心，经商贸易出海前总要到妈祖庙进香祈祷，顺利归来时再到妈祖神像前跪拜谢恩，虔诚敬奉妈祖。例如，汕尾凤山祖庙始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其分灵自湄洲祖庙，是粤东最早的妈祖庙之一。民谚有“先有凤山妈祖，后有汕尾港”。清乾隆年间，随着汕尾港的兴盛，凤山祖庙扩建为三进两院格局，成为区域信仰中心。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述汕尾港的繁荣，印证了妈祖文化对港口经济的支撑作用。

粤东地区海岸线绵长，自古以来渔业和海上贸易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俗语“跑船起马三分命”，航海的风险随时发生，妈祖作为海神，能庇佑航海安全，自然受到当地民众的虔诚供奉。清代以来粤东重要渔港，渔民、商船依赖妈祖庇佑，庙宇数量、规模和祭祀活动随之扩大。在粤东妈祖信仰非常普遍，妈祖庙宇众多，各村有各自的传奇故事。这些古老的庙宇承载着粤东人民对妈祖的信仰与尊崇，众多妈祖传奇故事见证了妈祖文化在粤东地区的生根发芽与传承发展。例如揭阳普宁流沙北街道西陇村的天后古庙就与众不同。别的地方的天后宫庙，奉祀的只有一尊庄严的天后神像，而西陇村的天后古庙，奉祀的神像却有三尊。一位女神，为什么要敬立三尊神像呢？相传明朝中后期，西陇村商人广西公常年在外经商，因先祖源自莆田湄洲岛，故随身携带妈祖灵符。某次返乡途中迷路，夜宿古庙时得妈祖托梦指引，依麻雀与萤火虫踪迹平安抵家。此后广西公建庙奉祀妈祖，庙址选于村出水口与主干道交汇处，既利朝拜又合风水格局。庙内初塑小神像一尊，然数次遭商人“迎请”私奉，虽经补塑仍反复失窃。奇异的是，被盗神像最终均被悄然归还，形成三尊神像并立之景。乡人按安奉时序尊为大媽、二媽、三媽，成就“共奉一炷香，同祀一神明”的独特信仰景观。广西公后得贵子取名履绳，寓意承妈祖训诫正道直行，其经商信条亦融入村落文化基因。

粤东妈祖文化在传承中形成两大特色：

一是宗族血缘关联。如普宁林姓族群大约25万多人，他们将妈祖视为家族先祖，在洪阳水吼村林氏宗祠旁建有一座同等规模“三间三进”格局的天后庙，林氏宗亲会也成立普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并编撰《妈祖之光》一书，强化信仰的宗法性。又如汕头潮阳程洋冈村林氏宗族以天后宫为核心，将妈祖信仰融入宗族祭祀，强化文化认同。

二是民俗创新。如汕尾“抢炮头”从传统祈福扩展至竞标募资，兼顾文化传承与庙宇维护。在“妈祖生”庙会上，除传统的戏曲、传统技艺、饮食展示等等外，还融入动漫网游、影视新媒体等文化新业态。普宁人在“妈祖生”那天要吃炒面线（一种挂面条，普宁特产），面线与纱线两者相似，使之联想到妈祖传说中林默娘手中的渔网线。普宁人“妈祖生”吃炒面线，意在趋吉避凶。揭西县河婆张氏家族通过各村落结合客家山歌、舞龙舞狮等本土艺术形式，形成“一村一品”的妈祖文化展示。

综上所述，粤东因其地理位置与福建山水相依、人文相近，历史上大量移民由闽入粤，民谚有“潮汕人，福建祖”之说，由此可见，粤东妈祖文化既是闽粤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海洋经济与民间信仰互动的见证。

三、粤东妈祖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上的时代价值

敢冒敢闯善于经商的潮汕人漂洋过海遍布海内外，“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他们富有风险意识，同时又敬神乐命，懂得感恩，对于妈祖的崇拜成为海内外潮汕人共同信仰及精神纽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粤东妈祖文化精神内涵、文化实践与交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情感、促进两岸及海外华人团结的重要力量。其显著的时代价值体现以下几点。

（一）文化价值：地域文化的精神标识与道德纽带

妈祖文化与粤东地方文化、方言、建筑、民间艺术深度交融，形成潮汕特有的文化景观。妈祖祭祀活动中融入潮剧、英歌舞、铁箸木偶戏等传统艺

术，既丰富了妈祖庙会文化内涵，又推动了粤东各非遗的活态传承。其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通过民间信仰引导民众互助友爱、心存善念，从而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二）社会价值：凝聚力提升与两岸交流的桥梁

以“立德、行善、大爱”为核心的妈祖文化，通过众多妈祖行善积德传说故事，激发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每年妈祖诞辰祭祀与巡游活动，吸引信众共同参与，强化了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也成为联系海内外乡贤的精神纽带。粤东与台湾隔海相望，共同的妈祖信仰促成频繁交流。两岸信众共祭、文化研讨等活动，增进了同胞情感认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它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桥梁。近三分之二的台湾民众信仰妈祖，通过“妈祖下南洋”“妈祖金身巡台”等活动形成常态化互动，强化了“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深化两岸文旅与经贸融合。两岸学者通过妈祖文化志、文献整理等合作，构建共同学术话语体系。

（三）经济价值：文旅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妈祖文化包容性强，与粤东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相生相伴，包含着感人的人文情怀，其活态传承的创新实践，不仅保护了传统文化，还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双赢。如汕尾凤山妈祖庙会、博美妈祖信俗等省级非遗项目，吸引港澳台及国内外游客。以凤山妈祖庙为例，庙会期间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产业发展，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活力源。2025年揭阳惠来县围绕妈祖诞辰1065周年举办了系列文化活动，前詹、隆江、神泉、靖海等天后宫同步开展巡安；妈祖文化公园举办非遗三献礼、平安午餐等，吸引大量信众参与。这些活动通过非遗展演、传统礼仪等形式弘扬妈祖精神，促进文旅融合，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四、粤东现代化进程中妈祖文化传承的路径探索

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及过度商

业化等文化风险，需突出妈祖“和平女神”的形象彰显中华文化的和平性与包容性。因此，在粤东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妈祖文化非遗系统性保护、构建年轻化传播生态、深化两岸及国际协同机制、融入国家战略全局等实践，探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一）强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粤东众多的妈祖宫庙大多是明清时期创建遗留下来的，是宝贵的不可移动文物。宫庙建筑与文化设施的保护与建设，这是传播妈祖文化的硬件，也是弘扬妈祖文化的物质基础，必须保护好、守护好、利用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建立粤东妈祖文化数据库，推进宫庙建筑数字化建模；完善非遗传承人培养机制，推动学术体系化建设。同时，将妈祖宫庙纳入乡村振兴规划，打造“文化地标+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

（二）构建年轻化传播生态

数字化传播能吸引年轻一代参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开发能满足年轻人情绪价值的文化体验，如运用 VR 技术复原妈祖传说场景，推出“元宇宙妈祖巡境”项目；打造短视频 IP（如“妈祖 Vlog”）、互动游戏，使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青年亚文化载体。要大力开发和推广妈祖文化创意产品，诸如妈祖音乐、妈祖舞蹈、妈祖服饰、妈祖雕塑乃至卡通妈祖等，并深深融入文化旅游及群众业余生活当中。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发展，主要是支持各类媒体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全面深入参与妈祖文化的传播，拥抱新媒体，扩大妈祖文化保护的“朋友圈”，增强其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如揭西溪角村成立妈祖文化理事会，湖光村组建“青年传承队”，通过短视频、文创设计吸引年轻人参与。又如 2025 年第三届海丰妈祖巡境活动通过无人机航拍、网络直播吸引年轻群体，飞天仙女队等创新元素成为网络热点。

（三）深化两岸及国际协同机制

妈祖文化是两岸共同的精神纽带。例如，台湾大甲镇澜宫每年组织信众赴湄洲谒祖，粤东地区可通过“妈祖巡安”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岸民间互动，强化“两岸一家亲”的认同感。以妈祖文化为

纽带推进两岸融合，扩大“妈祖金身巡游”“宫庙结对”等民间交流，探索“妈祖文化自贸区”建设，促进经贸合作与心灵契合，构建跨文明对话平台。近年来潮汕英歌以“中华战舞”爆屏于世界，每逢妈祖庙会粤东地区可带领英歌舞表演队参加相关庙会，以“文化出海”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筑牢全球华人的共同体意识，更构建起“文化出海—民间外交—产业赋能”的立体化传播模式。

（四）融入国家战略全局

将妈祖文化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实施体系：

1. 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例如开发妈祖文旅综合体，培育“非遗工坊+民宿经济”模式，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又例如，潮汕地区可学习湄洲岛设立“妈祖评理室”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做法，依托妈祖信仰开展“乡村文化调解会”，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衔接。这种以文化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德法共治”的本土化方案。

2. 融入海洋强国战略。妈祖文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代表，其“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的理念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精神高度契合。可设立“妈祖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挖掘航海伦理与生态保护智慧，推动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可通过“妈祖巡安”活动、海洋经济合作等，将妈祖文化塑造成为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也将其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实践”。

3. 融入文化强国战略。粤东地区可借鉴莆田经验，组织专家制定《妈祖祭典》团体标准，增强其统一性、协调性和庄重性，推动妈祖文化在全球更好传播和发展，积极参与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推动妈祖文化从民间信仰向学术研究、国际对话升级。加强粤东地区妈祖文献的整理，结合历史学、人类学视角挖掘其与海洋贸易、移民史的关系；通过教育体系融入妈祖精神课程，推动妈祖文化进教材、进社区，培育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

结语：

妈祖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是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载体，又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践路径。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我们深刻认识到，粤东妈祖文化的当代实践，既是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脉的延续，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平性与创新性的生动诠释。通过价值挖掘与创新赋能，其不仅为粤东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产业支撑，广泛凝聚了侨心，更以“文化自觉”的姿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兼顾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宋建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妈祖文化 [N].光明日报,2015-07-22.
- [2] 王海文.海洋文化和丝路古港 [J].东方文化,2016(1).
- [3] 张树庭.妈祖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传播 [A].人民论坛网,2024-03-25.
- [4] 宋建晓.传承弘扬妈祖文化 促进两岸民心相通 [N].光明日报,2023-05-23.
- [5] 孙喜红.新时代海外统一战线助推中华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 [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6).

【责任编辑：秦院院】

浅析习近平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

文福贵

(清远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 统一战线工作, 历来受到党的高度重视, 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关键词: 习近平; 新时代; 统一战线理论; 统战工作;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16-06

新时代以来, 我国统一战线工作(以下简称统战工作)面临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大势、谋篇布局,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对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实践成果和重要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深刻总结, 与时俱进, 立足党情、国情、世情, 对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发展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研究, 就我国统战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创新,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当前及今后做好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是时代之需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 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 正需理论创新加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沿、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 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 既是科学理论的丰富, 也是现实工作的指导, 更是民族团结统一的力量。

(一) 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

理论创新, 是对原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建党百余年来, 党的统一战线由弱变强、统战工作理论由片面到逐步完善, 逐渐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统战工作理论体系。

党自诞生之日起, 便不断探索统战工作理论。党的一大提出无产阶级团结、联合的思想以及“联合第三国际”, 党的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和统一战线政策。这是建党初期, 党对统战工作在理论上的探索, 为党的早期统战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 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与时俱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观点及论断, 不断丰富党的统战工作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 并将其放在治国理政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我国发展趋势, 顺应时代潮流,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 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战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回答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大问题, 阐释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 明确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战略布局和前进方向, 开辟了新时代统战工

收稿日期: 2025-06-06

作者简介: 文福贵(1987-), 男, 苗族, 贵州凯里人, 清远市社会主义学院党建与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统战理论。

作新理念新思路新方式，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战工作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充实了党的统战工作理论体系。

（二）指导现实工作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工作。统一战线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联合不同社会力量实现共同目标的政治战略学说。统一战线工作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工作。理论是旗帜，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统战工作的旗帜和行动指南，对现实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与党的统战工作理论创新的指导密切相关。

新时代，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我国统战工作面临新挑战新情况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发展，针对当前统战工作存在问题及发展状况，高度重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统战工作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战工作时代之变、历史之问，归纳、总结、分析建党以来统战工作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统战工作要怎么做”等重大问题，系统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法宝”论等新观点新论断，开创形成了统战工作路径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统战工作，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重要论述、科学论断，开创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理论创新。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集中体现了百余年来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精髓和科学内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现实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推动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

统战工作理论，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思想武器，可转化为强大力量。统一战线是推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而统战工作理论就是让统一战线取得实效的重要思想武器。统战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凝聚统战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党的二十大提出，全体中华儿女要团结奋斗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儿女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民

族团结、祖国统一，要把各民族、各方面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凝聚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各施其能，各展其才，各尽其力，为促进民族团结、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1]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主要是为了推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上，统战工作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民族统一大局，须以科学的理论创新指导统战工作，汇聚统一战线力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国家主权安全和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推进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力量。

二、习近平论新时代统战工作理论创新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完备，系统分析了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的历史方位、目标任务、战略部署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全面阐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一）强调“党的领导”论

坚持党的领导，是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原则、最根本的政治底线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党的领导”^[2]，强调党的领导要在统战工作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落实，明确了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实践证明：建党百余年，什么时候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统一战线就取得较好成就；什么时候削弱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统一战线就会遭受挫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和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根本政治前提，也是统一战线取得实效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3]，党对统战

工作的领导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政治底线，确保统战工作政治方向正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4]明确了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原则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将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贯穿于其全过程、各领域，将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要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变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政策，增强党领导统战工作的政治力、引领力、组织力及话语权。新时代，要始终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确保统战工作向前发展。

（二）重申“重要法宝”论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建设、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在中国革命中，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至此，从理论上确立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实践证明：不论在革命战争时期壮大党的群众基础，还是建设、改革发展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统一战线始终是重要法宝。

新时代，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统一战线同样发挥重要法宝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论，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多次重申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及重要性。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5]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6]因此，统一战线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三）提出“大统战工作格局”论

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是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重要问题。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态，形势依然严峻，这使得我国统战工作面临国

内国际双重考验。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沿、把握历史方位、洞察内外局势，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联合、同盟等统一战线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党长期以来结合中国统战工作实践形成的宝贵经验，也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大一统”等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提出了“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7]是做人的工作。要充分认识统战工作的任务、对象及范围，建立最广泛的人民“同盟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8]党的事业，需要人心所向，要把支持党和国家事业、民族团结的人“搞得多多的”，将人民众力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工作策略，开拓各条战线范围上的广度与内容上的深度，利用统战工作点多面广的优势，把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支持者、爱国者聚拢在党的周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要“一起来想、一起来干。”^[9]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筑大统战工作格局。

（四）提出“民族共同体意识”论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0]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情感的交织交融，下大力气将民族情感、民族血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交融汇聚。加强民族交往互鉴，增进民族相知相亲，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维护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减少隔阂与偏见或矛盾。增强民族历史认同、情感认同、思想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各民族经过岁月的洗礼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日益铸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筑牢思想长城。要下功夫引导各民族树牢共同体思想，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性、持久性。增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民族观，增进交流，凝

聚共识，团结一致，荣辱与共。严密防范、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国家和民族分裂活动的行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增强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同心同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固思想长城。

（五）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论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提出多样性与一致性的重要论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往往是对立统一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就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处理统一战线要有辩证思维，要讲求方式方法和把握工作原则，调整思维、转变观念，既要看到事物的多样性也要把握事物的一致性。^[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12]要从历史方位、时代进步、民族因素和地区因素把握好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辩证关系。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不断接触新鲜事物，思想多元、追求多样、诉求多重，“千人千面”趋势凸显。因地区发展差异、文化习俗差异、思想观念差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特殊问题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新时代的个体、阶层或群体，尽管其特点、诉求、意见等不尽相同，但是维护各方最根本的合法利益和权益是一致的，这就要求统战工作要处理好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要以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兼顾各方的根本利益。同时，要站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立场，旗帜鲜明反对以多样性的名义危害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将个体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之上，一切的多样性必须遵循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宁这个根本的一致性。因此，统战工作要处理好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

（六）“五大关系”团结和谐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处理好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的关系，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13]

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4]，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加强我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团结合作。完善协商制度体系，强化政党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5]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我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对话，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形成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良好局面。

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完善民族方针政策，增进民族交往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6]以团结促进民族发展、以发展巩固民族团结，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推动各民族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减少民族隔阂、偏见或歧视，化解民族矛盾，抵制民族分裂活动，打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大家庭。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习近平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17]。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引导国内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相协调，引导宗教人士及信教群众爱国爱民爱教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决反对假借宗教活动之名行分裂国家之实等行为。依法维护宗教人士及信教群众合法利益，依法支持信教人士参与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各阶层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聚民心、集民智，主动给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交任务、压担子、干事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知识、技术、财富等独特优势，其企业或组织在提供就业岗位、推动国民经济、市场资源配置、参与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发

挥重要作用。要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主人翁责任感，依法保障其合法利益，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搭建广阔舞台，推动其健康发展。

加强同海内外同胞的交流协作。做好与我国海内外同胞的交往交流，密切关注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合法权益。把握国内国际形势，探索新路子，积极利用海外统战渠道，创新海外统战平台和载体，利用我国海外新媒体及互联网平台，加大海外统战宣传力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内外联动，多联谊、广交友，广泛团结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维护祖国统一。拓宽海外同胞同祖国的联系纽带，增进海外侨胞祖籍认同、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建立广泛的海外统一战线，巩固和壮大海外统一战线力量，筑牢人心工程促进祖国繁荣统一。

（七）提出“复兴伟业”论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深入研究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扎扎实实做好统一战线各方面工作”，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8]。

党的统战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民族团结、国家复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压迫之苦。为了摆脱苦难和争取民族独立，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来的一切团结奋斗、一切艰苦创业、一切奉献牺牲，也是为了民族复兴伟业这个目标。因此，全国上下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三、习近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是党的统战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是在新的历史起点进行的重大理论创造，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党的统战理论创新重要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重要成果，也是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是党的统战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应时代之变迁，以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判断力、强大的创造力对党的统战工作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系统阐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战略部署、基本内容和实践要求，全面论述了统战工作的原则、方法、方向、范围和目标以及统战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述，系统论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新时代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战工作多样性与一致性、新时代统战五大新型关系、统战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等重要论断，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其理论内涵丰富、思想观点深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党的统战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

（二）习近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理论创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包含联合、同盟、团结等思想，提出各国民主革命应该联合各国工人等无产阶级的运动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后继续巩固和发展各阶级的联合团结以维护广大无产阶级利益和国家发展。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统战工作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统战工作理论继承式创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果。^[19]

（三）习近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

新时代，根据国内外形势风高浪急、变幻莫测，

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潮流和发展形势对新时代统战工作进行理论创新，系统全面阐述了如何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方法、观点和理念，科学回答了事关党的统战工作和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这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指导性，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符合党的统战工作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符合新时代统战工作客观规律和时代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统战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

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15年5月颁发的《条例》（试行）进行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条例》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重要布置安排写进了《条例》，成为全党的意志，以党内法规形式予以规范，有力地确保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重要布置安排能够完全准备地贯彻落实到位。这是《条例》修订的十分重要成果。对此，在《条例》颁发10周年之际，理论界更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使之更好地指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 [1] 张立新，陆博.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9(1).
- [2][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301.
- [3][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31.
- [4]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 [5] 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EB/OL].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 ,<http://tzb.shnu.edu.cn/c4/4b/c17440a771147/page.htm>,2022-08-10.
- [6][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39,38.
- [7] 辛玉玲.论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创新特色 [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3).
- [8][1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272,268.
- [9]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35.
-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39,38.
- [11] 周艳萍，韩廷波，孙彤.习近平统一战线思想研究 [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2).
- [12] 孙信.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探析 [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6).
- [13] 赵晓娥.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思想 [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1).
- [18]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EB/OL].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 ,<http://tzb.shnu.edu.cn/3c/ad/c17440a736429/page.htm>,2015-05-27.
- [19] 许立坤.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论纲 [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9(2).

【责任编辑：秦院院】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三重逻辑

郭毅铭

(云浮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云浮 527300)

摘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布十周年以来,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深刻把握《条例》形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对于新时代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党内法规; 形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22-05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一百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改革事业的辉煌成就, 未来也必将依靠统一战线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 经过党的历代领导集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和修订以后, 以制度化的形式为我党做好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和法规支撑。深入分析《条例》形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历史逻辑, 对于我们深入构建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形成的理论逻辑

《条例》的制定和修订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条例》重点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统一战线的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具备整体而系统的理论逻辑。

(一) 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贯穿始终

统一战线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他在《不来梅通讯》中写道: “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其后, 这一基本论断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团结被压迫的阶级, 实现政治上的“大联合”, 强化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力量, 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种主张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无论是党派的团结, 还是阶级的同盟, 其核心就是推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大联盟”。《条例》在马克思“大联合”思想的基础上, 明确要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所有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可以说, 《条例》是对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基本观点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丰富和完善。

早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比较关注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思指出: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 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同盟, 只是必须肯定,

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3]。”列宁在《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一文中同样强调：“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中”^[4]。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牢牢抓在我们党的手上。为此，《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即已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为本法规制定的目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贯穿了《条例》制定的全过程。

（二）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曾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作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两个联盟问题、统一战线的方式目标问题、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等进行过深入思考，最终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主要对象和方法运用等方面都作出过深刻的论述，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条例》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导。在毛泽东“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5]”思想的指导下，《条例》将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规范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对象，凝聚了更强的统战力量。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统一战线新论断的丰富和完善

邓小平对加强和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过大量的论述，遍及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外资和原工商业者以及港澳台等诸多方面。笔者认为，邓小平对巩固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的原创性贡献，莫过于将港澳台工作纳入了统战工作的重要范围。邓小平深刻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6]他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推动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并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为解决

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从此，港澳台工作成为了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条例》将“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单列一章，明确了港澳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和社会繁荣发展。

其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为推动了统一战线理论向前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江泽民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四个离不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离不开统一战线^[7]。胡锦涛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明确为统一战线的“五大关系”。这些重要论断，最终都成为了制定《条例》的主要指导思想，其运行逻辑充分体现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

（四）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制度化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8]”，并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新命题。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探索新时代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新规律，并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必须”，涵盖民族、宗教、民主党派、港澳台等诸多领域，指明了主要任务和工作原则。《条例》正是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出台和修订的。他对《条例》的影响明显而深刻。

《条例》在2020年经中央政治局修订以后，全方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要求。《条例》明确规定，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统战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民族、宗教、港澳台和海外、党外代表人士等领域，《条例》在政治制度、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层面进行了合理完善的制度安排，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统战工作的要求实现了制度化、法规化，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方法。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形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以来，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不断提升到新高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注重吸收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致力摸索适应我国国情以及时代发展的统战工作方法。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根据时代发展的时势需要，又并制定出台《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实现了统战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因此，《条例》的制定实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战路径探索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正式从思想理论层面进入了实践层面。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总体上处于摸索阶段。最初，无产阶级主要联合农民阶级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不断加以调整，经历了由“土地农有”向“减租减息”再向“耕者有其田”的转变过程^[9]，其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实现“争取广大农民、地主以及富农等加入统一战线共同完成革命任务^[10]”的目标。其后，党的统战工作重心逐渐从农民群体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领域拓宽，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促成了两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开始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人员名额分配中推行“三三制”，规定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推动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完成了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转变。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吸收宋庆龄、蔡廷锴、黄炎培、张澜等党外民主人士参与国家政权管理，极大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这些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拓宽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条例》将党推进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具体制度规定，实现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选举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例如，《条例》第十一章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在各级人大、政

府、政协以及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中应该配备党外干部，甚至名额和所占比重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条例》将“政治联盟”思想转化为国家制度顶层设计，在国内外都属于开拓性的制度创新，是对建国初期加强和改善统一战线工作做法的继承和延续。这种规定优化了机构设置，提升了行政效率，摒弃了代议制中因的不同政见、派系互相攻伐而造成政治混乱，体现了极大的政治张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

（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的统战实践

建国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艰难困境，党更加重视用好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并以红头文件的方式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等政策规定，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经济方面，1953年—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给予其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并提出“必须坚持地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而不能采取抛弃和排斥的方针^[11]”。这种区别于暴力没收财产的和平接管国家经济命脉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人心，实际上是党有效运用统战工作方法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刻体现。在政治方面，党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树立了党内党外团结合作的典型。在文化发展方面，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凝聚了一大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力量，较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自此，党对统战工作方法的运用已趋向成熟。尽管在十年“文革”动乱中，统一战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统一战线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宗教、民主党派等方面的工作逐渐重上了轨道，港澳台、海外侨胞关系得到了较好发展，统一战线也外延至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大统战工作格局得到初步显现。

总体来看，建国以来社会的发展为《条例》的制定出台奠定了良好的实现基础。从人民政协到政

权建设，从组织体系到民生领域，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全面铺开，具有清晰的历史定位，并成为了《条例》的重要内容。《条例》通过对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情况及现实问题进行大量分析论证，总结认识规律，确定大量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后，反过来推动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将统一战线定位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问题，加快探索了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道路。一方面，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更加注重加强党的领导，中央成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厘清党委和统战部在领导统战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责，有利于统合各种资源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发展。《条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表述共出现了5次之多，以此推动党的全面领导贯通统战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进入新时代以后，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在党内的角色日益重要，在党内决策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切实加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党通过深化完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调整创新党的统战工作领导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条例》不但对统战部门、民族宗教部门、社会主义学院等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延伸到了人大、政协等其他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形成一个紧密可靠的的整体，从而大大提升了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港澳台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领域以及工会、妇联、文联、工商联、知联会等领域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形成的实践逻辑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一战线工作将呈现点多、面广、差异化特出、工作难度大等特点。《条例》的制定以及其后来的修定都是经过不断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党在新时代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依据

和主要抓手。深入贯彻落实《条例》要求，有利于凝聚人心、汇聚智慧，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统一战线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广泛联系的先天优势。为此，在招商引资、政策推介、项目生成等方面，统一战线职能部门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条例》上所提及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等，既是统战的主要对象，也是重要的统战资源。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充分调动这些社会贤达的力量，通过举办联谊会、恳亲会、茶话会、项目推介会，引导其加大投资设厂的力度，从而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境外资源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珠三角地区就是在这时候通过引进吸收港澳资源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后，《条例》所指出的“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涵养侨务资源，引导华侨、归侨、侨眷致力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等任务要求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因此，要继续做好政策推介和服务，充分调动相关资源进入欠发达地区，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稳步提升。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思想引导，引导其树牢回报社会的理念，加大对养老托幼、医疗卫生、文化服务、救灾减灾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推动其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进步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统一战线是一条极广泛的战线，涉及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在社会上均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化演进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这些群体联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发展，共同应对国内国外危机，达到《条例》提出的“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条例》明确：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党外人士遍布海内外各个

职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此，统一战线具有跨越民族、阶层、宗教信仰、职业、地域的特点。统战工作可有效连接从星斗市民到社会贤达。一是通过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凝聚人心。我国目前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都具备数量庞大的信教群体。统一战线通过加强与庙宇以及宗教带头人的沟通联系，能够最有效发动这类群体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升国家凝聚力。在民族关系方面，增强少数民族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条例》要求在尊重少数民族、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开展国家、民族、文化、历史认同教育，符合当代促进民族融合的发展大势。二是通过为党外代表人士树立典型，增强凝聚力。《条例》为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制度依据，明确了其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方式和渠道。这是我党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科学法则。实践证明，深化吸收党外人士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争取民心、巩固国家政权的必然要求，从而实现党内党外大团结。三是通过加强与港澳台同胞以及华侨、归侨、侨眷的沟通联系，促进友好交流合作，提升其对国家民族认同感和身份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4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7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1 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2.
- [4] 列宁专题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18.
-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267.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3.309.
- [7]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M]. 人民出版社. 2006.149.
-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9] 颜杰峰.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J]. 2022(2).
- [10] 唐皇凤, 吴万万. 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J]. 长江论坛, 2024,(05):21–31.
- [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EB].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5/25/t20070525_11493169.shtml.

【责任编辑：余伟】

应急管理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优势及治理效能提升

王 妍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00)

摘要: 风险社会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防范风险、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指挥决策、综合统筹协调上具有显著优势, 在应急管理事前、事中、事后阶段发挥重要的作用。突破当前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同协调、人才培养、监督评估等方面现实困境,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在应急管理领域的治理效能, 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关键字: 新型政党制度; 应急管理;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27-04

当前我国面临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新形势, 突发事件此起彼伏, 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守护神”, 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新”, 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 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 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长期的应急管理实践过程中, 凭借其独有的政治结构和运行模式, 在防范风险、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指挥决策、综合统筹协调等方面展现出极为独特的优势。面对我国新形势下的风险社会, 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与应急管理通过治理效能这一关键纽带, 实现了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有的非对抗性政党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合作关系, 各民主党派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这与西方的“执政-在野”的对抗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此形成“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独特格局。这种具备中国特色的政治格局为高度复杂性的大国治理提供了强有力制度基础和制度支持。应急管理是大国治理中重要的一环, 一个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创性的制度设计为国家应急管理事业提供了天然的制度优势。

(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因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思想政

收稿日期: 2025-05-15

作者简介: 王妍,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管理学教研室讲师。

治基础，都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所暴露出的弊端和尖锐矛盾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愈发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每当社会上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总能发挥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迅速形成统一指挥体系，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利用国家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充分调动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应急力量投入到应急救援行动当中。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传统为突发事件初期争取到宝贵的应急时间和应急资源。例如新冠疫情初期，党中央迅速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国医疗物资调配和制定防疫政策，地方党组织同步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应急响应体系。除此之外，2021年河南郑州发生特大暴雨灾害之后，民主党派成员发起“心理援助志愿队”，覆盖20万受灾群众，这种动员能力超越了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天然优势。

（二）政治协商机制提高科学应急决策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机制拓宽了民主渠道，丰富了民主形式，扩大了民主参与，整合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专业智慧，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充分发表意见、建议，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急决策不同于普通决策，具有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风险高等鲜明的特点，要求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对突发事件的起因、性质、发展态势等进行快速的判断，以做出科学合理、及时有效的应急措施，减轻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应急决策过程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应急管理决策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持和科学依据。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调研报告、建言献策等多种渠道，向决策层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例如，在“十四五”规划制定中，民主党派提出2.3万条建议，其中2000余条被采纳，体现“协商式决策”而非“零和博弈”。在自然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中，民主党派中的专家学者从灾害评估、基础设施修复、产业恢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救援和重建方案提供参考。九三学社在2020年提出“基于大数据的疫情传播模型优化建议”，被纳入国家防控技术指南。这种广泛的政治协商机制，能够充分吸纳各

方智慧，避免决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提升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使应急管理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民主监督优势保障全链条风险防控

民主监督深度嵌入应急管理全链条，从风险预防、应急处置到事后重建，实现对风险的全周期、立体化防控，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转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首先，民主监督在风险识别阶段能够发挥“预警器”作用。民主党派凭借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专业人士的知识储备，能够深入基层和一线，对各领域潜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和精准识别。例如，在城市建设领域，民主党派中的工程技术专家通过实地调研，对高层建筑消防设施、地下管网老化等安全隐患提出监督意见，督促相关部门提前整改，避免风险演变为突发事件，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民主监督在风险处置阶段能够发挥“指南针”作用。民主党派成员可以深入应急救援现场，对救援指挥调度、物资调配、人员救治等环节进行监督。比如在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民主党派监督人员会检查消防力量部署是否合理、物资供应是否及时、受灾群众安置是否妥善等问题。一旦发现救援流程中的漏洞或违规操作，及时提出整改建议，保障救援工作科学、高效进行。同时，民主监督还对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进行监督，确保政府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公布灾情和救援进展，避免因信息不畅引发公众恐慌或误解。最后，民主监督在突发事故后恢复重建阶段能够发挥“助推器”作用。民主党派对突发事件进行复盘分析，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提升全社会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多党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构建了“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的双重保障。在应急管理中，这种监督模式能够有效追踪政策执行漏洞，防范潜在风险隐患。例如，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中，民主党派的提案推动地方政府完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强化了风险源头治理。

（四）“多元共治”的治理智慧促进多方应急资源统筹协调

突发事件发生后，需要各方发挥综合统筹协调

的作用，对人员、信息、物资等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多元共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特色，这一治理模式以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打破不同领域壁垒，实现人力、物资、信息的高效整合与快速调配。在社会协同方面将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公众等共同吸纳进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补充、群众参与”的治理网络。总而言之，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军队、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被迅速整合，共同投入到应急救援行动当中。比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动员企业捐款捐物，宗教团体参与社区服务，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在社会参与方面依托人民政协等平台，整合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形成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共识与合力。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的现实困境

（一）协同合作深度不够

在应急管理实践中，虽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背景下各方力量总体上能参与到应急救援行动中，但在具体工作中，各政党之间、政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还不够紧密，协调沟通机制也有待完善，有时会出现工作衔接不顺畅、职责划分不明确的情况，导致在应急管理过程的事前、事中、事后阶段出现漏洞或重复劳动。

信息共享是应急管理中关键的一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各政党及相关部门之间有时存在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局部地区的灾害应急中，由于信息系统不统一，导致民主党派获取的灾害信息与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存在差异，影响了民主党派参与应急救援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应急专业人才匮乏

民主党派中虽然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在应急管理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数量相对有限，且分布不均衡。在一些基层地区或特定领域的突发事件中，民主党派难以提供足够的应急管理专业人才支持。另外，社会层面救援力量资质参差不齐，部分志愿者缺乏专业救援技能，盲目参与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社会力量参与无序也会影响整个应急救援行

动。例如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前期救援工作开展比较艰难，因为缺乏协调，救援队伍和支援队伍同时涌入灾区，导致非专业力量抢在专业力量之前，造成灾区交通阻塞，延缓了灾区的救援行动。

（三）资源调配缺乏协调

在实际应急救援行动中，物资协调非常重要，关系到后续一系列应急行动效果。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协在广泛汇聚民力、联系动员群众参与方面具备优势，但有时候在灾区救灾物资调配方面容易出现问题。比如突发事件发生后，动员大量社会公众自发向灾区捐赠物资，但因事先对灾区物资需求缺乏调研，导致捐赠的社会物资供大于求或者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造成捐赠物资浪费的现象。

（四）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

目前，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监督评估机制还不够健全，对各政党及相关部门在应急管理中的工作成效缺乏科学、全面、及时的评估。这可能导致在应急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影响了应急管理效能的提升。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应急管理中的治理效能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其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制度和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治理逻辑不仅能为应急管理提供多元视角与智慧，还能凝聚各方力量，增强应急管理的协同性与有效性。因此，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挑战下，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提升其在应急管理中的效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构建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

切实保障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权力，这对于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应急管理中的优势效能具有关键意义。明确民主党派参与应急管理政策制定的程序，从政策议题提出、调研、草案制定到审议，都规定具体参与环节与时间要求，将政党建议纳入政策评估体系。构建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建立政策制定

协商平台，如定期召开应急管理政策协商会，邀请政党代表与政府部门共同商讨政策制定。

（二）培育应急管理专业人才队伍

未来，应急管理专业人才和队伍应全面覆盖各个领域，利用民主党派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打造我国应急管理综合智库。拓宽人才吸纳渠道，利用政党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吸纳社会各界优秀人才加入应急管理队伍，使其在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如医疗卫生、工程救援、灾害预警等方面发挥自身力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中的专业人才通过兼职、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应急管理工作，构建多元化的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在培养途径上，除了可联合高校设立政党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之外，还可利用社会主义学院平台，为民主党派干部、无党派人士开设提高应急管理能力方面的课程体系，培养应急管理专业干部。

（三）优化应急协调机制，提升资源整合效能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可通过该平台实时共享应急相关信息，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发展态势，以及救援力量分布、物资储备等情况，为综合统筹协调提供准确依据。在应急预案方面可根据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制定详细的协同应急预案，明确各政党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恢复重建等各个阶段的职责和任务。例如，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时，明确中国共产党负责总体指挥和统筹协调，民主党派利用其成员中的专业人才优势，参与灾害评估、救援技术指导等工作。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之后还要定期开展联合演练，通过组织联合应急演练，模拟真实的应急场景，检验和完善协同应急预案，提高各政党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和应急反应速度。同时，演练也有助于发现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

（四）完善应急监督评估机制，提高应急管理规范性

明确监督评估主体与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负责统筹协调监督评估工作，制定监督评

估的总体方针和政策。各民主党派则作为重要的监督主体，依据其专业优势和领域特点，对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专项监督评估。例如，医药卫生界别成员较多的民主党派可重点监督评估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医疗救治、疾病防控等工作。鼓励无党派人士积极参与监督评估过程，发挥其独立客观的优势，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全面、多元的视角。另外，要丰富监督评估方式方法。一是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各民主党派可通过参加应急管理相关会议、查阅文件资料、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对日常应急管理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而针对特定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应急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则需开展专项检查。二是专家评估与群众参与相结合。邀请应急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来自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实践一线的专业人员，组成专家评估团队，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专业评估。同时，充分听取受灾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通过问卷调查、群众访谈、网络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群众对应急管理工作满意度和实际需求，使监督评估更贴近实际、更具针对性。

参考文献：

- [1] 叶子鹏，单景泽.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耦合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视角 [J]. 中国应急管理科学, 2024,(11).
- [2] 许奕锋，王晓航.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地方实践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24,(6).
- [3] 张建琴，江晨颖.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23,(5).
- [4] 孙倩倩，李新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探析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
- [5] 许奕锋，易婧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现状管窥及其建设路径探析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1).

【责任编辑：柯翌嘉】

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以蔡廷锴的政治实践为微观考察

卢观铤

(云浮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云浮 527399)

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本文选取爱国将领蔡廷锴从效忠国民党到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转变历程为研究对象, 进行微观个案分析。研究表明: 蔡廷锴的政治困境深刻揭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无法解决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的核心矛盾, 是其必然瓦解的缩影; 其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群体通过反蒋抗日、组建民主党派、参与新政协等实践, 为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与组织雏形; 而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与制度化参与, 最终实现了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的政治理想。蔡廷锴的个案有力证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 蔡廷锴; 历史必然性; 国民党民主派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31-04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解其历史必然性, 是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蔡廷锴出身行伍, 历经北伐名将、“一·二八”抗战英雄、福建事变领导者、民革创始人、新中国领导人等多重身份转换, 其政治立场从效忠国民党最终转向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一转变历程, 不仅映射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 更深刻揭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破产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一、蔡廷锴政治实践的演进: 从效忠到觉醒与抉择

蔡廷锴的政治立场转变非一蹴而就, 是其亲历民族危亡、体验制度弊端后, 在探索救国道路中逐步完成的。

(一) 民族危局下的抗争与对国民党的幻灭(1931-1937)

一是“一·二八”抗战与不抵抗政策的冲突。1932年, 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违抗南京政府命令, 在上海浴血抗日, 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赢得巨大声誉。此举反映了全民抗战的迫切要求, 却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尖锐对立。蔡廷锴痛感“连年内战, 枪口不能对外, 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 决心“不再反共, 主张一致对外”。^[1]这次抗战使其对国民党的本质产生深刻质疑。二是福建事变中“反蒋抗日”的实践与失败。对蒋介石政策彻底失望后, 1933年蔡廷锴联合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打出“反蒋抗日”旗帜, 并主动寻求与红军合作, 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此举旨在联合各方力量挽救民族危亡。事变虽因内外压力迅速失败, 却标志着蔡廷锴与国民党统治的公开决裂, 是其探索救国新道路的重要尝试。失败流亡的经历使其更深刻认识到推翻旧制度的艰巨性。

(二) 民主道路的探索与最终抉择(1937-1949)

收稿日期: 2025-05-12

作者简介: 卢观铤, 法学硕士, 云浮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化、制度化的民主追求。一是组建抗日民主团体。1935年，他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抗日。该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宗旨，出版《大众日报》作为机关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体现了爱国民主力量在旧制度框架下寻求联合的初步努力。二是抗战中的边缘化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廷锴积极投身抗战，领导军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等重要战斗。然而，由于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和排挤，蔡廷锴的军权逐渐被削弱。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变本加厉”的腐败和内战政策，他痛感“自念自为军人三十余年，爱国有心，为国无方”，对“当年革命内争，出生入死，穷究竟为什么，思之仍有余痛”，彻底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三是创建民主党派与走向新政协。1946年，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明确反对独裁内战，追求民主和平。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给蔡廷锴写了一封信。信中高度评价蔡廷锴为和平民主做出的贡献：“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在先生指导下，民主浪潮蓬勃，发展，无任欢腾。”^[2]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肯定与团结。1948年，他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毅然奔赴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筹备。1949年，作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其政治立场的最终确立：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实现其救国理想。

二、蔡廷锴政治实践与新型政党制度必然性的逻辑关联

蔡廷锴的个体经验与群体性实践，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共同揭示了其历史必然性。

（一）个体困境：旧制度危机的微观映照与瓦解动因

蔡廷锴的政治挫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性危机的集中体现。一是无法解决民族矛盾，压制爱国

力量。国民党政权在民族危亡关头坚持“安内”优先，压制爱国力量，暴露其阶级局限性与反民族性。全国抗战爆发之初，蔡廷锴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他空有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实现杀敌报国的志愿。他在自传里面写道：“虽有满腔热血，抱抗日救国的决心，但手无寸铁，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3]二是排斥民主协商，实行独裁统治。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党内民主派和党外进步力量。其“一党专政”本质决定了无法容纳真正的民主协商与合作。三是脱离人民群众，腐败丧失民心。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对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悲哀和担忧，“自胜利后至今已四月有余，一切政治均未上轨道，且官僚贪污之风变本加厉，有甚于未抗战之前，军人蛮横有甚于军阀之时代”。^[4]蔡廷锴目睹的腐败乱象，深刻揭示了该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人民对立的本质，丧失了统治合法性。蔡廷锴从效忠到反抗再到最终决裂的历程，生动诠释了旧制度因其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必然走向瓦解的历史逻辑。他的个人困境，是旧制度丧失解决近代中国核心问题能力的缩影。

（二）群体实践：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与组织雏形

蔡廷锴并非孤立个案，其行动代表了国民党内民主派群体的共同诉求，他们的实践为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一是凝聚广泛社会力量。“一·二八”抗战、福建事变、民族革命同盟等活动，凝聚了不满国民党统治、主张抗日民主的广泛社会力量，包括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等，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二是构建早期政治组织载体。创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组织，是爱国民主力量在探索中形成的政治联合体雏形。这些组织在反蒋抗日、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实践了初步的合作与协商，为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转型为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提供了组织准备和干部基础。蔡廷锴作为这些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活动体现了旧制度框架下民主力量的汇聚与重组，为新型政党制度中“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做了前期铺垫。

（三）制度效能：理想归宿与必然性的最终确证

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为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的制度化途径，其效能印证了该制度的优越性与必然性。一是提供制度化政治参与平台。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化平台，蔡廷锴得以直接参与建国大业，如制定《共同纲领》，实现了其追求民主政治、参与国是的理想。这与他在旧制度下“手无寸铁”、“徒唤奈何”的境遇形成天壤之别。二是保障平等协商的政治地位。在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框架下，蔡廷锴作为民革领导人，能够以平等地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其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他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过程中，感受到了平等、信任和尊重，能够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诉求。这种基于共同政治基础的协商合作关系，保障了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空间。三是实现制度效能的历史性对比。新型政党制度成功解决了旧制度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推动了政治民主、并致力于国家建设。蔡廷锴在新型政党制度中角色价值的充分实现，不仅是对其个人选择的肯定，更是对该制度能够有效整合力量、回应时代课题、实现共同理想的历史必然性与优越性的最有力证明。

三、蔡廷锴实践的启示：新型政党制度生命力的源泉

蔡廷锴的政治轨迹及其在新型政党制度下的归宿，为理解和发展这一制度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与现实启示。

（一）核心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蔡廷锴最终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其在长期探索和比较中得出的深刻结论。旧制度下，国民党因其阶级局限和独裁本质，无法凝聚全民族力量解决深重的民族危机；而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的民族立场、科学的理论指导、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成为领导核心。蔡廷锴亲身参与新中国创建和建设的历程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统筹全局，团结带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形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面对复杂形势和复兴伟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保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的“定海神针”。必须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

（二）实践路径：协商民主是整合多元力量的有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蔡廷锴的政治生涯贯穿了对超越党派纷争、寻求团结合作的执着追求，从福建事变尝试联共抗日，到组建民主团体寻求联合，再到最终融入新政协的协商建国。这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对克服对抗性政治、寻求最大政治共识的内在需求。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民主”为核心特征和显著优势，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丰富而制度化的渠道，为不同社会阶层、党派、团体提供了表达诉求、参与决策、贡献智慧的平台，真正践行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深刻印证了协商民主是适合中国土壤、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民主形式，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所在。蔡廷锴的经历启示我们，在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提升协商的实效性和质量，使协商民主更好贯穿于国家治理各环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机制。

（三）价值根基：人民至上是制度合法性与生命力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蔡廷锴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根源在于其严重背离人民利益，陷入腐败与独裁；而对共产党的认同与拥护，则基于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新型政党制度将

“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各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致力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蔡廷锴的转变历程昭示，任何政党制度的生命力与合法性，归根结底源于其与人民的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民生关切，反映群众诉求，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确保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认同。蔡廷锴的转变昭示，脱离人民，制度必将丧失根基；扎根人民，制度方能永葆生机。

蔡廷锴的政治实践，是一部微观视角下的中国政党制度演进史。他从效忠国民党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转变，绝非偶然的个体选择，而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国民党一党专政

因阶级局限、独裁本质与腐败统治，注定无法实现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功整合各阶层力量，开辟了符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蔡廷锴的个案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发扬协商民主、站稳人民立场，既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更是其面向未来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 [1] 蔡廷锴. 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的经过 [M].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 59 辑).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73.
- [2] 周恩来. 周恩来书信选集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290.
- [3] 林一元, 余勉群. 蔡廷锴传略 [M].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11.
- [4] 蔡廷锴. 蔡廷锴自传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579.

【责任编辑：柯翌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独特价值研究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丰皮影戏为例

许康杰

(汕尾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因,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独特价值。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丰皮影戏为例, 其在国内传播上, 通过构建“制度—认同—技术”三维机制实现传承发展: 制度层面通过文化强省政策构建协同保障体系; 认同层面依托《盛世藏行》等创新剧目强化民族团结叙事; 技术层面运用 VR 数字博物馆等拓展传播维度。在国际传播上,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开展跨文明对话, 创新性地将传统皮影技艺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 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实践证明, 陆丰皮影戏传承创新不仅维系了文化多样性, 更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 同时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 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 非遗传承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陆丰皮影戏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35-07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指出: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①,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点。这一重要思想观点, 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作为党内的统一行为规范, 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维系着民族文化根脉, 彰显着民族精神特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生关系

(一) 非遗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非遗文化符号通过其图腾、仪式和技艺等具象化形式, 以三重路径塑造文化认同: 物质载体记录多民族交融的历史; 表演实践传承“多元一体”的记忆; 创新表达激活当代认同。正是这些符号将抽象的文化认同转化为可参与的实践, 推动着“各美其美”向“美美与共”的升华, 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同时, 文化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②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认同, 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因此,

收稿日期: 2025-05-16

作者简介: 许康杰(1997.6-), 男, 哲学硕士, 汕尾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

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成部分，更是其最深层次的根基。

一方面，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支柱。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的自觉接纳与传承，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情感纽带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③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认同对民族团结的支撑作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交融共生，使各民族在语言、习俗、信仰等方面形成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记忆，从而在心理层面构筑起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当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认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认同便能转化为强大的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深层次的团结。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化认同的现代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消弭文化多样性，而是在承认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共同利益”与“共同体”的关系，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应是基于自由个体的联合，而非外部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各民族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同时，形成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共同追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文化认同的升华，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

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在守正创新中深化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制，而是在尊重差异中寻求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共识。

（二）非遗传承创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⑥这一论述为理解非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非遗的文化认同功能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而非遗正是强化这一认同的重要媒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明确指出，保护非遗“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⑦。这一法律精神凸显了非遗在构建国家文化认同中的核心作用。非遗作为“活的历史”，其传承过程能够让不同民族的成员直观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通过非遗的传承与传播，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对于破除狭隘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作用。非遗作为语言、技艺、习俗等文化实践的活态表现，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传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⑧非遗传承正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能够找到与历史的联结，并通过这种联结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二是非遗的联结功能能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能够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形成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局面。例如，传统节日（如春节、藏历新年、古尔邦节等）的庆祝活动，不仅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习俗，也成为不同民族相互交流的契机。这种跨文化互动使得各民族在共享同一文化空间的过程中，逐渐强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同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共同利益会推动不同群体的联合。而文化层面的共同性同样会强化共同体意识。非遗保护的现代实践，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活动，为各民族提供了展示和体验多元文化的平台，使非遗成为民族团

结的“活态纽带”。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框架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铸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

三是非遗的创新性发展能够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内涵。非遗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博物馆式保存，而是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⑩当前，非遗的保护已从静态记录转向活态传承，从单一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升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遗的创新性发展，既是文化生产力的延续，也是中华文化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例如，苗族银饰、云锦织造等传统技艺的产业化，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更让非遗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这种创新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使其在新时代更具凝聚力和感召力。

总之，非遗作为中华文化的活态载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承载。

二、陆丰皮影戏的艺术精髓与传承创新

作为中国皮影戏的重要流派之一，陆丰皮影戏既是潮州皮影系统的唯一遗存，也是南路皮影艺术的杰出代表。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宋代，历经明清时期的兴盛与民国的普及，至今仍在民间传承。作为我国三大皮影系统之一，陆丰皮影戏因深厚的闽南语系传统和海陆丰民俗浸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雕刻工艺上融合潮汕彩色剪纸与水墨画技法，影人以牛皮精制，关节灵活，水袖轻纱飘逸；表演上糅合正字戏、白字戏曲牌及渔歌小调，并与地方戏曲相互影响，如白字戏的“皮影步”便源于此。正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湛的技艺，陆丰皮影戏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2011年11月，作为“中国皮影戏”

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保持传统精神的同时，陆丰皮影戏积极创新。1978年，艺术家彭美英大胆改良表演方式，引入戏曲身段与正面影身技法，极大丰富了表现力；2014年，陆丰市皮影剧院建成投用，兼顾传承培训，引入实景VR、馆藏珍品、观看剧目等数据化手段，线上线下打造皮影数字博物馆，让古老“非遗”不断焕发新生命力。陆丰皮影戏通过历史积淀与当代创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独特地位，无愧于“世界电影始祖”的美誉。

三、陆丰皮影戏传承创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⑪作为非遗的重要代表，陆丰皮影戏不仅承载着海陆丰地区的历史记忆与艺术智慧，更在当代文化传承中发挥了增强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陆丰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正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通过构建“制度—认同—技术”三维机制，使这一古老艺术既延续传统精神，又融入现代文化语境。其机制不仅体现了非遗保护的实践探索，更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生活案例。

（一）制度性政策协同促进陆丰皮影戏非遗传承创新

在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背景下，2010年7月出台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粤东西北地区应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构建与珠三角地区协同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⑫这一政策导向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而陆丰市皮影戏传承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敏锐

把握政策机遇，积极整合政府资源，通过有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成功推动皮影剧院项目的立项与资金落实。2014 年建成投用的皮影剧院，不仅实现了传统艺术空间的现代化转型，更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重构了非遗传承的当代路径，体现了文化记忆储存与活态传承的双重功能。这一创新实践验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强调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促进非遗传播”的理念。

从文化治理的深层效应看，影剧院的建设强化了从业者的共同体意识，通过物质载体与精神凝聚的互动，提升了艺术团体的内生动力，进而巩固了陆丰皮影戏在中国偶戏领域的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其在运营中形成了“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一方面，研学旅行与文旅融合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公共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市场化探索为非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契合国家“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部署。

（二）多元场景嵌入陆丰皮影戏活化共同体意识

中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多维场景嵌入与多元主体联动，构建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模式。

在文化惠民层面，中心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枢纽，开展“送戏进乡村”“乡村文化集市”等一系列活动，累计覆盖群众超 3 万人次，既满足了基层文化需求，更探索了非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在教育传承方面，通过设立校园培育基地、创新“理论教学 + 沉浸体验”的双轨模式，将皮影戏融入青少年美育体系。如邀请学生来剧场观看演出，走进皮影戏台前幕后，学习皮影戏的相关知识，包括其起源、演出方式和皮影道具的制作，营造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有效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际传承的核心命题。尤为突出的是亲子互动项目的设计，通过“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组织家庭参与皮影制作与表演，形成“小手拉大手”的社会化传播机制，在情感联结中培育文化认同。这些实践充分彰显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其本质是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再生和协同治理的动态过程，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象化的文化载体。

（三）陆丰皮影戏数字化传承创新拓展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③这一重要论述为非遗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心通过数字化技术与艺术创新相结合，推动皮影戏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与传播。在技术层面，中心依托实体剧院打造汕尾首个 VR 线上数字博物馆，运用三维图形、立体显示等技术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让传统文化突破时空限制，走进更广泛群体。在内容创作上，中心秉持“讲好中国故事”理念，将红色文化、法治宣传等时代主题融入皮影戏编排，并推出《盛世藏行》等精品剧目，以文成公主历史故事呼应“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该剧在形式上大胆创新，融合皮影与木偶表演技法，借助多媒体技术拓展舞台维度，使“影”与“偶”的交融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赋予现代化表达。从传承模式的整体建构来看，中心逐步形成科技传播、教育推广、艺术创新三位一体的传承体系，既提升了非遗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又探索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实践充分证明，非遗保护不仅要坚守技本体，更需以创造性思维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可能，通过技术赋能与艺术革新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与时代价值重构。

四、陆丰皮影戏创新传承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④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独特价值。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丰皮影戏不仅是海陆丰地域文化的活态呈现，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其艺术实践与传播过程，成为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扩展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一）非遗地域文化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⑯”这一经典论断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作为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陆丰皮影戏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创新姿态实现着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

陆丰皮影戏扎根乡土，因其生动传神的艺术表现和贴近民众的审美特质而广受欢迎。近年来，中心立足新时代文化使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创作实践。其中，“一带一路”题材精品剧目《盛世藏行》通过讲述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故事，巧妙地将地方非遗技艺与宏大的民族团结主题相结合。该剧不仅艺术再现了唐蕃古道上文化交流的动人史诗，更以皮影艺术特有的表现形式，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在肌理。在实践中，陆丰皮影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范式。通过赴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北京、香港等地的巡回展演，这些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的地方艺术作品，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纽带。正如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陆丰皮影戏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地方文化的创新发展，既需要坚守地域特色这一“既定的条件”，更要主动承担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责任。

五年来，中心相继推出20余部弘扬爱国主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剧作，这些作品既保留了陆丰皮影的艺术特质，又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2023年5月，《盛世藏行》在广州的成功首演，标志着这种“在地化叙事，全民化表达”的创作模式日趋成熟。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只有当地域文化自觉融入中华文化的洪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二）非遗传承创新验证了传统文化对“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独特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⑰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认同对于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作用。中心的艺术实践，正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例证。

中心围绕民族团结主题精心打造《文成公主》和《盛世藏行》两部力作，其艺术成就与社会效益获得广泛认可。《文成公主》先后荣获2021年广东省优秀木偶皮影剧目展演“优秀展演剧目奖”、2023年深圳皮影文化艺术节“最佳表演奖”等殊荣；2024年9月，中心更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成为汕尾市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单位。这些成就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论断，彰显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在具体创作中，《盛世藏行》的创新实践尤为典型。该剧历时两年创作，通过“纱幕+多媒体”技术将杖头木偶融入皮影戏，构建五块幕布、三层空间的立体舞台效果。正如总导演赵玉明所言，剧中黄沙漫天的电影手法与古老皮影技艺的对话，既实现了“古今交融”，也构建了“东西对话”。编剧郑稳的创作理念深刻体现了文化认同的建构逻辑：“文成公主的故事成为促进共建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文化纽带”。这一认识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社会功能的论述高度契合。通过500余场国内外演出，累计观影人数约几十万人次，观众反馈称被精美的皮影制作和独特表演形式深深吸引。这些剧目既展现了“非遗文化+民族团结”的创新实践范式，更通过艺术实证表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能够有效引导各族群众深化“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认知，系统性增强“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具象化载体，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文化合力。

面向未来，中心将继续深化与民族地区文化交流，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参与国际非遗展示。这些规划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实践智慧：只有当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真正成为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纽带。陆

丰皮影戏的探索证明，守住非遗根脉、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三）非遗国际传播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化”^⑦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通性。陆丰皮影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以艺术为媒介，架设起文明互鉴的桥梁，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世界性的理论。近年来，该艺术形式远赴欧洲、北美及亚洲多地演出，累计海外巡演数十场，吸引观众上万人次，被国际媒体誉为“展现东方神秘魅力的独特艺术”。2024年4月，中心与土耳其卡拉格兹皮影戏在广州展开跨越6000公里的“非遗对话”，通过《鸡斗》《猪八戒背媳妇》等经典剧目展演及皮影制作工作坊，实现了活态化的文化共享。这种实践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的大众”的经典论述，展现了非遗艺术在当代的创新转化。

在具体传播策略上，陆丰皮影戏形成了“坚守特色”与“创新表达”并重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保持水墨画舞美、传统影戏技艺等核心特色；另一方面融合多媒体技术，如《文成公主》运用现代舞台语言。这种辩证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实践，通过持续参与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等平台，开展皮影制作体验活动，陆丰皮影戏成功塑造了“非遗文化+民族团结”的品牌形象。马克思强调“理论满足需要”的实践原则在此得到验证：传统艺术通过创造性转化，既满足了国际观众对东方艺术的审美期待，又以互动方式深化了文明对话。

这一文化传播实践产生了多维度的积极影响：通过剧目展演打破文化隔阂，借助技艺交流促进非遗保护的国际合作，依托《文成公主》等精品剧目传递“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陆丰皮影戏的国际传播，正是中华文化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深入推进，陆丰皮影戏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纽带作用，

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发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核心要义，并以此作为指导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独特价值，对于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生关系，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N]. 人民日报，2024-09-28(01)。
-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7。
-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
-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4。
-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N], 2011-04-05。
- ⑧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
- ⑨ 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关键词[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118。
- ⑩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 ⑪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03)。
- ⑫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

- 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2010-7-23）[EB/OL].https://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3270.html,2025-4-14。
- ⑬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18。
- ⑭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5。
-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 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7] 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08).
- [8] 侯有德,蒋欢宜.非遗名录中贵州传统戏剧的类型、特征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J].贵州民族研究,2025(01):90—95.
- [9] 季中扬.从小传统到大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95—102、192—193.
- [10] 李亚,汪勇.非物质文化遗产何以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贵州民族研究,2024(01):46—52.
- [11] 王丹.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148—156.

【责任编辑：陈童敏】

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以宗教团体内部规范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为切入点

任志强

(肇庆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当前我国宗教事务治理在制度规范、执法实践及社会文化层面存在多重张力,包括身份认定冲突、财产权属争议、教义实践与法律适用矛盾等。基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提出“双向调适”理论框架,构建“制度-法律-治理-文化-科技”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通过立法协同、司法解释、数字化治理、教义现代性阐释等创新机制,实现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的良性互动。该路径既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关键词: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宗教团体内部规范;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42-0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善于用法律法规规范宗教事务管理、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活动。《条例》颁发十年来,我国宗教界不断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沪宁指出:

“要坚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1]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多元化趋势加剧,宗教极端主义、非法宗教活动等问题凸显,亟需通过法治化手段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宗教事务条例》为主体、《条例》以及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宗教法律体系,但实践中仍存在“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我国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教义、组织、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法治是保障这一过程有序

推进的重要手段。宗教团体作为宗教事务的主体,其内部规范与国家法律的衔接程度直接影响宗教治理效能。需探索符合国情的我国宗教中国化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维度看,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宗教中国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存在和发展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使宗教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变革。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法治化路径推进宗教中国化,本质上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教义教规的现代性阐释,用法律规范化解宗教内部规范与现代社会价值的张力。这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也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论断。法治化不仅为宗教中国化提供制度保障,更通过规范宗教行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动宗教在政治认同、社会适应、文化融合等方面

收稿日期: 2025-05-27

作者简介: 任志强(1966-),男,河南安阳人,历史学硕士,肇庆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

实现深层次变革，最终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宗教治理体系。

一、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挑战

（一）制度规范层面的结构性矛盾

制度规范层面的结构性矛盾有如下四个表现：一是身份认定规范冲突。《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确立宗教教职员需经宗教团体认定并报政府备案的制度，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对社会团体负责人资质设定民事行为能力与无刑事处罚要求，二者在审查标准上存在制度性张力，导致部分宗教团体负责人因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政府备案。二是财产权属登记矛盾。《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宗教财产登记主体为宗教活动场所，但“在各种宗教政策性文件和法规规章当中就出现了‘寺庙所有’、‘社会公有’、‘国家所有’、‘中国教会所有’、‘信教群众集体所有’、‘宗教团体所有’等各种表述。这种宗教财产权归属主体的多元性，给确定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主体带来了一定的难度”。^[2]三是教义实践与法律适用冲突。在婚姻家庭领域，部分宗教团体基于教义对离婚权的限制与《民法典》第1076条赋予的平等离婚权存在价值冲突，导致司法裁判与宗教调解结果不一致；在财产继承制度上，佛教寺庙财产“十方僧团共有”的传统与《民法典》第92条捐助法人制度下的宗教财产权属规定存在适用矛盾；教育权亦存在争议，宗教自办经文学校未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违反《义务教育法》第2条关于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规定。四是自治权与公权力边界模糊。基督教“家庭教会”自行任命牧师与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体系存在制度性对立；《宗教事务条例》第42条未量化“大型宗教活动”标准，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制度运行层面的机制性障碍

制度运行层面的机制性障碍有如下三个表现，一是备案审查形式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6条要求宗教团体章程报民政部门备案，但部分地区存在程序审查流于形式的问题。二是基层执法

能力不足。专业人才普遍匮乏，“在实践中还存在宗教执法主体不健全、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程序欠佳的现象。”^[3]三是协同治理机制缺位。宗教、公安、住建等部门联合执法活动少，导致监管盲区。

（三）宗教自治与社会文化挑战

宗教自治与社会文化挑战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宗教团体治理能力薄弱。宗教团体存在未按章程定期召开代表会议，财务透明度不足的内部管理松散问题；某些宗教团体未建立系统教义研究机制，教职员资格考试通过率不高；“当前各大宗教教职员普遍短缺、青年教职员少、宗教人才队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4]二是信众权益保障存在短板。场所供给不足，人均宗教活动场所面积太小；既懂法律又懂宗教的法律人才稀缺，基层宗教纠纷案件中的大量信众未获专业法律帮助。三是传统观念与法治冲突。某藏传佛教地区“煨桑”仪式因焚烧松柏枝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8条；个别信众认为“宗教戒律应优先于法律”，某民族地区多数宗教纠纷往往通过传统调解解决。四是宗教极端思想干扰。“借助互联网平台向少数民众以‘宗教’名义散布‘圣战’思想音视频资料，歪曲伊斯兰教教义、煽动宗教狂热、宣传极端宗教思想”^[5]；某邪教组织滥用“宗教自由”权利对抗司法调查，严重干扰司法程序。“有些宗教信徒仍存在外国的月亮圆、外国宗教正宗的错误想法”^[6]等。

二、我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构建

（一）构建制度规范的“双向调适”机制

1. 立法协同与标准统一。推动《宗教事务法》立法，专设“宗教财产”章节，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为财产登记主体、允许在某种条件下通过补充协议约定“宗教共有使用权”、财产处置需经宗教团体表决，同时进行政府备案、教职员管理；设立“宗教教职员”专章，规定认定需经宗教团体审查并政府备案、定期接受法治培训。建立“审查制度”，宗教团体的法律顾问必须对宗教团体的教义教规、组织章程、行为准则的合规性进行审查，宗教组织拒不修改的，法律顾问应向县级宗教事务主管机关

报告。制定《宗教财产登记操作规范》《宗教活动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指引》等规范文件，规范宗教工作行为。

2. 权利义务清单化管理。设计《宗教团体自治权责清单》，权利事项明确宗教有自主管理宗教内部事务、开展宗教教育、管理宗教财产的权利，义务事项明确宗教有接受政府依法监管、保证教育内容符合国家规定、定期公开财务信息的义务。制定信众权利保障负面清单，禁止性规定有教育领域不得因宗教信仰拒绝录取学生，就业领域不得设置“无宗教信仰”招聘条件，医疗领域不得拒绝为信众提供必要医疗服务。实施机制为建立“宗教歧视投诉快速响应通道”、对违规单位实施“约谈+通报+信用惩戒”三级处置。

3. 双向调适保障措施。宗教团体修订章程需同步提交《法律兼容性说明》，重点说明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衔接，与《义务教育法》的冲突解决，与《宗教事务条例》的一致性。每5年开展《宗教事务条例》实施评估，重点调整与《民法典》《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的衔接条款，不适应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传统管理规定。

（二）建设法律体系的“精准供给”工程

1. 专项法规细化。制定《宗教财产登记与管理实施细则》，重申宗教活动场所属于非营利法人类别的捐助法人，但应规定“十方僧团共有”等传统权益与法律的冲突处置方式，保障宗教实践需求。省级宗教事务主管机关制定《宗教习惯法合法性审查办法》，规定由地级市宗教主管机关进行审查，审查范围为婚姻家庭领域的限制离婚权、多配偶制等教义；财产继承领域的师徒传承、宗教共有财产分配规则；教育领域的经文学校课程设置与义务教育的衔接；审查标准为不得与《宪法》《民法典》等上位法抵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信教群众基本权利；审查结果运用为合规教义纳入《宗教团体自治规范》；需修改的，宗教团体应在1个月内完成修订，违规内容依法予以废止。推行宗教调解协议规范化，强制要求宗教调解协议附加“权利保留条款”：“本调解协议不影响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2. 司法解释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宗教事

务审判指导案例”，明确宗教财产继承纠纷适用《民法典》第92条，离婚权争议优先适用《民法典》第1076条，宗教调解不得限制诉讼权利，宗教教育需符合《义务教育法》，经文学校应开设国家规定课程。

3. 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教义与法律冲突，解决路径为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登记与传统冲突，解决路径为采用双层权属结构；自治与监管冲突，解决路径为司法解释明确边界。

（三）构筑协同治理的“三维创新”体系

1. 构建多元共治网络。完善由统战部牵头，民宗、公安、住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定《宗教工作协同治理权责清单》，明确联合执法事项。总结宗教事务综合执法经验，实现执法文书标准化、案件办理流程优化。建立“宗教事务观察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众代表参与执法监督。

2. 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制定《宗教事务联合巡查工作规范》，明确联合巡查频次为每季度至少1次，重点领域为宗教教育、消防安全、财产管理，处置流程为发现问题→联合研判→分级处置。构建三级处置机制，轻微违法为一级整改，处置措施为责令限期整改；一般违法为二级处罚，处置措施为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违法应当依法处置）；严重违法为三级关停，处置措施为吊销许可证并联合惩戒（违法应当依法处置）。建立宗教财产区块链登记系统，实现财产来源可追溯、变更过程可监控、流向数据可审计。

（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价值引领”路径

1. 教义现代性阐释工程。成立“宗教经典法治化阐释中心”，组织宗教学者、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联合攻关，完成《佛教经典法治化解读》《伊斯兰教经典现代性诠释》《基督教教义中国化指引》，建立“教义阐释案例库”，收录典型案例。将《教义中国化阐释指引》纳入宗教院校必修课，设置“国法与教规关系”专题模块，占总学时的一定比例。在宗教活动场所推行“法治主日”制度，每月第一周由教职员结合教义宣讲法律知识。宗教团体需每年提交教义阐释报告，经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后作为年检重要依据。

2. 宗教实践转型引导。推广绿色宗教仪式，寺院烧高香，转型方案为推广“三支清香”标准；露天焚烧纸钱，转型方案为供电子祈福平台；大型宗教集会转型方案为开发VR虚拟朝觐系统。开发“宗教活动合规指引”APP，集成智能问答、风险预警和案例库。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宗教活动环境保护规范》，明确宗教场所绿化率的最低要求，禁用含汞宗教用品，建立宗教活动碳足迹核算体系等。

3. 代际传承创新机制。“做好宗教人才培养工作，以人才培养强化我国宗教中国化之本”¹⁷实施“333人才培养计划”，选拔300名35岁以下青年宗教骨干，配备30名专家导师，提供3年系统培养，培养成果纳入宗教团体负责人选拔标准。构建“一网一微一抖”传播体系：宗教法治网、微信公众号“法润宗教”、抖音号“宗教那些事儿”、开展“宗教青年说”直播活动。与高校联合开设“宗教与法治”微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建立“宗教青年领袖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围绕“我国宗教中国化与青年使命”主题展开研讨。

（五）构筑风险防控的“四位一体”体系

1. 极端思想监测预警。开发“清源”宗教极端思想监测系统，整合互联网信息抓取、自然语言处理（NLP）、图像识别等技术，实现非法传教信息实时识别、高危场所动态预警、跨境宗教渗透风险评估、建立宗教极端思想特征库。在云南、新疆等边境省份建立“跨境宗教安全走廊”，与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宗教事务联合监管备忘录》，实现宗教活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行动、重点人员协查、重点人群干预。对有极端思想倾向的信众实施“一人一策”干预方案，包括心理疏导、法治教育、社会融入等。

2.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三级调解网络：村级调解站由宗教界代表、村民调解员、法律顾问组成，处理化解日常纠纷；乡镇调解中心由民宗干部、法律顾问、宗教团体负责人组成，处理复杂纠纷；县级调解委员会由法律专家、宗教学者、政府官员组成，解决重大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宗教领域公益诉讼范围为宗教财产流失、宗教极端思想传播、信众权益受侵害案，建立“诉前磋商+联合调查+协同整改”机制。

3. 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建立红黑名单动态管理制度，红名单标准为连续3年无违规记录、积极参与教义法治化阐释、信众满意度≥90%；黑名单标准为涉及宗教极端活动、违规开展宗教教育、拒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信用奖惩措施：红名单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黑名单团体暂停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限制接受捐赠。完善宗教活动场所信用档案，包含基本信息、合规记录、社会评价，与“信用中国”平台对接，实现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

4. 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市县级政府应动态管理《宗教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举办一次预案演练，对预案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每年对应急预案的针对性、衔接性、可操作性进行全面评估，并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预案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六）构建实施保障体系

1. 政策支持。构建法治化考核评价机制，将“宗教法治化指数”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建立宗教团体负责人年度法治述职制度，要求宗教团体负责人每年向统战部、民宗局提交法治述职报告，报告内容作为政府评审依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在宗教法治化改革中出现的非原则性失误，建立“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的容错机制，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2. 资金保障。设立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开发宗教事务管理大数据平台、区块链资产登记系统等数字化平台建设、资助宗教院校法律课程建设和“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打造宗教法治文化示范基地、配备宗教极端思想监测设备和心理干预设施。

3. 理论支撑。强化中国特色宗教法治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设立“国家宗教治理研究中心”，承担年度《中国宗教法治化发展报告》编纂、宗教与法律交叉学科建设、重大理论问题攻关。在高校设立宗教法治研究基地，开展“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衔接”专项课题研究。举办“一带一路宗教法治论坛”，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联合开展宗教治理比较研究，形成《宗教事务治理国际经验借鉴报告》。

4. 国际交流。在边疆地区试点“跨境宗教活动

联合监管机制”，与周边国家建立宗教渗透预警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宗教事务治理公约》，输出中国宗教法治经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框架下提交《宗教信仰自由与法治保障》国别报告，提升中国宗教治理国际话语权。

总之，本研究通过构建“双向调适”“精准供给”“协同创新”“价值引领”“风险防控”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该方案既坚持党的领导与法治统一，又尊重宗教特殊性，为全球宗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王沪宁.要坚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J].法音,2025(1):4.
- [2] 张晶.宗教活动场所不动产登记问题思考[J].中国房地

产,2022(24):76.

- [3] 张西道.新时代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1):79.
- [4] 赵晓锋.理论认知、现实困境、实践反思、路径探索：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问题探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2024(6):45.
- [5] 丁红军.网络暴恐音视频管控研究[J].信息安全与技术,2015(3):84.
- [6] 张二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持续治理非法宗教活动[J].中国宗教,2024(6):9.
- [7] 郑筱筠.历史必然性与文化创新性——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J].世界宗教文化,2020(6):7.

【责任编辑：秦院院】

新时代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实践规律与创新路径研究

吴茂金

(汕头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00)

摘要: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总量连续 29 年居首的省份，广东省在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制度创新与治理经验。本文系统梳理了广东省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颁发十年间的政策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构建了“制度创新—价值重构—治理升级—战略协同”实践规律，深度剖析了政策传导、代际认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深层矛盾，提炼了党建引领根系化、政企共生态化等创新路径为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了实践的广东方案，谱写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壮丽篇章。

关键词: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实践规律；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1.23;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47-0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如何做好新时代非公有制领域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制定、宣传和贯彻党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命题，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锚定了政治坐标。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始终坚持贯彻《条例》，以“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使命担当，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全局，在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探索出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路径。

一、十年探索（2015—202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实践转化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历经十年系统性改革，构建起“制度创新—价值重构—治理升级—战略协同”四位一体的实践体系，这一历程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重要论述的生动诠释，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广东的生动实践。

（一）市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赋能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化探索。2018 年，广东“民营经济十条”以破除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企业开办全流程电子化”“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审批时限压缩至 100 个工作日”等硬核改革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根据《广东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2021》数据显示，该项政策实施三

年内累计为企业节约行政成本逾 1200 亿元。而在 2024 年推出的“民营经济 30 条”则标志着政策焦点转向创新驱动，设立总规模 500 亿元的“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建立“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5 年的 1.2 万家跃升至 2024 年的 8.7 万家，研发投入强度从 2.4% 提升至 3.8%。这种政策迭代绝非简单条款增减，而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理论的创造性转化^[2]。佛山“政策计算器”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惠企资金智能匹配，使政策申报材料精简 68%、资金拨付周期压缩至 72 小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行政效率提升，更是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范式的革命性重构。与此同时，更具理论深度的突破在于湾区政策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框架下，广东率先建立“湾区政策实验室”，推动深港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互认等 23 个领域实现规则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白皮书》显示，2023 年大湾区民营企业跨境研发合作项目同比增长 187%，这种制度创新既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物理界限，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湾区样板。

（二）法治现代化的权益保障体系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3]重要论断在广东司法实践中具象化为“预防性立法—包容性执法—修复性司法”三位一体的法治生态。这种创新既是对传统法治理论的超越，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重大突破，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例如，《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显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建立“侵权获利推定规则”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外观设计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从 2018 年的 3.8 万元提升至 2024 年的 28 万元，增幅达 636%。这种司法威慑力的显著提升推动全省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21.3%，深刻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科学论断^[4]。深圳检察机关推行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办理某高新技术企业走私案时，通过“3 个月合规整改 +6 个月跟踪评估”的柔性司法，既惩治违法行为又保住

2000 个就业岗位，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这种“刚柔并济”的法治实践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本质要求^[5]。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方面，广东的创新更具战略前瞻性。通过颁布全国首部《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确立数据要素确权、流通、交易等基础性制度；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合规指引》率先对接 RCEP、CPTPP 等国际经贸规则。2024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广东“合同执行效率”指标排名从全球第 46 位跃升至第 18 位，法治竞争力的大幅提升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增长 9.7%。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法治竞争力就是发展竞争力的深刻逻辑，更通过制度型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法治动能。

（三）价值认同整合中的政治引领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人士是我们自己人”^[6]的重要论断在广东实践中升华为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核心功能的深化发展。一方面，在政治引领层面上，广东构建起“红色教育—实践历练—政治吸纳”的完整链条。依托黄埔军校旧址、东江纵队纪念馆等 45 个省级教育基地，创新开发“重走东纵路”“湾区创新史”等沉浸式课程，累计培训民营经济人士超 20 万人次。根据 2024 年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调研报告问卷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家对“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的认同度达 94.6%，较 2015 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此外，佛山“青蓝工程”通过遴选 50 名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资深企业家与新生代建立“政治师徒”关系，在联合调研、参政议政中实现价值传承。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与 90 后创二代开展的“智能制造专题调研”直接推动《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提前落地，彰显了政治引领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社会责任领域，珠海首创的 ESG（环境、社会、治理）企业评价体系将“万企帮万村”升级为“万企兴万村”，引导 3000 余家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带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超 500 亿元。碧桂园集团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建成“乡村振兴综合体”使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从 0.8 万元提升至 3.6 万元。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数据变化，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7]战略的生动实践。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企业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创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

（四）湾区协同发展的战略制度创新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广东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造出新的湾区模式。其中，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制度创新最具代表性。通过建立“港澳专业人士执业资格互认清单”，使322名中国香港建筑师和153名澳门医师在前海便利执业；通过创设“跨境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实现深港企业信用评级互认。根据《前海深港合作区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前海港资企业数量突破1.2万家，较2015年增长15倍，深刻印证了制度型开放对要素流动的催化效应。与此同时，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华为与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共建的“光子芯片联合实验室”不仅攻克5纳米光刻技术难题，更建立起“基础研究在香港、成果转化在深圳”的协同创新模式。这种突破行政壁垒的创新实践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要论述的生动写照。在文化融合维度，广东创新实施“湾区文化解码工程”。通过建立粤港澳非遗传承人联盟、举办“湾区文化记忆展”等活动将醒狮、粤剧等文化符号转化为价值共识载体。当港澳青年在东莞南社明清古村落参与“湾区文化创客营”共同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时，文化认同已悄然升华为国家认同。这种“以文化人、以文促融”的实践生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二、现实困境：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深层矛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虽取得显著成效，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战略要求^[8]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突破的实践切口。

（一）政策传导的梯度衰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9]。但在基层实践中仍存在“政治引领悬浮化、政策执行碎片化”的传导耗散。这种现象的深层逻辑在于基层治理的机械性与统战工作灵活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折射出习近平总书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辩证统一思想在基层落实的变形走样。根据省工商联2024年专项调研，粤东西北地区民营企业的政策知晓率为51.3%，仅为珠三角的62%。某县域经济部门因编制限制导致“智改数转”补贴申领周期长达6个月，使32%的中小企业错过技术改造窗口期。这种制度性梗阻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治理中的顽固存续^[10]。某市工信局与科技局的扶持标准存在28项指标冲突迫使企业重复提交材料达132页，这种政策设计的“善意”在执行中异化为企业的“负担”。从统战工作视角审视，这种困境暴露出政治引领与行政执行“两张皮”的深层矛盾。破解之道在于需要将统战思维植入政策执行全过程，通过建立“企业家政策观察员”制度，使政策设计者与受益主体形成价值共识与行动协同。

（二）代际认同的价值断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11]，这一要求与新生代企业家的价值认知特征形成现实张力。根据2024年省委统战部调查显示，45岁以下企业家对“党建引领”的认同度为63.1%，较“创一代”下降29个百分点，其政治参与呈现“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异化特征，其中78.6%的受访者将政治身份定位于“商业资源获取平台”。某区块链企业创始人在访谈中直言，“算法治理比组织生活更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认知偏差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论断形成尖锐对立^[12]。此外，代际断裂的深层症结表现在政治社会化机制的滞后性。现有教育体系仍沿袭“课堂灌输+文件传”的传统模式，与人工智能治理、元宇宙经济等新实践严重脱节。比起父辈企业家在政协会议上畅谈“家

国情怀”时，新生代企业家更关注“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性”等技术议题。佛山某“创二代”在“青蓝对话”活动中坦言，“我们需要的是能指导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政治智慧，而不仅是革命历史教育。”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结构性梗阻

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的“政策执行梗阻”问题本质上是上层建筑局部领域未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写照。尽管省级层面已出台“民营经济30条”等创新政策，但仍存在部分城市“技改补贴直达机制”因基层要求企业提供设备采购全链条发票（包括物流单据），导致政策覆盖不足30%的情况。这背后折射出制度变迁中形式与实质的深刻矛盾。这种“政策漏斗效应”违背了党中央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要求。此外，广东省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制度性矛盾。研究表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税费负担差达3.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差扩大至5.7个百分点的数据，揭示出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的现实困境。这种制度鸿沟的形成源于珠三角凭借先发优势形成制度创新“虹吸效应”，也暴露出部分地区未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协调发展”理念的治理短板。例如，梅州某科技企业为吸引同等技术人才需支付12%-15%的薪资溢价，实质是区域间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的集中体现，亟待通过系统性改革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效应。而破解这一矛盾需回归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根本出路仍在于强化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如《广东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实施意见》强调的“完善民营经济工作机制”，只有实现政策供给与区域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才能释放制度红利的乘数效应。

三、创新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统战工作体系重构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促进两个健康”^[13]等重要论述指引下，广东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正经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范式跃迁。文章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双向互动，系

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战工作中的转化逻辑，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守正创新，又包含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为构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体系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样本。

（一）组织根系化治理的理论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重要论述^[14]在广东各地实践中升华为全新的党建模式，也是对新时代“两个健康”重要论述的实践诠释。例如，东莞松山湖探索出“产业链党委”模式。以华为、vivo等龙头企业党委为枢纽，串联132家上下游企业党组织，建立“需求共议、资源共筹、成果共享”机制。2024年促成芯片封装、工业软件等47项联合攻关，推动产业链整体研发效率提升37%。这种“党建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的战略远见。深圳前海也开展“区块链党建平台”的创新探索。通过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将党员参与组织生活、志愿服务等行为量化为“红色积分”，某企业因党建评级提升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增加40%。这种将政治信仰转化为信用资本的市场化机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广州开发区“党建飞地”模式则破解了小微企业党建覆盖难题。通过建立跨园区、跨企业的联合党支部，使32个创业团队的89名“口袋党员”重归组织生活。这种“组织根系”的柔性延伸既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覆盖、有效覆盖”的要求^[15]，又通过“党建+创投”模式孵化出217家“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政治优势与经济效率的辩证统一。

（二）政治社会化的场景嵌入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16]。广东在实践中突破传统灌输模式构建起新型政治社会化体系，这种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规律的当代诠释。珠海横琴“一国两制”教育基地的实景教学具有方法论创新价值。通过模拟跨境金融创新、税制改革协商等场景使港澳青年企业家在角色扮演中理解国家战略深意。2024年参训学员的“制度自信指数”从62.5分提升至89.7分，有力验证了习

近平总书记“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论断^[17]。某陶瓷企业创始人与90后“创二代”开展的“非遗数字化传承”调研不仅催生全国首个《传统工艺数字转化标准》，更在600小时协同工作中完成工匠精神的代际传递。此外“政治健康云档案”系统开发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尝试。通过采集参政议政、合规经营、社会贡献等指标参数，运用机器学习算法生成动态评价模型。通过定制化“政治体检报告”实施精准引导，当系统监测到某青年企业家连续三个月未参与组织生活时便会自动触发“红色导师”介入机制。这种数字画像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创新发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准施策的方法论，为新时代政治引领提供技术治理方案。

（三）政企共生关系的生态重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亲清政商关系”重要论述^[18]在广东实践中升华为“包容审慎—共生共荣—价值共创”的治理哲学，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探索。其中，深圳前海“政策沙盒”实验室的改革极具突破性。允许企业在监管护航下突破现有规制进行创新试验，某跨境电商试点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项目直接推动央行出台《跨境支付创新管理办法》。这种“企业探路政府修规”的协同模式将政企关系从“猫鼠博弈”转化为“创新伙伴”，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辩证思想^[19]。此外，东莞产业链创新议会制度则重构了产业治理范式。由龙头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组成的协商平台，建立“技术需求清单—政策供给清单—资源对接清单”转化机制。当华为提出5G基站芯片封装技术瓶颈时，议会随即整合7所高校、3家实验室资源，三个月组建200人攻关团队立马开展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生态，将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20]转化为产业链治理实践开创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微观实现路径。

（四）全球治理规则的主体性重塑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21]在广东“走出去”战略中具象化为新型的国际统战体系。以广州开发区国际标准创新中心的实践为例。200余家民企联合制定的《智能家电数据安

全标准》被东盟国家直接采纳为行业规范，带动相关产品出口增长42%。这种“技术标准—市场规则—文化认同”的递进式输出科学运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制度型开放”战略思想^[22]，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提供中国方案。而在非洲大陆“粤商文化驿站”的创新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功夫茶道、醒狮表演等文化符号解码，在当地社区获得不错的支持率。这种以文促经、以经固文的柔性统战策略将习近平总书记“文明交流互鉴”理念^[23]转化为市场准入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人文温度。更值得称道的是“合规护航”的机制创新。由涉外律师、技术专家组成的“红蓝军”团队，通过模拟美欧审查帮助大疆规避36亿元订单损失。这种将底线思维转化为防御艺术的实践有力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要论述^[24]，为新时代国际统战提供风险管理范式。

综上可见，广东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范式。这不仅推动全省民营经济贡献度持续领跑全国，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出湾区规则衔接的广东经验，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健康”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验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引领与市场规律深度融合的制度优势。实践证明，唯有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重要论述主动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创新，方能在百年变局中谱写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南粤华章，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更多广东智慧。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 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8.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5.
- [3]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33.
- [4]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0-09-12(01).
- [5]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

- 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0:27.
- [6] 习近平 .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0:27.
- [7] 习近平 .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J]. 求是 , 2021(20):4-9.
- [8] 习近平 .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11.
- [9] 习近平 .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22-07-31(01).
- [10]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Z]. 2019:2.
- [11] 习近平 . 论党的青年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2:44.
- [12] 习近平 .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15.
- [13] 习近平 .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2:14.
- [14] 习近平 .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7.
- [15] 习近平 .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21.
- [16] 习近平 .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0:66.
- [17] 习近平 .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 2016-12-09(01).
-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 [Z]. 2016:3.
- [19] 习近平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2020:245.
- [20] 习近平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1:21.
- [21] 习近平 .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8:56.
- [22] 习近平 . 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0:9.
- [23] 习近平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N]. 人民日报 , 2014-03-28(02).
- [24] 习近平 .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9:7.

【责任编辑：陈童敏】

地方政府对台交流合作中“XX·台湾周”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兼论建立“梅州·台湾周”的可能性与发展路径

张应雄

(梅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00)

摘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是通向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 拓宽了祖国统一的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 地方政府在开展对台交流合作时, 开展了对“XX·台湾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由于在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发展差异, 各地在探索与实践“XX·台湾周”模式上的成效各不相同。广东省梅州市在对台交流合作上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产业优势, 可以尝试建立对台交流的“XX·台湾周”模式, 不断提升和扩大对台交流合作的成效。

关键词: 对台交流; “XX·台湾周”模式; 梅州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53-0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 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指导相关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 在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作用”。《条例》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 为新时代对台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互惠;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地方政府在开展对台工作过程中对各种交流合作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这其中“XX·台湾周”模式凭借曝光热度高、影响范围广等特征被诸多地方政府所采用。广东省梅州市作为广东省对台工作重点市之一, 由于其独特的经济、

文化、族缘和区域优势等因素, 在对台统战工作中发挥着其他省市难以替代的作用。梅州市应该深入贯彻落实《条例》精神, 善加利用资源优势, 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 探索建立“梅州·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 进一步发挥其在对台交流合作中独特作用。

一、“XX·台湾周”模式的概念

所谓的“XX·台湾周”是国内一些地方政府^①在开展对台工作时采用的一种短周期、多元化、互动式的项目交流合作平台, 因其搭建相对简单且易推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开展对台交流合作的工作模式。在“XX·台湾周”模式里, “XX”为地方政府, 是举办活动的主体, “台湾”^②是参与活动的客体, “地方政府”与“台湾”是基于平等地位的互动关系。这种“周”模式能有效整合政府、企业、民众三个层面的立体互动, 同时, 相比于传统的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中“论坛模式”“研

收稿日期: 2025-05-30

作者简介: 张应雄(1988-), 男, 湖北应城人, 历史学硕士, 中共梅州市委党校(梅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 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

讨会模式”“交流会模式”等单一主题内容交流，具有交流项目多、范围广、内容丰富的独特优势，可以明显提升海峡两岸地方交流合作成效，增强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集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统战大局和地方对台交流合作。

二、“XX·台湾周”模式在地方政府对台交流合作中的应用与实践

（一）各地方政府对“XX·台湾周”模式的探索实践

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海峡两岸经贸日益密切、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各地方政府不断探索创新对台交流合作的形式。据现在可查资料显示，“XX·台湾周”雏形最早出现在2002年的辽宁省对台交流合作中，当年，该省举办了第一届“辽宁·台湾周”。此后，由于该交流合作平台对提升经济效益显著，“XX·台湾周”形式逐渐被众多地方政府所选择，成为常见的对台交流合作的活动平台，并逐渐形成一种模式。目前国内每年度应用“XX·台湾周”交流平台开展对台工作的地方政府（包括对台工作部门）主要有湖北省、浙江省、重庆市三个省市，其具体运行状况如表：

上述三个省市在“XX·台湾周”这一对台合作交流平台下集中开展对台项目交流，文化互动频繁、经济成果丰硕。此外，国内不少地方政府在开展对台交流合作时，也对“XX·台湾周”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尝试与实践。由于在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发展差异，各地在探索与

实践“XX·台湾周”模式上的成效各不相同。最早采用“XX·台湾周”交流平台的辽宁省，自2002年开始到2015年止共举办十四届“辽宁·台湾周”，此后停办。部分省市在个别年份也举办过此类交流活动，例如2006年“抚顺·台湾周”、2007年“南昌·台湾周”、2010年“江苏·台湾周”、2012年“洛阳·台湾周”、2015年“瓯海·台湾周”等，但都没有作为一种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2015至2017年，由京津冀三地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台北市黄埔四海同心会共同举办了三届“黄埔情缘·共促发展——京津冀台湾交流周”，此后也没有延续举办。疫情后，除湖北、重庆、浙江三省市外，其它个别省份也采用类似的模式举办过相关活动，例如2024年陕台文化交流周、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等。

此外，在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2008—2016），两岸政治关系有所改善，台湾对大陆的交流合作也采用过这种“周”模式，例如2010年“台湾·陕西周”、2010年“台湾·湖南周”、2010年“台湾·广东周”、2012年“台湾·江西活动周”、2013年“台湾·内蒙古周”、2013“台湾·山

省市 项目	湖北省	重庆市	浙江省
合作交流平台 (品牌)	“湖北·武汉台湾”	“重庆·台湾周”	“浙江·台湾合作周”
举办单位	湖北省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	重庆市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	浙江省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
首届时间	2004年9月	2009年5月	2013年6月
举办届数 (最近一次)	十八届（2024年10月25日至28日）	十六届（2024年9月9日至13日）	十届（2024年6月12日至15日）
活动内容 (最近一次)	以“鄂台一家亲 融合向未来”为主题，旨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和同胞心灵契合，涵盖经贸合作、基层交流、青年互动三大板块，共14项活动。	以加强两岸青年交流和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为主轴主线，涵盖了重要活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基层交往、青年交流5大板块，18个分项活动。	以“新质生产力与浙台融合发展”为主题，着力深化浙台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产业对接合作。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举办专题经贸对接活动。
交流成果 (最近一次)	活动期间，共签约项目46个，总金额171.21亿元人民币，涉及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文化、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等领域。	活动期间，集中签订两岸经贸合作重点项目9个，投资总额达118.7亿元人民币，涉及重庆市7个区县和开放平台。	活动期间，签约台资项目47个，总金额308.86亿元人民币，项目涵盖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多个行业。

东经贸文化周”等。由此可知，这种“周”模式是被海峡两岸地方政府所共同认可、共同采用的交流合作方式。但至2016年，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由于受政治因素等各方面影响，台湾方面中止了这种“周”模式的交流。

（二）“XX·台湾周”模式在应用实践中的效果分析

1. 举办时空灵活，被应用范围广泛。“XX·台湾周”模式，在活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前期的活动方案作为支撑，受季节、气候、地理空间等因素影响较小，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年度工作计划自主地灵活地选择举办的具体时间、地点。在举办时间上，每年各地方政府举办“XX·台湾周”时间各不相同，同一地方政府举办每届“XX·台湾周”的具体月份也不相同，时长一般时间不超过一周。新时代以来，在举办形式上，“XX·台湾周”举办形式由原来“单一会场”转向“主会场+分会场”，形成“省会+地市”联动模式，形成“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1]

2. 涵盖内容丰富，可拓展空间无限。“XX·台湾周”模式，按交流内容可以划分为人文和经贸两大板块。随着2008年两岸“大三通”的正式启动，人文交流合作内容涵盖但不局限于青年、文化、民俗、美食、基层治理等领域。在经贸合作上，从最初的五金、电子、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照护等领域拓展，合作项目涵盖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等多个行业领域^[2]，突破了台资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项目合作的传统。

3. 集聚效应明显，促交流成效巨大。“XX·台湾周”模式以集中交流的方式进行项目合作，以集聚交流产生集聚效益，提升地方政府对台交流合作的影响。以2024年“湖北·武汉台湾周”为例，鄂台企业家代表现场签约项目46个，总金额171.21亿元人民币。^[3]由于交流项目集中、交流内容丰富，短时间内通过新闻媒体的高曝光宣传报道，其社会效益超过了“论坛模式”“研讨会模式”“交流会模式”等单一的交流平台模式。以2023年“湖北·武汉台湾周”为例，该话题在新浪微博的阅读量接近

300万，吸引了两岸相关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参与，促进了鄂台两地的交流交往。

（三）制约“XX·台湾周”模式应用实践的不利因素

1. 受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自2016年台湾民进党重新掌握台湾地区领导权开始，在“台独”和“去中国化”思想影响下，台湾当局先后提出“从世界走向中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等煽动言论，推出“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把“全球经济布局”和“新南向政策”作为主要经济策略，制定了严格的法规来限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和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并通过恶化两岸关系和抹黑大陆疫情等手段，截断了很多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机会。赖清德上台后，继续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和融入所谓的“民主供应链”，妄图打造一个“经济日不落”的台湾。以人文经贸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XX·台湾周”举办成效不免受到民进党政治操弄的影响。

2. 台资企业投资意愿逐年降低。一方面，受台湾民进党重新掌权以来两岸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从2016年开始，台湾对非中国大陆地区的投资首次超越对大陆的投资，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从2010年占总对外投资的83.8%，下降到2024年7.5%，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在大陆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大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台企难以适应大陆的产业转型需求，其技术优势在不断减弱，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正在被大陆内资企业赶超。^[4]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市对台交流经贸合作项目数量和合作金额数量下降尤为明显，进而不得不中止“台湾周”的举办。

3. 不同地区、不同举办层级效果差异明显。由于各省市、各行政单位落实中央政策的进度不一，再加上所具备的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水平以及资源调度差异，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区位分布具有聚集性，投资规模具有省域异质性。^[5]受到“投资规模省域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各省级地方政府之间、各地市政府之间举办“XX·台湾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距。从浙江、湖北、重庆三省市2024年的台湾周合作效果来看，浙江省>湖北省>重庆市。这也直接反映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对台资企业吸引程度和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区域选择偏好。

此外，省级行政区政府拥有的行政资源又能够开展多样化的地方实践，且行政区范围内政策尝试类型逐步丰富、多面化^[6]，因而省级地方政府对台交流合作成果要优于市级地方政府。

三、“XX·台湾周”模式在梅州对台交流合作中的可能性分析

（一）现存的优势

1. 梅台两地具有深厚的民情基础。梅州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缘相通、文缘相连、商缘相生。据统计，台湾 500 多万客家人中，祖籍梅州的约有 180 多万人，是祖籍汕头的台湾人的 6 倍，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政要、商业巨子和文化名流。自 1987 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梅台两地的经贸及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仅 2024 年，来梅交流台湾青年（16 岁 -40 岁）人数达到 188 人，邀请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台湾客家总商会、各地台商协会等来梅考察交流等共 28 批 870 人次。^[7]以客家文化为纽带的经贸文化交流，让“两岸一家亲”理念在梅台两地得到生动实践，民情基础得到不断夯实。

2. 梅州具有对台交流的政策优势。广东凭借其独特的经济、文化、族缘和区域优势等，在对台统战工作中发挥着其他省份难以替代的作用。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客家文化底蕴深厚，同时梅州也是重要的“台胞之乡”。2011 年 6 月，梅州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全国客家地区第一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是广东省对台工作重点市之一，相比于抚顺、洛阳、南昌等地市更具有天然优势。

3. 梅州拥有相对健全的惠台措施。为贯彻落实中央“31 条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等惠台利民政策，广东省因地制宜推出“粤台 48 条”，给予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同等待遇”、共享“广东红利”、着眼“粤台融合”、回应“台胞诉求”。^[8]早在 2010 年，为推动广东梅州梅江台湾农民创业园，梅州市就已配套出台了《关于加快梅台农业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印发〈梅台农业交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2019 年，制定了《〈

关于促进梅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2025 年，出台了“免费梅州”实施方案。这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立足梅州实际研究制定，富有特色、可操作性强、务实管用，为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在梅州投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4. 台企在梅发展形成一定数量聚集。自 1988 年第一家台资企业在梅州落户以来，截至 2023 年 11 月，梅州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238 家，累计合同台资 2.55 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台资 1.61 亿美元。^[9]台资企业在梅州市各县（市、区）基本都有分布，其中五华县、梅江区、兴宁市较多。梅州五华县台商工业园是粤东地区县级兴建的第一个台商工业园，也是广东省首家由台商投资开发的县级工业园区。梅州梅江台湾农民创业园，是全国 29 家、全省 3 家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之一。台资企业在梅州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集，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精致高效农业及解决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对台交流合作平台品牌。近几年，梅州市对台人文交流活动频繁。以 2024 年梅州对台交流合作项目为例，梅州先后举办了国台办重点交流项目“山歌唱响故乡情”台湾百名同胞回乡交流活动、梅台青年夏令营活动、两岸一家亲 共叙客家情——“四海同心”台湾客籍子弟原乡文化寻根之旅参访团活动，承办省台办重点交流项目第十一届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举办“两岸同根同源 共建人文湾区”文创交流活动、山歌唱响故乡情文艺晚会暨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粤台农友恳谈会、台湾香港梅州三地大埔青年“寻根·圆梦”交流活动、以歌会友·台湾客家青年歌手梅州行交流活动。虽然梅州现有的对台交流项目众多，但这些单一主题的交流项目并没有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集中统一的交流合作平台，活动效应和社会效应不明显。

2. 举办“XX·台湾周”可借鉴经验不多。市级地方政府没有省级地方政府的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在“XX·台湾周”模式上应用实践效果不如省级地方政府。抚顺、南昌、洛阳三地采用“XX·台湾周”这一交流合作平台均是因为当年度有具体经

贸人文交流项目，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模式。目前常态化每年采用“XX·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的地市尚无，梅州在这方面可借鉴经验不多。

3. 在梅台企的集聚仍有不足且发展质量不高。截止2024年，汕头市拥有台资企业100多家，累计台资企业合同投资总额20多亿美元。梅州拥有注册台资且在经营的台资企业31家，累计台资企业合同投资总额2.55亿美元。不管是在梅的台资企业数量，还是累计台资企业合同投资总额都远远低于汕头市。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梅州原本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微小型台资企业缺乏产业链支撑和自主创新能力，自我调节适应市场能力和风险防控较差，在梅台资企业总体生产经营情况正在走下坡路。

（三）综合分析

目前梅州对台交流主要集中在人文交流层面。梅台关系呈现“人文热、经贸冷”的状态。梅州具备建立和打造“梅州·台湾周”合作交流平台的民情基础、产业基础以及政策基础。为推动梅台两地融合发展，梅州市应该在借鉴参考“汕头·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向湖北、重庆、浙江三省市的“台湾周”模式学习，积极争取广东省委支持，探索建立“梅州·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夯实梅台两地人文交流，提升梅台两地经贸项目合作成果，扭转在梅台资企业发展颓势，推动梅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梅州·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也是做好对台工作的方法论。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思维，不断完善梅州对台工作的体制机制，建立“梅州·台湾周”合作交流平台应该坚持“文化交流为前导，逐步升级经贸合作”的思路和交流发展路径，聚焦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两大板块，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

（一）第一阶段：建立夯实“梅州·台湾周”

合作交流平台

1. 发展期限与目标。此阶段交流以文化交流为主，经济产业合作为辅，积极争取省委台办支持、利用3至5年时间，搭建起互鉴、互通、互联、互助的“梅州·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以客家文化为纽带，吸引更多台湾“首来族”来梅人数，着力解决在梅台资企业“量”上不足的问题，让台资企业成为“梅州·台湾周”的参与者、受益者，基本实现梅台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大发展。

2. 合作交流内容设置。文化交流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广泛邀请两岸青年代表、学者以及文化、教育、企业界等人士共同参与，选择部分现有交流项目在“梅州·台湾周”活动期间集中举办，尝试推动文创交流活动向文创产业发展，形成文化交流聚集效应，拉升文旅经济。经济合作上，梅州作为台商投资密集区域应围绕产业集聚为政策取向，使台商扎根于当地的区域创新环境。^[10]大力加强招商平台和载体建设，举办梅台经济（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梅台项目合作洽谈会、在梅台资企业发展座谈会、梅台农业合作交流会，设立台湾特色商品展示区、台湾美食展示区和互动体验区，建设梅台电商合作产业园等。

（二）第二阶段：逐步升级“梅州·台湾周”合作交流平台

1. 发展期限与目标。此阶段着力解决在梅台资企业“质”的问题。利用5到10年，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提升“梅州·台湾周”交流合作平台，聚力打造台胞筑梦的“向往地”，成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和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2. 合作交流内容设置。文化交流上，梅州具有发展文创产业的资源优势，而台湾地区的文创产业在理念、产品开发和运营方面优势明显，两地存在很强的互补优势。要持续扩大梅台两地各类客家特色交流项目，结合梅州市各县（市、区）特色开设分会场，重点围绕文创产业合作交流活动，推动“文化+”“+文化”赋能相关文旅产业发展。经济交流上，探索对接世界客商大会（可同期举办），围绕梅州市各县（市、区）特色产业和台资企业发展状况、瞄准未来新兴高技术行业和产业，召开梅台两地企业家峰会、梅台中小企业合作发展论坛、在

梅台资企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民间团体行业技术创新研讨会，开展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的对台招商引资洽谈会，举办在梅台资企业经济成果展、台资企业专项人才招聘会等，促进梅台合作层次从一般产业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拓展。

注释：

- ① 宪法第 95 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简称“地方”。这里主要指省级地方政府、市级地方政府。
- ② 这里的“台湾”不仅仅包括台湾行政区域管辖地内的各级政府，也包括以属地为台湾的企业、团体、协会等对象要素在内的各行业及人员。

参考文献

- [1] 第十六届“重庆·台湾周”新闻发布会 [EB/OL]. 重庆人民政府网 . https://www.cq.gov.cn/igixmj/gkzxft/202409/tInterview_21424.html, 2024-09-04.
- [2] 43.42 亿美元花开“浙”里，2024 浙江·台湾合作周精彩启幕 [EB/OL]. 钱江晚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1665522402960292&wfr=spider&for=pc>, 2024-06-12.
- [3] 第十八届湖北·武汉台湾周 26 日在汉开幕 [EB/OL]. 汉台看点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4301463889189641&wfr=spider&for=pc>, 2024-10-30.
- [4] 台资企业融入中国大陆内循环研究 [EB/OL]. 中国评论新闻网 . <https://gb.crntt.com/doc/1070/4/7/2/107047259&mode=041823273>, 2025-04-16.
- [5][6] 黄莹欣 . 对台经济政策促进台商投资的效果评估——基于合成控制法 [D]. 暨南大学, 2021: 21, 16.
- [7] 梅州市台港澳办 . 梅州市台港澳办 2024 年主要工作情况 [E], 2024-12-31.
- [8] 看过来！2018 各省市惠及台湾同胞政策大汇总 [EB/OL]. 中国台湾网 . http://www.taiwan.cn/31t/zcfb/201807/t20180725_12039451.htm, 2018-04-16.
- [9] 梅州市台港澳办 . 梅州市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E], 2023-11-24.
- [10] 王永龙, 郑胜利 . 台商投资从集聚到集群的对策分析 [J]. 经济问题, 2002(09): 49.

【责任编辑：陈童敏】

论《共产党宣言》中的大统战思想及其法理意涵

陈 灿

(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型政党,执政地位和方式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定,将大统战格局构建纳入法制化轨道,是实现统战目标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内等重要文献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了法理依据。一体化考量相关文本之间的法理精神,有助于拓展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研究视野和推进当代中国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统战思想;依法治国;宪法;党章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59-07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其内含的统战思想既是“阶级意识”的产物,也是“民族意识”的产物,更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和领导本民族建设国家的重要行动指南。从法理层面对《宣言》中的统战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拓展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研究视野和推进当代中国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

一、“大统战”的科学内涵

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本条例所称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1]这里谈到的其实是领导主体和实施主体,即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身份唯一,而两个“联盟”则是执行这条路线的两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也可以称其为“一体两翼”。随后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事实上,“统一战线”的这个历史地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得到充分认可,成为“三大法宝”之一。

这一规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科学内涵作了权威的学理和法理解释。文中还列举了十二个主体是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即“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3]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他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4]按常理,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优秀分子不在少数,

收稿日期: 2025-05-30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产党宣言》中的‘中国意识’研究”(HZSK2024GJ010),惠州学院 2024 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重写意识研究”(hzudj2024003)、“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回溯与发展研究”(hzutz2024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灿(1984-),男,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

但毛泽东却坚定地认为“某些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要比工人阶级还大。不难发现，所谓“某些时候”即指决定革命胜利的关口、实现重大社会变革的临界点，此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对资产阶级中的这个特殊群体专门作了界定，在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的第 2 小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指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5]结合马克思他们后面的论述，可见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大相径庭，若是争取过来，对革命事业就会有大的贡献，但放任自流，对革命事业就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经典文章中就延续了《宣言》的创作手法和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我们党的统战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他强调：“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的事业，“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6]还要“着力培养一批同我们党亲密合作的党外代表人士。”^[7]可见，党的历代领导人对“大统战”的理解是一贯的，与《宣言》的精神也是相通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事实上构成了“大统战”的法源。

二、大统战思想蕴含的法理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型政党，其执政地位和方式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定，将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纳入法制化轨道，是实现统战目标的必由之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物，但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各种领导力量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本身的先进性即先锋队特质，它只能从“现代历史”中获取，“法治主义”为当代理解这个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考察坐标。按照法学家喻中的观点，一方面马基雅维

里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学之父，其学说的“现代性”路向指引叩开了西方通往“现代”的大门^[8]；另一方面，宪法作为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的制度来源，同样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也即是说“现代宪法就是政党宪法”^[9]。在当代中国，法制的全面落实就在于“全面依法治国”，也即是说，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的思维方式必须从阶级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话语方式寻求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这个转变对大统战格局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词源考证

在《宣言》中，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立场、观点以及统战思想时，存在一个独特的和有趣的现象，就是《宣言》中经常出现一些法律名词，而大多数人（法学者除外）在研究《宣言》或学习《宣言》时也会一带而过。事实上，马克思作为撰写《宣言》的主创者，他既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但更是一个出生于犹太法学世家并在大学阶段接受了专业化的法学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法律思维在他创作《宣言》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马克思他们在《宣言》中提及的这些法律专有名词，通过文本关键词的提取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含注释）：

政党类：指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及“反对党”一词出现 12 次；

国家类：“国家”和“国家机器”出现 37 次；

司法类：“法”单独出现 12 次，“法律”出现 6 次；

宪法类：“宪章”或“宪章派”出现 2 次。

在上述所列专有名词中，宪法类名词“宪章”或“宪章派”就很值得探究。通常而言，“宪章”或“宪章派”用来指代英国 1837 年发生的宪章运动事件。该运动一个积极的成果就是下院 6 名议员和 6 名伦敦工人协会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向议会提出了“人民宪章”的议案，该案中罗列了 6 项工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有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 1 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酬，但该提案连续三次都被议会否决了^[10]。此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的世界意义重大，以至于恩格斯和列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这个“宪章运动”从法制视角转为“统战视角”

来看，一个事实就是，该运动是由所谓的“宪章派”发起的，而这个“宪章派”所代表的利益受众是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律而且是从“程序法”（当然，英国是判例渊源的国家）出发，按照议会的要求提起议案，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说明无产阶级将“阶级意识”转化为法制思维，准备从法律层面推进工人运动，并主要是实现好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从整个运动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被宪章派组织和发动起来，大家都支持这个议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就是在践行《宣言》中的“统战”思想即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主要文本的法理逻辑指认

“法”是阶级意志的最高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主要来源和文本呈现，主要有《共产党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它们蕴含的法理精神是一贯的，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的指导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上也是高度统一的，需要进行一体化考量。

1.《共产党宣言》

《宣言》在阐述资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集中必然导致政治的集中时指出，“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1]很显然，这里的“统一”，指向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及其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亦即以“阶级意识”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宗教、法律等等；而“统一”所针对的或排斥的对象恰恰就是无产阶级，因而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一方面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在这个集中趋势里凝结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

此外，《宣言》还指出，“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2]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的共同意志有多强，它都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反映自身利益的法律、道德、教育，一句话，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

和意识形态。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才认为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而这种联合后的结果，就是要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推行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所以才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后的十条措施。当然，《宣言》对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思想还从多个层面进行了阐述。这体现了《宣言》作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

2.《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充分表达，对党员领导干部具有最彻底的约束力，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也可以说是党内法规体系总的“宪法”。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制度性文件，在由30个段落构成的“总纲”中，有7个段落最明显也最集中地阐述了“大统战”思想。

这些段落有：第一段、第十段、第十六段、第二十至第二十二段、第三十段，内容占到了整个“总纲”部分篇幅的23%，足见中国共产党对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依法治国时强调，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13]换言之，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融入国家法治思想体系提供了指导思想。

事实上，《党章》揭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内含的法理精神具有“政治法学”的意义，因为这是“以一种更关注宏观政治背景、规律及其变迁的学术立场，全面阐释‘权威’、秩序、规范的政治及其法律意涵。”^[14]这体现了《党章》作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政治逻辑。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明文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15]“工农联盟”实际上即为“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这里可以看作是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无产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也可以视为“小统战”，它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

《宪法》“序言”还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16]此处继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总纲”接着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7]这一部分是《宪法》“序言”中阐述“大统战思想”最集中的地方，和《党章》“总纲”中的统战思想的内涵完全一致，也即是说《宪法》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法律地位。

《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要指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它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18]的活动准则。这事实上也是用统战的语言阐述法治的道理。这体现了《宪法》作为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法理逻辑。

三、法理精神涵养的统战实践

“法理”，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同时还融入了《宣言》承载

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从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所凝练出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并在中国实践中实现了《宣言》精神的赓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中，这是一个突出的特色，必须被标注出来。

1. 党内法视角

党内法，通常是指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党委主持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主体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的统称，也可叫做“党内法规”。从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根据 2021 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显示，党内法规就有 183 部。

《党章》“总纲”中的第一句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9]。这样的表述不是任意而为，一方面它的精神源头是《宣言》，所以“工人阶级”是共同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它又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壤之中，所以“中华民族”是共同的文化认同，所以激发出了两种意识，一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意识”，一个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而“先锋队意识”这里面就内含有“统战意识”。喻中对“先锋队意识”进行了学理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队的意识”^[20]。不仅如此，《党章》的“总纲”中还进一步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1]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上的先进性是首要前提，而这一要求在《宣言》中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就作了类似的表述；此外，如果说此处的“统战思想”还是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着，那么在《党章》中总结历史经验时提出了“十个坚持”，其中一个就是“统一战线”；在“民主政治”部分则谈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此外还谈到了维护和发展民族团结，还要“同全国各民族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全国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22]最后，还谈到要加强和各国、各政党的合作，实现民族利益和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以及要统筹和加强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至此，《党章》基本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

可以肯定，《党章》把《宣言》作为“阶级意识”的来源并一以贯之；同时，《党章》还单独把《宣言》中的统战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思想结晶“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构成了“大统战工作格局”意识。因此在理性认知层面就会形成这种感觉，从阶级意识的来源来看，显然《党章》中的“统战意识”要高于“民族意识”，这一点从篇幅上就能直观地作出判断，但是若从地位上来看，《党章》中的“统战意识”这个“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又互为表里；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战意识”天然就包含在“民族意识”之中，反之，“民族意识”本质上也包含了“统战意识”。

2. 宪法学视角

有法学家阐述过一个重要的学术主张，认为“政党离不开宪法，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依据，也就是说，宪法构成了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23]其学理逻辑指认，可追索至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而这个宪章的诞生，正是政党政治博弈的产物，进而言之，“现代宪法就是政党宪法”^[24]。随后，该学者继续指出“中国宪法本身就是党的主张、党的意志的法律化的表达、宪法化表达。”^[25]所以，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而中国宪法的进步和完善，“既要尊重西方的

主流观念，但也躲不开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26]

众所周知，在国家层面，政治惯例通常都不会写入宪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国家的政治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这个惯例来进行，于是在宪法层面就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这些政党政治的行为都没有违反宪法精神，但宪法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二是这些政党政治生活恰恰是实践宪法精神的结果，大多数时候又直接作用于统战格局的建设。事实上在政治实践中，以每年都要召开的全国“两会”^[27]（人大和政协的政治活动，均具备宪法所授权或规定的精神，从统战工作赋能现代国家治理视角来看，人大的会议侧重“制定政策”，政协的会议侧重于“民主协商”）为例能够看到，虽然各级会议都遵循了“组织法”的要求，有序进行，但事实上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时长等重要事项并不会作出详细的规定。诚然，无论作为政党还是政府，其活动都必须基于法律的授权，但在实践上很多重大事项未详细规定，这似乎有悖于公开、透明等现代价值。可基于实践的理由，这一现象当然不能视为一种“过错”，追其根源乃是一定的政治文化使然。

通过这样的视角能够看到，不管是地方上还是国家层面的政党政治行为或政治生活，都释放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参与活动的主体，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他们都围绕“共商国是”在各种场合活动，但这并没有削弱《宪法》的精神和权威，反而得到加强。而参政议政这些活动又都是宪法精神实现的必由之路，宪法精神实现了，就是政党意志的实现。这也就是说，《宣言》承载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实现，需要借助特定的载体和具体的形式，在现代国家中尤其是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其政党活动、国家行为等都打烙上由《宣言》释放出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

3. 国际法学视角

事实上，对“统一战线”内涵的理解存在两个维度，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统一战线，通常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策略，是属于狭义的使用和理解，也是大多数人的一般性的理解；而另一层面意思，

是指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开展与各民族、国家、政党的间的“联合”行为，旨在解决两国、两党或者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贸易、气候、贫困、战争等全球治理议题，这些问题都是各国政府、政党及国际组织的核心利益，更是利害关联国家执政党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

“大统战”思维必然延伸出来的认知，就具有了国际法学的法律意义。这一点从《宣言》的相关阐述中不难看出。

比如，我国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他们进行的国事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所阐述的主张、签署或见证签署的两国、两党或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文件，这些行为有的是代表国家、有的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有的是代表全国人大，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实行与欧美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他们的身份首先都是中共党员，其次他们也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具有双重属性，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又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民族立场，这为丰富国际法学内涵贡献了政党智慧。因此，他们所阐述的主张、签署或见证签署的两国、两党或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能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这一点在法理学上是成立的，当然与《宣言》的精神旨趣也高度吻合。所以，“在历史变革的关头，重寻法律的源头，不仅是政治革命的任务，更是法律变革的内在要求。”^[28]

总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转向建设型政党、由民族型政党转向世界型政党，既积极主动回应了《宣言》，又在这种身份转换中创生和推动了一系列国际法的诞生。显然，中国个案为我们理解国际法的未来图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2) : 4—11.
- [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2) : 4—11.
- [3] 同上, 4—11.
- [4]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60.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01.
- [6]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 4—7.
- [7] 同上, 4—7.
- [8] 喻中. 法家的现代性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3.
- [9] 喻中. 宪法社会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41.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8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7.
- [12] 同上, 28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19.
- [14] 喻中主编. 政治法学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8.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3.
- [16] 同上, 3.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4.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41.
- [19] 中国共产党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
- [20] 喻中. 法理四篇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92.
- [21] 中国共产党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2.
- [22] 中国共产党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17.
- [23] 喻中. 宪法社会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42.
- [24] 同上, 44.
- [25] 同上, 52.
- [26] 同上, 71.
- [27] 人大和政协的政治活动, 均具备宪法所授权或规定的精

神，从统战工作赋能现代国家治理视角来看，人大的会议侧重“党内统战”，政协的会议侧重于“党外统战”。

[28] 高祥主编. 比较法学原理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51.

【责任编辑 张山】

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朱振辉¹, 朱宗友²

(1. 中共阜阳市委党校, 安徽 阜阳 236000; 2. 阜阳师范大学,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二者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爱国”,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凝智聚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属性, 二者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互补性。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制度优势, 要优化选举机制、细化协商机制、谋划决策机制、量化管理机制、强化监督机制。

关键词: 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 爱国统一战线; 全过程人民民主;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66-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1]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本质和民主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它与人民民主同根、同质、同源, 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关键一环。因此, 创新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机制,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联

(一)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深刻总结百年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而组织起来的政治联盟。其核心要义在于“爱国”, 即统一战线的构建与巩固, 始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 这一共同目标汇聚最广泛的力量。因此, 它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 “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也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3]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盟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的鲜明特色。其成员“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4]。这种包容涵盖了政治立场上的多样性, 能够最大限

收稿日期: 2025-0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图景及实践路径研究”(22BKS071)、安徽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机制研究”(2022CX1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振辉(1966.12-), 中共阜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委会委员、科研处处长、教授, 安徽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研究员、阜阳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朱宗友(1971.10-), 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 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5]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使命, 在这一使命的引领下, 统一战线成员无论来自哪个阶层、哪个领域, 都能找到共同的奋斗方向和价值追求,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7], 相对西方民主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相对传统民主实践是一种深刻的提炼和升华。“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8]这种民主理念彻底颠覆了传统民主模式中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逻辑, 实现了民主的真正回归。其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故“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典型制度形态, 开辟人类政治文明新境界”^[9]。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人民性、系统性、全面性、有效性的基本特征^[10], 人民群众能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种全新的民主可以让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管理权、监督权得到充分的保护, 将党的决策和人民的心愿紧密相连。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 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 实现了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这种民主实践“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11]“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2]

（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关联

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始终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法宝, “因团结而生, 靠团结而兴”, ^[13]民主是人民奋斗的价值目标, 人民通过统一战线民主功能的发挥实现当家作主。二者在理论依据、发展动因和实践基础方面均体现出

高度的统一性和互补性。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 这个运动的第一步, 就是“争得民主”, 其所建立的国家必须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实现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5]。这就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建设同根、同质、同源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得民主、建立政权必须发展壮大统一战线, 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证明。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积极参与,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统战促民主, 以民主促发展, 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构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考量的关键要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就要更好地动员全体民众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全力以赴。一方面,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个性化追求, 促使统一战线在团结和动员各界力量时发挥其广泛性、多层次性的联盟优势得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迫切追求, 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中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时代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和联合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序参与, 就是统一战线促民主发展的生动实践。凝心聚智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进社会的协调与创新, 在改革发展中有序纾解社会主要矛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为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聚焦“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全面完成深改任务，必须壮大统一战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制度为主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释放改革的热情聚集改革的动力。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时代要求统一战线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实现。这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实践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一是发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导向。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联合了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使统战工作范围扩展到“十二个层面”^⑦。这种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使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够直接地传递到决策层，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基层实践中，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和举办各类协商会、座谈会、听证会察民情、汇民声、聚民意，促使民主价值与现实治理有效对接。

其二是彰显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特色，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基础。新时代统一战线着力调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进一步夯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基础。通过加强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动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将各民族团结得“像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一样”，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全方位”的民主治理模式。

其三是健全了协商民主制度，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新型政党制度为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形式，生成了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及反馈机制。通过各类组织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健全了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和基层群众工作制度，丰富了基层民主实现形式。

其四是聚焦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党的中心工作，加快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步伐。新时代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各类调研活动资政建言，为党和政府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统一战线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一线对人民关心的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整改意见，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回应人民的意愿和心声，真实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与亟待拓展的空间。

其一，选举机制需要优化。统一战线以其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聚力汇智等优势特点促进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发展。然而，在整合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方面、推动民众广泛政治参与方面、助力选举文化建设等方面，人大职能部门中的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作用发挥还明显不够。特别是当今社会中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冷漠或迷茫，对“我是谁、我为谁、谁为我”的问题缺乏清晰认识，生活在“自我世界”之中^⑧，这种情况表明统一战线在优化代表比例、提高覆盖率以及确保代表素质优良并增强其履职尽责能力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二，协商机制需要细化。当下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同一单元互不相识”^⑨，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原子化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不利于人们日常的交流和联系，不利改革、发展、稳定等事项的沟通和协商。因此，增强“陌生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统一战线在充分发挥协调组织功能

推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联系, 鼓励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商与联动, 构建新型社会联结机制, 做到“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显然这是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其三, 决策机制尚需谋划。5G时代人们的交往形式更加多样便捷,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方式已成为常态, 这为新时代民主决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时代要求党委政府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新媒体平台, 快速有效地收集、筛选和分析大量的信息, 及时甄别虚假信息^⑩。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判, 准确把握舆情动态和公众需求, 引导群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决策过程,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力, 增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这必然是统一战线服务民主决策要解决的问题。

其四, 管理机制尚需量化。新时代改革要聚焦人民的呼声, 发展要聚焦人民的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 民众期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 便捷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 在基础设施领域, 民众期盼便捷的公共交通, 优美的居住环境、设施齐全的社区, 清新的绿地公园等^⑪; 在就业与社会保障领域, 民众期望稳定的就业机会、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统一战线在针对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调研、为民主决策提供量化参考方面仍存在短板。从改进到有效供给的进程来看, 促进民主科学管理体制的完善仍需加强。

其五, 监督机制亟待强化。当前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还存在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协同性不足问题。有些政策在基层落实过程中存在打折扣的情况, 影响治理效果^⑫。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制度之间有时缺乏有效的衔接和协同, 导致治理过程中出现矛盾冲突。现实情况表明, 要抓好抓实民声呼应工作, 强化各项制度的完善和执行。统一战线在发挥协调各方、民主监督功能时, 如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确保治理体系全面贯彻落实, 进而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方面仍需改进完善。

三、优化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发展实践机制的对策

(一) 扩大统战工作对象范围提升政治参与能力, 助力优化选举新机制

民主选举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是产生人大代表和人民公仆的基石, 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为此要构建科学、合理、高效的民主选举机制。

其一是民主选举要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民主选举的核心在于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 确保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选举要聚焦人民信赖的、有能力、有担当、廉洁奉公的优秀人才, 增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

其二是优化选举要增强民主选举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确保公平性。要适当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比例, 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新经济组织人士代表名额, 最大限度地将各方有识之士选入代表中为民代言。要积极探索有效方式动员00后年轻人参与民主选举, 深入分析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为政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智慧。

其三是优化选举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 发挥网络统战作用提升民主选举的科学性。在民主选举中,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 建立选民信息库, 增设在线投票系统、计票系统, 优化选举流程、减少人为干预, 提高选举效率、避免人为错误, 确保选举结果的准确性和公信力。

其四是优化选举要发挥党外人士“双重代表”职责, 提升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水平。社会主义学院要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培训和引导, 提高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党外人士之间也要沟通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保障选举过程的公平、公正和有效。

(二) 筑牢统战交友平台拓展网络交流渠道, 助力细化协商新机制

民主协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决策。为此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

其一是民主协商要聚焦新时代民声呼应与改革要求。民主协商的本义在于通过充分的沟通商讨,

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事业中来。在决策前后和执行过程中，对民众关切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达成基本共识。

其二是互动协商机制要进一步提升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作用。要在完善考评机制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丰富协商形式，提升调研质量注重成果转化，完善协商规则加强协商文化建设等方面协商互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三是互动协商机制要发挥网络统战力量，形成各方参与联动。建立协商民主的联动机制，要发挥网络论坛、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作用，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线上打卡”活动，将线上成果快速转化为线下行动，推动协商共识定制见效。

其四是互动协商机制要着眼基层协商，做实做好基层民声呼应工作。打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后一公里”，就要充分发挥社区议事会、村民代表会的职能，就教育、医疗、养老等民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协商对话，确保协商民主的真实有效。

（三）发挥统战优势凝聚民众智慧，助力谋划决策新机制

民主决策是将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

其一是民主决策，要聚焦统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职能定位精准发力。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围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科技创新等重点工作，凝聚各方力量、创新工作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进行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谋划决策。

其二是民主决策的机制要动员民众的广泛参与、集体决定。这就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层次多样的政治优势，将社会各界名流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纳入上层决策，经充分协商形成共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

其三是民主决策的机制要程序科学规范、运用方法灵活。统一战线汇聚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同阶层的行业精英、不同群体社会贤达，他们以其丰富的智慧经验，在应对现实复杂问题时，能够创制出适应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机制。

其四是民主决策的机制要以人为本，使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要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和平台，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的优势作用，积极献计献策，让民众“吐槽”建言，确保决策“接地气、见实效”。

（四）汇聚统战人才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量化管理新机制

民主管理是确保政策落地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它致力于通过互动协作的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预期目标的达成。

其一是民主管理的创新机制要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在工作运行中，积极动员社会各界，贯彻新发展理念，激活民众创造力，借助统战工作联系广泛的优势，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为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其二是民主管理的创新机制要发挥好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高地”的优势，广泛汇聚各类人才资源，为民主管理提供大量的优秀“拔尖人才”。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吸引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党外青年才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其三是民主管理的创新机制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安全发展为常态。创新管理要发挥统战成员的多元优势，要面向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统战成员的广泛参与和专业能力，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精准分析，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其四是民主管理的创新机制要确保决策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新经济组织中统战成员的积极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现代企业主体，有效利用统战力量推动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公平公正的统一大市场，引导新经济组织中的统战成员运用价值规律服务民生，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化配置。

（五）聚焦统战工作确保制度落实，助力完善监督新机制

民主监督是民主管理的效能化，民众通过各种形式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督查与评估，将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

其一是民主监督的保障机制要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构建和运行。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作用就是要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始终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履职尽责, 将政策落地、制度落实、效能实现。

其二是民主监督的保障机制重在各项制度的健全、完善和落实。这要求集统战之优势, 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治理体系, 汇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同时, 深入基层体察社情民意, 致力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路径的改进。

其三是民主监督的保障机制要促使国家治理的效能充分彰显。统一战线所具有的优势可以很好地做到由“制”到“治”的转变。统一战线能够汇聚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信仰的人士, 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保障制度落地见效。

其四是民主监督的保障机制要流程规范、监督有力。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制度设计, 借助统战成员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多元专业背景, 细化实施规则和操作流程, 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督平台, 建立针对统战成员监督参与度和成效的考核机制, 将统战资源优势转化为监督动力, 确保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的监督体系。

四、结语

综上,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着诸多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 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唤起人民群众的创新发展热情, 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必须凝聚起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优势作用, 要以体制创新为抓手, 动员全体人民聚焦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年, 第50页。
-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年,

第36页。

- ③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年, 第78页。
- ④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年, 第3页。
- ⑤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求是》2024年第2期。
- ⑥ 习近平: 《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第556页。
- ⑦ 李君如: 《中国式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3年, 第77页。
- ⑧ 习近平: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华社发布, 2019年11月3日。
- ⑨ 参见包心鉴: 《全过程人民民主: 开辟人类政治文明新境界》,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
- ⑩ 参见蔡文成: 《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特征》,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
- ⑪ 《中共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年, 第49页。
- ⑫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求是》2024年第4期。
- ⑬ 2022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国新闻网2022年8月1日。
- ⑭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39页。
- ⑮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138页。
- 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年, 第37页。
- ⑰ 参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年, 第5页。
- ⑱ 调研中发现新阶层人士中大多数关心的是物质利益, 对政治的参与度不高; 超过四分之一的轻年人日常与手机网络为伴, 生活在“自我世界”里。
- ⑲ 城市中的新小区、高层建筑区的居民, 中老年人有与邻居交往的愿望, 而50%以上的年轻人认为不需要, 关心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 ⑳ 现代媒体抖音上传很方便, 拿个身份证就可以“说话”

- 造势，传播速度极快。
- ②① 经济不景气政府很无奈，各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建成楼房
闲置、大片土地被占用闲置，民众期盼政府合理解决。
- ②② 发展与治理是紧密相连的问题，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
不能兑现企业的优惠政策，企业主体不满意认为营商环
- 境不佳；政府不能给社会组织及其居民提供购买服务，
民众有怨言。

【责任编辑：余伟】

社会主义学院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研究

李际卫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摘要: 社会主义学院的功能重构应超越传统培训机构的局限, 通过构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价值转换器”、制度优势传播的“文化解码器”、治理人才储备的“能力孵化器”, 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释放的重要枢纽, 这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更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支撑。通过“价值赋能——机制创新——技术驱动”三位一体的改革路径, 健全新型政治共识教育培训体系, 打造开放型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教育生态, 构建智慧社会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新范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与党外人才支撑。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社会主义学院; 政治共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73-06

2023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意见强调要贯彻落实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切实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培养主阵地的职能作用。如何更高质量地发挥社会主义学院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作用, 不仅是社会主义学院实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也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课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社会主义学院定位演变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 社会主义学院的定位演变与发展形势始终与国家政治格局、统战工

作需求及社会治理目标紧密关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发展烙印。

(一) 制度基因: 从“联合党校”到国家治理体系战略支点

1. 历史维度: 1956 年创立初期“三自”“三不”方针的政治智慧

社会主义学院缘何而起, 邵力子、陈叔通和章伯钧等民主党派人士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和党外人士的要求, 意识到“党有党校, 团有团校, 各界民主人士也应有一所学习政治理论的学校。”为回应各界民主人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迫切要求,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议希望建立一所“毛泽东思想学院”以加强自我教育和提升社会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同志当即赞许和肯定了这一建议, 并亲自命名为“社会主义学院”。在周恩来同志亲切关怀下, 社会主义学院建校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1956 年 3 月 31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草案)》上报周恩来

收稿日期: 2025-05-30

作者简介: 李际卫 (1985-), 男, 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

同志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经研究批准决定在北京紫竹院北侧建设社会主义学院。1956年10月15日，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同志担任首任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宣布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1960年改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初期，社会主义学院坚持自由、自愿、自觉的“三自”原则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正确对待党外不同意见的政治智慧，也是统一战线在充分发扬民主实践中形成的自我教育重要方式。

2. 制度逻辑：政治培训功能与多党合作制度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发展

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其根本属性是政治性，围绕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属性功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根本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和中心工作所决定的。因此，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培训功能是伴随着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其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中共八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基本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长期合作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学院创办之初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帮助其提高社会主义理论水平，贯彻“三自”原则、“三不”方针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思想和行动切实转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改造完成，人的层面即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工作也历史性地落在社会主义学院身上，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相继成立，地方工商业者讲习班也转变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的主要班次。这一时期教育培训主要对象是各民主党派中高级知识分子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格局。统一战线的深度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统一战线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加强团结实现振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具有广泛凝聚力、巨大感召力的伟大旗帜。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学院在办学层次、学员招收范围方面有了更多更广更深的高层次、正规化发展，承担着统战对象和统战干部两支队伍的教育培训任务。社会主义学院成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大力推进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加强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全面领导。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教育主阵地，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适应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时代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的统一战线教育培训体系，实现统一战线重点领域、工作范围的全覆盖。

3. 新时代转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对性质定位的法治化建构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作为第一部由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党内法规，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

《条例》中“五个是”的性质定位是200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制订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暂行条例》中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三个是”的基础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4日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贺信中关于“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新增职能作用重要指示精神的创新发展。“五个是”的性质定位高度凝练了社会主义学院的政治属性：即政治性质、政治地位、政治功能、政治原则和政治责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

二、社会主义学院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

社会主义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培训规模、培训质量等方面都呈现了全面发展的显著特征。但是，与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院校的横向比较来看，受限于办学场地、师资队伍、学员规模等主客观因素，社会主义学院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用发挥方面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发展困境。

（一）学用分离：新时代统战要求下闭环管理缺失

一是政治性与专业性的失衡。《条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学院基本任务是“组织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宣传，推进理论创新。”^[2]因此，在社会主义学院课程体系中政治理论课占比比例是较高的。但存在专业实践性课程特别是参政议政、提案撰写、基层治理实务等开设率偏低或者是占比偏少的问题。二是课程层级与学员需求的错位。未强化区分学员职级、党派属性设计差异化课程，导致一定比例学员认为“课程内容与自身岗位关联度低”。例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培训班对“参政议政能力提升”课程需求高，而实际供给占课程总量比例是偏低的。实践实训实操课程占比不足，缺乏“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实践应用”的阶梯式课程体系，导致学员反映“学完全部课程仍不知如何撰写高质量提案。”

三是教学质量和评估体系的局限。学员教学成绩考核和评价指标单一化，课程考核重理论轻实践，以课程结业论文、小组调研报告理论考核为主，而提案撰写、模拟协商等实践考核占比不足。未将学员结业后的政策建议采纳情况、职务晋升等纳入评估体系，导致“学用分离”。

（二）协同不足：“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系统集成短板

一是社会资源协同生态薄弱。社会资源参与社会主义学院课程深度开发设计协同不足。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仅停留在师资聘请层面，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常态化交流机制尚未真正落实落细，院务咨询委员会真正主体作用未能得到最大效用发挥，民营企业等参与社会主义学院课程体系渠道有限。二是统战系统数据共享孤岛壁垒。统战系统跨部门数据不通。党委统战部、社会工作部，社会主义学院、民主党派、工商联等部门数据系统独立运行，无法实现“统战对象画像”“参政议政热点监测”等关键数据的实时共享。基层统战干部重复填报同一份《党外人士登记表》，且信息更新滞后于实际履职变动。三是AI赋能应用场景简易单一。教学学习教育管理系统目前仅仅应用于自动化批改选择题居多，未能构建“政策文本智能分析+参政建议生成”的闭环系统。

（三）赋能不够：数字经济发展形势下智能教学缺位

一是“互联网+”模式简单化。社会主义学院“网上社院”、“智慧社院”等仅将传统课程录像转为线上播放，未实现“智能推荐+学习路径规划”等深度应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缺位。未根据学员画像（如“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送个性化课程，导致学员认为学习内容重复率高。二是区块链存证应用不足及应用浅层化。未建立统一的数据存证平台，导致政协委员提案、调研报告等成果缺乏可溯源的“数字指纹”，无法实现跨区域、跨党派的成果共享。区块链技术存证场景局限于证书存证（如结业证书），未延伸至“课堂发言记录”“调研数据采集”等教学全过程，导致某学员质疑区块链存证的只是结果，而非过程可信度。三是跨链互操作性缺失，无法与“学习强国”“智慧政务”等

政务平台对接，导致学员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统战知识图谱”无法同步至其他政务平台系统。

三、实现社会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助推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土壤、经过实践验证的‘原创’，具有历史必然性、巨大优越性和伟大独创性，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旺盛生命力。”^[3]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学院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方面通过“价值赋能——机制创新——技术驱动”三位一体的改革路径，健全新型政治共识教育培训体系，打造开放型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教育生态，构建智慧社会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一）价值赋能：健全新型政治共识教育培训体系

1. 开发“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三维课程模块

社会主义学院主责主业始终是围绕着《条例》中规定的基本任务而展开的，其中最首要的还是教育培训功能。坚持以问题导向原则，着力解决以往课程体系中重理论轻实践、单维灌输缺乏主体性等问题，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政治共识教育培训体系。社会主义学院要开发“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三维课程模块，这也是新时代加强政治共识教育、凝聚广泛共识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这个三维课程模块是一种螺旋式向上递进的“认知层”“价值层”“实践层”的认同阶梯。一是制度认同（认知层）。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与运行机制，特别是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结构功能及效能发挥等方面的知识要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与发展逻辑，厘清其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等。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科学分析制度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并能够根据统一战线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科学合理的改进方向。二是文化认同（价值层）。深化对中华文明五千年基因图谱的理解，以“两个结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坐标体系，提升文化鉴别力，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三是情感认同（实践层）。培育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情怀，强化红色基地联盟整体协同，实施国情调研专项行动，组织乡村振兴观察团、大国重器企业团。开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路线移动学习平台，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全球责任感，开发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举办“中国制度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等。

2. 创设“政党协商模拟”“基层治理沙盘”等沉浸式教学场景

《意见》明确提出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因此社会主义学院实践教学体系中应着力在政党协商课程上下功夫。课程设计可通过虚实融合的场景架构，将抽象的制度概念转化为可体验、可操作、可验证的实践载体，强化政治共识教育的仪式感，提升统战工作的实效性，为社会主义学院创新教学模式提供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具体为开发政党协商、基层治理等统战特色鲜明的沉浸式教学场景，“政党协商模拟”旨在加深学员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掌握政协提案撰写、协商议事规则与民主监督程序，从而培养学员统战思维和提升民主党派自身能力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虚拟政党协商场景设计，设置主持台或主席台、代表或委员席位、媒体区域等，遴选中共党员代表（政策制定者）、民主党派代表（民主监督角色）、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舆论监督角色）等，全流程模拟政党协商全过程，设置协商议题、协商议事过程、协商成果转化与反馈等环节。“基层治理沙盘”旨在学员切实掌握“党建+网格化+数字化”基层治理模式，强化群众工作方法与矛盾纠纷调解能力，培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设计三维数字孪生社区场景，含基础信息集成（如社区人口结构、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或换装改造进度等数据）、预设典型治理场景（如疫情防控应急响应、停车位权属纠纷等）、实地居民走访（获取居民诉求等）。设置基层治理角色分工，分配社区党委书记（统筹协调角色）、居委会主任（执行落地角色）、物业公司代表（利益相关方角色）、居民代表（直接利益者

角色）、政协委员（民主监督角色），引入实时数字治理平台、舆情监测系统、应急指挥中心，演练政务系统即时处理、仿真网络舆情引导、应急预案有效测试。

（二）机制创新：打造开放型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教育生态

1. 建立民主党派智库与社会主义学院教研融合协同创新平台

《意见》指出：“支持民主党派建立健全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的集智聚力机制，探索建立适应履职需要、符合自身特色的智库。民主党派智库可与社会主义学院共建“教研融合创新平台”，突出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与协同育人特色。协同创新平台定位是打造“统战智库+政治学院”双向赋能的创新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教学示范基地，构建多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培养的数字化生态圈。其核心功能一是统一理论和政策研究双向转化，将智库成果转化教学案例，将教学需求反馈至政策研究。二是人才联合培养，建立民主党派骨干学者与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双导师制”。三是实践教学迭代，通过真实政策应用场景培养和提升学员参政议政能力。创新运行机制，以双聘制形式解决双方师资队伍和研究人员构成，选聘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或者学术型领导担任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社会主义学院骨干教师兼任民主党派智库研究员；以项目制的运作方式，设立“年度重点攻关课题”，采取“揭榜挂帅”方式组建跨党派研究团队；以成果共享形式为工作载体，联合发布统一战线重点领域蓝皮书、白皮书研究成果。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机制创新、技术赋能与场景重构，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新型双向育人平台，提升民主党派智库的实践价值，强化社会主义学院的政治属性，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2. 实施“数字统战伙伴计划”激活社会资源

数字经济、AI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的快速高速发展，深刻影响改变各个行业发展趋势和范式生态。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大统战格局发展要求，充分利用统战工作范围内的社会资源，大力实施“数字

统战伙伴计划”。一是做好基础数据资源开发工作。核心定位是打造“统战资源数字化枢纽”，整合统战部、社会工作部、侨联、工商联等与统战工作密切联系部门的数据资源，构建“统战大数据仓库”，具象化统战工作对象画像标签，实现社会力量“一键接入、精准匹配、价值共创”的统战工作新范式。二是构建价值共创机制。发布年度统战创新课题榜单，采取“揭榜挂帅”项目制形式，多方力量共同完成统战新形态前沿研究。创新资源置换模式，允许社会资源以数据、技术、渠道等资源参与培训项目或课程体系。实施积分激励体系，设计“统战贡献值”算法，可兑换决策咨询、培训名额等置换权益。三是开发统战工作典型应用场景。利用“数字统战伙伴计划”统战数据大仓库基础作用，开发例如“云上党派”、“数字工商联”、“新阶层成长计划”等应用场景，为民主党派建设数字化组织平台，民营企业参政议政数字化通道，新的社会阶层开发数字化课程提质增效，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匹配——价值共创”的数字统战生态系统，解决传统统战工作中资源分散、效率低下等问题，将数字经济要素融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工作全过程，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创新方案。

（三）技术驱动：构建智慧社会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1. 开发“共识云”教育平台实现精准画像与课程推送

《意见》强调指出，建设高素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必须要强化支持保障，有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有其自身特征及培养规律，因其包含十二个工作范围，其学员群体培训需求各有侧重，因此社会主义学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教学培训工作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线上线下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4]线上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载体重点是开发“共识云”教育平台，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从“标准化教育”到“个性化成长”的范式转变，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统战工作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使统一战线人才培养更加精准。“共识云”教育平台开发和利用必须实现培训学员群体精准画像，才能实现有的放矢的课程推送。一是构建多维

动态培训学员模型。采集和处理培训学员结构化数据和行为数据。具体而言结构化数据包含学员政治面貌、党派职务、参政经历等基础信息，培训班次、考核成绩等学习档案，调研报告、提案提交等参政议政成果等实践记录。行为数据主要是追踪培训学员在“共识云”教育平台上的交互行为，如视频观看时长、课件下载频次、模拟政协提案提交次数等。二是打造个性化学习路径，推送智能课程。根据“共识云”教育平台精准画像结果生成“基础必修+专项提升+前沿拓展”三级课程体系。例如针对民革党员律师群体，推送《民法典》修订解读、“法治化营商环境”模拟谈判等课程。三是实现跨平台联动。对接“学习强国”等现有平台，实现成绩学分互通、精准推送统战要闻等精准画像数字资源。

2. 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党外人才成长可信化数字档案

统一战线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发挥关键还是在于社会主义学院为统一战线特别是党外代表人士成长成才服务，因此，社会主义学院应积极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党外代表人士成长成才可信化数字档案，以实现党外代表人士人才信息的不可篡改、全程留痕、智能合约驱动，创造性地解决传统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养工作中“重口头表态、轻实际成效”的痛点。一是架构区块链基础联盟。构建由党

委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党外代表人士三方共同参与的联盟链网络。二是联盟网络数据保护。模块化可信执行环境中确保学员敏感信息加密处理，实现公用数据、私有信息、加密核心等分层分级处理。三是优化应用流程管理。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经历为在党外代表人士干部选拔、跨区域跨部门人才流动等领域提供可视化成长轨迹分析图表。该技术体系优先考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进行试点试验，未来可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构建“数字画像——智能匹配——精准培育”的统战人才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学习读本 [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9，10.
- [3]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20.
- [4] 吴显标.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为根本遵循书写社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S1)：37.

【责任编辑：张山】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秀波

(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 本论文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大团结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剖析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成理论依据、历史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定内涵, 阐述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经济、文明、生态和国际交往等方面提供的强大支撑。并基于此, 提出以“当家主体”“经济整体”“文化本体”“国家总体”建设为路径, 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策略, 旨在揭示二者协同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华民族大团结; 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79-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一个民族都没有落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共同富裕, 这个共同富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2023 年 10 月 2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 提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 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表明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成逻辑与时代意蕴

中华民族大团结是民族复兴的目的性与民族建设的规律的有机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科学指导下, 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 发展于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历史进程中, 在新的历史方位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一) 理论逻辑: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 为正确认识、实现并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提供了科学指导

马克思认为: “只有在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马克思主义重视以民族团结推动无产阶级领导不同民族共同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从而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提出的“四要素民族定义”, 强调民族间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素质, 有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 这些理论观点对中国民族团结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 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教条主义地复制斯大林的民族团结理论,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理论, 比如毛泽东认为民族团结应包括三个层次: 首先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全民族团结”,

收稿日期: 2025-05-2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2 年度粤东西北专项项目 (编号 GD22YDXZSH01); 2024-2025 年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 (编号 2024-GDSYK-01)

作者简介: 宋秀波, 女, 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决策咨询中心主任、副教授。

其次是“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最后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理论的创新发展，不断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就工作的深入开展指出“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强调要“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并创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将中华民族大团结视作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基石和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等，提出了“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等“十二个必须”的重要论断^[4]，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实现并巩固中华民族最大范围的大团结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二）历史逻辑：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成，离不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渗透在文化认同与民族心理之中。从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都在不断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融合，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文化传统。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不断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但是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以实现民族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使命，此后，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历经 28 年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才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平等，才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民族四分五裂的局面，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各民族始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比如，1935 年 5 月的彝海结盟就是民族团结的典范。又如，1936 年初，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先后公布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纲领》和《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这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交融的生动故事数不胜数。例如“十万大军拓新疆”“八千湘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等事迹感人至深。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氛围也愈发浓厚，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意义。为了保障最大范围的民族大团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4]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政策的突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表现，能为全国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三）时代意蕴：统筹“两个大局”的基础事业

从概念构成看，中华民族大团结包含了“中华民族”和“大团结”两个关键要素。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在 1902 年的《新民丛报》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是当前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实现民族大团结有助于以共同体理念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加强团结意识和凝聚奋斗力量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为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所以在 2024 年出版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界定，即“中华大地各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指具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侨。”^[5]从中华民族的内涵来看，中华民族最大范围的大团结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广度上，其对象包含了全体中华儿女；在深度上，其内容体现在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方面面。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大团结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密不可分，二者互相作用，中华民族大团结是统筹“两个大局”的基础事业，统筹“两个大局”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有力保障。

二、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民族大团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凝聚力，正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磅礴力量，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和平发展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力量支撑

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人口规模不仅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构成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一方面，不断巩固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有助于凝聚十多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去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城乡区域不协调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等问题。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不仅能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智力支撑，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创造活力，还能为实现生产资料

的合理配置、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条件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56个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同富裕，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代化图景。能否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党的执政基础是否坚固。“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2]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机制的完善、“富民兴藏”“富民兴疆”等政策的实施，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互助互利，形成良好的经济循环与合作机制。这种合作不仅可以通过资源互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有效缩小民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实现财富共享，有助于破解民族二元结构难题，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地区加快融入现代化大棋局，为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条件，进而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物质条件。

（三）中华民族大团结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涵养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有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着起源于殖民时代的“优等民族”幻觉，对其他民族和地区进行残酷的人的压迫和文化的破坏，以文化霸权的多种形式呈现出对他者的轻视与践踏。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之所以引发社会撕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源于文化自觉的整合性共识。但在中国，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了各民族精神世界的共通，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价值谱系，“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赋予所有改革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3]，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例如蒙古族的“草原精神”、壮族的“歌圩文化”、回族的“商道智慧”，这些精神财富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道德指引、精神寄托和文化支撑。再如，多民族共庆中秋、春节，也证明着民族团结是精神文明繁荣的根系，为现代化注入持久生命力。

（四）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永久面相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的西方国家对民族地区造成了极恶劣的环境诅咒。例如，法国在位于南太平洋的海外属地波利尼西亚进行了长达 30 年的核试验，核爆试验次数高达近 200 次。20 世纪 90 年代核试验结束至今，有将近 1 万人罹患癌症。再如，美国政府通过欺骗、强迫等方式，将印第安人保留地系统性用作有毒或核废料倾倒场，致使相关社区癌症病发率和病死率明显高于全美其他地区。以全美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纳瓦霍族保留地为例，该部落约 1/4 妇女和一些婴儿的体内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而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可能引发的民族间的资源争夺和关系紧张，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构筑起了绿色屏障。例如，从傣族的“林田共生”智慧，到藏族的神山圣湖信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观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贵州侗族梯田保护等案例表明，团结协作才能跨越地域界限，守护绿水青山。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成为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永久的面相。

（五）中华民族大团结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共同体团结悖论”的破解。“共同体团结悖论”尤为强调共同体因边界性而造成的强制性和排他性。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共同体内部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和维系纽带具有局限性，是无法推广到共同体之外的群众的，所以在为共同体内部群体带来团结的同时，会给共同体之外的群体带来不团结甚至是安全隐患。中华民族在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以“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核心的理念，是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崇尚和合的价值体现。无论是国内各民族，还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交往，我们都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中华民族大团结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世界意义，有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不仅为国内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国

际社会的和谐共存奠定了基础。

三、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体作为载体，这个实体就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也需要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应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目标任务，探索以“当家主体”“经济整体”“文化本体”“国家总体”的建设路径来实现。

（一）以“当家主体”建设把人的力量凝聚起来

“我们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④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是我国共同的当家主体，要充分把主体中每个人的力量调动起来，凝聚成强大合力，共同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强化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⑤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域。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组织保障，推动各级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目标坚持好完善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必然选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以制度为载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族事务上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要通过坚持和完善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平等团

结和交流协作，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以画好民族“同心圆”为导向强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应通过广泛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形成最大公约数，集中人民的智慧，要凝聚人民的力量。例如，广州建成93个“羊城石榴籽工作室”，成为了党的民族政策“宣讲站”，为民办事的“服务站”，知识技能培训的“充电站”，矛盾纠纷调和的“调解站”，民族融合的“交流站”，是充分凝聚民力的代表。因此，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通过提供各类平台增强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和力量，集中各族人民的力量办大事。

（二）以“经济整体”建设激发物质的活力

强化中华民族大团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要聚焦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整体”建设。^[7] 我国有1.9万公里陆地边界线在民族地区，有超过一半的边境地区人口是少数民族，75%的草原面积、66%的水资源在民族地区。但目前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相对突出，因此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来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以战略对接建设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首要前提是深刻理解政策方向，尤其是国家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战略。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找准定位，主动对接国家规划。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可充分利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契机，大力发展跨境贸易和物流产业，既实现口岸过货量增长，又大量带动就业。当然，发达地区也应持续增强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与帮助，建立区域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经济联系，形成坚实的经济发展共同体。

以基础建设破除发展瓶颈。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民族地区融入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国家已在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但仍需提高项目落地效率。在交通网络建设方面，加快高铁、高速公路建设，缩短与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在能源升级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摆脱传统能源依赖；在数字基建方面，推动5G覆盖和智慧城市建設，降低信息壁垒。

以资源禀赋优势激发内生动力。“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8] 民族地区应立足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充分利用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融合，打造民族文化IP（如非遗、节庆），吸引游客并带动消费；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发展发展有机农业、林下经济，推动“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结合大数据时代特征实现数字经济赋能，通过电商直播、跨境贸易，让民族特色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球。

（三）以“文化本体”建设激发精神的动力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是各民族发展形成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文明积淀。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价值观念与智慧结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支撑。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9] 建设中华民族“文化本体”，把各民族的精神力量激发出来，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五十六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和发展上的紧密联系，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是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一方面，要深化“五史”教育，通过探源工程、集体叙事等增强历史认同、筑牢共同记忆，让全国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思想保障。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交流、旅游推广、非遗保护等多种方式，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把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激发出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文明”上实现协调。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根基。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方式、强化价值认同，让各族群众都能在精神家园中找到归属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态，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文化体系建设，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使中华民族文化不仅自己看得懂看得明，更要让世界看得懂看得明。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矩阵，加强对“民族团结模范”、多民族协作典型事例等正能量故事的宣传传播，展现各民族交融的生动故事，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传播好中华民族声音，让全世界看到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华民族。

（四）以“国家总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协和万邦”，而国内民族团结是对外和平发展的根基。当前，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更显得至关重要。俄乌冲突背后就有着深刻的民族问题根源，有的民族冲突甚至成为了大国间博弈的抓手。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国家总体”。为了保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道路上的深化与拓展。因此，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即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此让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引导全球形成持久和平、团结平等全人类共识，以和平、公正的态度推动全球的发展。

注释：

- ① 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② 2023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
- ③ 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④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 ⑤ 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39.
- [3][7] 丁勇强,柳鸿志.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04).
- [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4:34.
- [5] 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04.
-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59.
- [8][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2024:26、48.

【责任编辑：陈童敏】

人民政协的历史溯源与新时代启示

常庆林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人民政协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爱国力量团结合作、协商共事的奋斗史。深入探讨人民政协的历史溯源, 从理论渊源与实践探索剖析其诞生背景, 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时代的发展历程, 阐述其在不同时期的关键作用, 进而总结出对新时代在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发展、发展协商民主和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启示, 旨在为理解人民政协、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人民政协; 历史溯源; 新时代启示;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85-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指出: “75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独特且关键的地位。其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重要阶段,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爱国力量团结合作、协商共事的历史记忆, 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发展走向。深入探究人民政协的历史溯源, 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 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一、人民政协的理论渊源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

上进行的伟大创造。^[2]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极具特色与重要的政治组织, 其产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深深扎根于多元且深厚的理论土壤之中。这一理论渊源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引, 又包含了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家理念的启发, 二者相互交融, 共同为人民政协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犹如一座灯塔, 为人民政协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 其中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对人民政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人民政协理论渊源的核心组成部分。该理论深刻洞察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与建设的征程中, 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最终的历史使命。因此, 强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构建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回顾 19 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波澜壮阔历程, 马克思积极奔走, 倡导各国工人阶级打破地域与行业的界限, 联合起来组建国际工人组织。例如, 第一国际的成立, 便是这

收稿日期: 2025-03-05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人民政协在哈尔滨启航的历史考察与新时代价值研究”(ZK01202401029)

作者简介: 常庆林 (1981-), 男,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黑龙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秘书长, 研究方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理论。

一理念的生动实践。各国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的旗帜下，相互交流斗争经验，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极大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整体力量，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策略。这种通过团结各方力量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着重强调了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未独自垄断国家政权，而是积极与其他进步党派合作，共同参与国家的建设与管理。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与挑战，但这种多党合作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关系和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它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不同政党可以在共同的理想与目标下，携手共进，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这一理念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促使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二）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家理念的启发

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家的理念，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思想，虽然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且在实践中受到诸多限制，但其中蕴含的民权、民主理念，与人民政协倡导的民主协商精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对人民政协的理论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占据着重要地位。民权主义主张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政治权力应当由人民来掌控。这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与人民政协所追求的广泛代表性和民主协商精神相契合。人民政协作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的政治平台，其目的就是要充分汇聚各方智慧，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声音都能够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表达，从而实现真正的人

民民主。

“五权宪法”思想则试图通过独特的权力架构，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来保障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尽管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完全实现其理想的政治蓝图，但它所体现的对权力制衡和民主政治的追求，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政治制度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人民政协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方式，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确保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与“五权宪法”思想中对权力制衡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人民政协的理论渊源是多元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的指导思想，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家的理念则从本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为其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人民政协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实践，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民政协的实践探索

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进行实践探索、逐步走向成熟完善的奋斗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起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持续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创新突破，人民政协在不同历史阶段紧密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为国家的稳定、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萌芽与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理念的萌芽与初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实践为人民政协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协商共事理念的孕育。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双方通过联席会议、政治协商等形式，商讨革命战略、军事行动以及组

织建设等重要事务。例如，在北伐战争的筹备与推进过程中，国共两党就军队的调配、作战计划的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尽管此次合作最终因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破裂，但却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的宝贵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协商共事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孕育了协商共事的理念。

基层民主协商的尝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民主选举，从工人、农民、士兵等不同群体中产生代表，这些代表齐聚一堂，就根据地的土地分配、经济建设、军事防御等事务展开讨论并作出决策。比如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代表们充分考虑各阶层农民的利益，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这种民主选举和决策的形式，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协商精神，为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后续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

协商民主的重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政治层面，国民参政会成为各党派团体商讨抗日方针政策的重要平台。各党派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围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三三制”原则的实施成为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成果。

“三三制”规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使得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的代表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权管理和决策过程。在财政预算的制定上，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综合考虑抗战需求和民众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财政计划，既保障了抗战物资的供应，又减轻了民众负担。这种协商民主的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政权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例。

协商民主逐渐成熟。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协商民主逐渐走向成熟。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新政协的组织形式、代表名额、议事规则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在讨论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等重大问题时，各方代表各抒己见，经过反复商讨、权衡利弊，最终达成一致。这些协商实践，标志着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为1949年人民政协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为革命胜利汇聚了强大力量。从早期统一战线的合作尝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通过协商合作，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共同对抗国内外敌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巩固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协商凝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人民政协组织各界人士深入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使土地改革政策能够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实际情况，顺利推进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在抗美援朝期间，政协积极动员各界力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政协组织工商界人士等进行协商，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化解他们的疑虑，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政治生活中的职能履行。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在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对决策草案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同时，政协通过民主监督，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政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重要

桥梁。通过协商民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政协组织工商界人士等进行协商，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新与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围绕经济建设建言献策。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政协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建言献策。政协委员们深入调研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等，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在对外开放方面，政协就吸引外资、对外贸易、经济特区建设等问题进行协商议政，为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协商领域与形式的拓展完善。政协不断拓展协商领域，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各个领域。在科技领域，协商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在教育领域，探讨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同时，政协丰富协商形式，除了传统的会议协商外，还开展专题调研、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等多种形式的协商活动。通过完善协商制度，明确协商程序、规范协商行为，提高协商的质量和效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政协委员通过提案、调研、协商议政等方式，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政协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政协委员们围绕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人民政协的新时代启示

人民政协自诞生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独特且关键的作用。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厚的实践积淀，为新时代人民政协更好地履行职能、服务国家发展提供了诸多宝贵启示，这些启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回顾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从筹备创立到在各个历史阶段持续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脉络，是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推动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爱国力量才得以汇聚在一起，共同筹备并成立了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人民政协围绕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新时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人民政协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确保人民政协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关键。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目标，人民政协只有紧密围绕党的领导，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党通过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群众团结在人民政协的旗帜下，充分发挥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例如，在脱贫攻坚这一伟大战役中，党制定了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人民政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围绕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方面协商议政，为脱贫攻坚贡献智慧和力量，生动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重要使命

人民政协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开展工作，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协前身及相关组织通

过协商合作，团结各方力量，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助力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进入新时代，国家正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迈进，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和发展课题。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民政协要继续聚焦这些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调研。通过召开专题协商会、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等形式，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针对发展中的难点、痛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案，为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提供智力支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比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协委员通过调研发现农村人才短缺问题突出，于是提出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提案，并通过协商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动力。

（三）发展协商民主是核心价值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3]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派团体的协商合作，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协商民主在制度建设、实践探索等方面不断发展，协商民主始终是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新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发展协商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协商议题的提出、协商活动的组织、协商成果的转化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和流程，确保协商民主有章可循、有序开展。另一方面，要丰富协商形式，拓宽协商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网

络协商、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协商效率和覆盖面。同时，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建立更多基层协商平台，如社区协商议事会、乡镇协商民主论坛等，让普通群众能够更便捷地参与到协商民主中来，使协商民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使国家的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例如，一些地方政协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协商议政活动，针对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广泛征求市民意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治理方案提供了依据。

（四）加强自身建设是内在要求

新时代对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协界别设置。适时调整和增设界别，使政协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例如，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考虑增设相关界别，吸纳互联网领域的代表人士，为政协在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协商议政提供专业视角。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开展系统的培训，包括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履职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委员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同时，组织委员之间的学习交流活动，分享履职经验和心得体会，增强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委员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政协机关是服务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保障，要完善政协机关建设。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优化机关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健全机关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机关运行，为政协履行职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政协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人民政协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探索，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巩固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创新提升，人民政协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历史溯源为新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在新时代，人民政协应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协商

民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更加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不断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N]. 人民日报，2024-09-21 (01) .
- [2]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9-09-21 (01) .
- [3]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 人民出版社 , 2022:54.

【责任编辑：余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文化认同研究

常 静

(肇庆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70)

摘要: 增进文化认同,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 探讨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 面临的挑战, 探索构建文化认同的路径, 旨在凝聚全国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文化认同; 共同体意识; 生成逻辑; 面临挑战; 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91-0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强调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时也强调,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揭示了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

文化认同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文化理性上的肯定, 情感上的趋同和实践上的行动, 具有超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 才能在情感和行动上产生趋同和一致, 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尤其需要从文化认同发力。因此, 探讨文化认同的问题, 不仅是个文化领域问题, 更是一个关于国家、民族、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以此为出发点, 多维度探讨中华文化认同问题, 对充分发挥其独特功能, 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也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

文化认同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辩证性的历史过程, 遵循一定的发展逻辑, 是主客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文化认同产生的根本前提

上世纪八十年代, 费孝通先生立足中华民族视角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 必然也呈现“多元一体”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 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 化解冲突, 凝聚共识。”^[3]这一判断精准地揭示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所蕴含的“多元一体”格局, 体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 该判断还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文化根源性、平等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 彰显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尽管各民族文化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但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思想观念, 拥有共同的身份、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国家认同。这些“共同”的形成, 并非简单地基于血缘或地域关系, 而是通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思想相融合的共同思想观念体系。这一思想

体系为各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促进了国家认同的形成。中华文化并非单一民族文化的产品，而是由 56 个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集合体。各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强弱、高低、优劣之分，彼此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性是中华文化得以形成共同基因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各民族人民文化归属感的关键所在。

因此，“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生成的根本前提。它为各民族提供了一个既包容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的文化框架，使得各民族能够在认同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形成对中华文化整体的深度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主体利益诉求是文化认同生成的根本动力

文化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有目的的自主的选择过程。从文化认同的主客体关系来看，人作为文化认同的主体，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某种动机和利益驱动下进行，目的是要满足某种需要，共同的利益需求、统一的利益立场等是文化认同生成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最终由生产方式决定。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一方面，文化认同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只有个体利益在某一群体中不断得到满足，才能形成思想情感上的归属，进而产生文化认同。反之，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秩序混乱必然会降低人们对相应文化的认同，甚至带来文化认同危机。历史上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与当时中央王朝的综合国力高度耦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呈现渐进强化态势，这一文化自觉的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现实映射，生产力的持续解放夯实了各民族文化认同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文化认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宏观层面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孤立发生，其背后必然受到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强大的文化认同，能够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巨大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持久动力。

（三）文化的交流交融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关键条件

文化认同是在自我与他者不断交往过程中进行的一种主体性认识，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逐渐形成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主要是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小范围群居生活，对事物的认识来源主要依附自然，形成的共识多是人类在求生存过程中积累的对自然的认识及经验，并不能对文化现象形成体系上的共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体系，有共同的祖先崇拜、图腾、信仰、习惯等，这种文化体系往往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具有原生性、民族性特征。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与外界接触，交往日益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固有的文化模式必然受到冲击，开始相互影响。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对异质文化的认同，这是整个文化认同中最具有意义的时期。当然，这需要异质文化有相对的优势，只有具有一定进步性的文化才能对主体产生吸引。

（四）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文化认同的生成场域

文化认同是文化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与体验社会生活逐步建构而成的。社会实践不仅是文化产生的基础，更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必要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等文化心理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社会实践不仅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动力源泉，也是检验文化认同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种文化认同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凝聚力，正确指导社会实践，那么这种文化认同便是合理且有效的。相反，如果一种文化认同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甚至阻碍社会实践的开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文化认同便是不合理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原有的认同框架，重构新的文化认同，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文化认同面临的挑战

中华文化认同遵循一定的发展逻辑，受多种主观客观因素影响。共同的文化基因，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民族政策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然而，当今世界全球化日益深入，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价值观念多元并存，中华文化认同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潜在阻碍

较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是文化认同建立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富裕程度显著提高，这为文化认同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物质基础。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社会的“需要”和“供给”层面讲清了当前中国发展存在的客观实际。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更高追求与社会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社会需求，它超越了单纯的物质需求，涵盖了物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这种需求的多元化与层次性，反映了人民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更高期望，也对社会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社会供给的现实困境，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利益差距扩大，不仅影响社会的公平感，也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产生了冲击。“不充分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导致了有效供给的短缺和无效供给的过剩。这种发展质量与效益的不充分，使得社会供给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影响了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和对文化的认同感。

（二）西方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对中华文化认同

的冲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碰撞愈发显著。在此过程中，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这些思潮在本质上宣扬淡化理想、价值虚无、个人至上等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理念存在根本差异。在当前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部分中国民众，尤其是部分年轻群体，受到一些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错位价值观的误导，表现出对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盲目追捧，同时对中华文化持有偏激的轻视态度，这些都对我国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西方国家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视为对其自身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因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步伐不断加快。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积极抢占中国教育文化产业市场，通过电影、电视、网络、教育机构等载体传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争夺文化意识形态阵地。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体现在显性的文化传播上，还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例如，在中国培养利益代言人，在各种场合传播西方至上的理论，甚至以“宗教自由”为幌子，在宗教、人权、台湾、香港、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干涉。这些行为无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国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复杂的社会变化。在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利益追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以及分配方式等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由于利益得失、所处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虽然总体上是积极的，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上的自主性和多元性，但也导致了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荣辱不分等现象。因此，当前中国在思想层面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思潮和国内非主流文化观念的双重冲击。这些冲击不仅削弱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构成了严峻挑战。

（三）信息网络化带来的风险挑战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交流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文化交流的场域从传统的线下空间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迁移，这一变化在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华文化认同的难度。传统的文化交流方式具有权威性、单向性、正面性与导向性等特点，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播模式更容易在受众中取得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78.6%。^[4] 网络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利用互联网开放性、匿名性与虚拟性的传播特点，将西方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传播到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5]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国家安全的深远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西方文化渗透的成本降低，文化传播的控制难度增加，不仅削弱了中华文化的认同，还可能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文化认同的构建路径

（一）坚持守正创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诗经》《楚辞》是各民族民歌的汇总，元曲的繁荣有着少数民族多方面的贡献。

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首先要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根基在“守正”，动力在“创新”。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让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要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最新成果，既要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认同这一目标，又要兼顾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我国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既要认同中华文化，又要认同本民族文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二）推进共同富裕，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合理的利益诉求是认同的根本动力，利益保障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主导文化的接受度与价值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构建与稳固，始终与中华民族成员对物质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美好生活愿景的追求密切相关。增进民生福祉，合理分配利益是夯实中华文化认同的利益基础和前提。

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应致力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解决民生难题，推进民生领域的改革进程。通过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优化社会资源分配机制，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全体人民能够公平地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提升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

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因其特定的文化传承、思维习惯、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而彰显的特有的主体意识”^[7]。巩固文化主体性，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把思想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

机制，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在解决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时代课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辩证地看待中华文化，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通过“两个结合”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8]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价值观的认同。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文化认同的重要实践路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面向各族群众深入开展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工作。通过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铸魂育人，从而筑牢民族团结的思想根基。同时，应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扶持和引导，促进多元文化在中华文化认同框架内的和谐共存，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五）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多次作出重要论述，阐述当今世界文明交往的中国态度：“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9]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在现代文明交往交流方面的大国风范与开阔胸襟。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就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就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更加有效发出中国声音。有效发出中国声音，就要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故事应具备温度，以情感共鸣打动人心；其次，故事应具有深度，深入阐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理念；再次，故事应具备广度，注重传播的实际效果，关注国际受众是否能够听到、听懂、接受并理解，从而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支持，避免陷入自我中心的传播模式。为此，需要在话语表达上进行转化，采用贴近不同区域、国家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提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最后，故事应具备新度，利用短视频、虚拟现实（VR）、动漫、可视化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传播方式与方法，以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2]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人民日报,2024-02-01.
- [3] 习近平.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求是,2023(17).
-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cnnic.cn/n4/2025/0117/c208-11228.html>, 2025-01-17.
- [5]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 2013-08-21(01).
- [6]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N].人民日报, 2023-10-09 (01).
- [7] 曹一飞.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J].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04) : 101.
- [8]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 2014-05-04 (01).
- [9]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J].求是, 2019 (09).

文化自觉视域下统一战线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

杨 宁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天津 300000)

摘要: 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与理论品格, 彰显出对文化资源具有系统性认知与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始终将文化主体性建构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维度。统战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新时代对统战文化进行系统性挖掘、学理性阐释和创新性传承, 本质上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方法论的具体实践。这要求我们确立自觉的主体担当意识, 自觉在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挖掘、保护与传承统战文化, 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贡献力量。

关键词: 文化自觉; 统战文化; 文化挖掘与保护;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122;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096-05

1922 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 自此,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就将统一战线作为重大法宝长期坚持下来, 在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我们将其定义为统战文化。统战文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到壮大, 在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统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文化资源, 挖掘、保护和传承统战文化既有利于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也有助于发挥统一战线的文化力量, 更好地做好统战工作。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来分析问题, 通过文化自觉提供的角度范围提供“阈值”, 有助于理清统战文化具有的科学性、政治性、包容性等特征, 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等共存的独特之处。在了解统战文化独特魅力之后, 方能提高其辨识度, 从而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文化力量。

一、统一战线文化的重要性分析

统一战线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统战

内涵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挖掘、保护与传承统战文化不仅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 更是发挥统一战线文化力量的必然要求。

(一) 学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战篇”, 是坚持和实践“两个结合”的宝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推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两个结合”中开辟了新境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统一战线以文化引领来凝心聚力的时代任务, 推动统一战线全面嵌入文化强国的整体架构, 更加凸显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而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出发,

收稿日期: 2025-05-15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山西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杨宁 (1995-), 女,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

能够在文化认知上、文化行动上、文化方向上形成一定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只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才能够将思想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提到新高度，以意识推进行动，进而更好地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处。

（二）发挥统一战线文化力量的必然要求

统战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换言之，统战文化体现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统战文化本质上是团结文化。^[2]这种团结的力量有助于统一战线工作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理想目标。同时，统战文化中蕴含的团结文化更是一种批判性的团结文化，即“团结—批评—团结”。这种团结文化并不是毫无底线的团结，也不是一味的团结，而是具有“又团结又斗争”的内涵。“又团结又斗争”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出的“又联合又斗争”规律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它蕴含着极其宝贵的统战智慧与文化价值，不联合，我们的阵营范围无法扩大；不斗争，我们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其中体现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统战文化智慧，在新时代同样能够发挥强大的文化力量。

二、文化自觉视域下的统战文化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关系问题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3]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即“自知之明”。^[4]换言之，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够在具有多元性质的文化世界中找寻自己、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通过自主性适应，对文化进行选择、保护与创建。

（一）自我觉醒：统战文化需要被挖掘

文化自觉包含了文明反躬内省、自我认同的独特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5]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文化建设。同时，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统战文化，对于统战文化的内省与认同有助于达成文化层面的自我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能够认识到统战文化的可贵性并付诸于对统战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这种对待统战文化建立“自知之明”的过程对于统战文化来说至关重要。通过文化的觉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统战文化的渊源、形成过程和所具有的特色，从而理解统战文化为什么需要“被挖掘”这一重要课题。

（二）自我反省：统战文化需要被保护

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负，其结果都会导致不能客观地对待现存的文化资源。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色彩进行所谓的“复旧”，同时也不进行“全盘他化”才是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在文化自觉的视域下，对文化进行自我反省能够帮助我们理清在保护统战文化的过程中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什么是统战文化？如何保护统战文化？这些问题的提出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对待现存于统一战线领域中的文化符号，接下来才能够通过自我反省去探究正确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中华民族精神能够生生不息的“根脉”来强调文化保护的重要性。^[6]从文化的自我反省角度来看，统一战线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精神财富，因此，要保护统战文化就要对统战实践的宝贵经验进行总结和挖掘，从中梳理统战文化的脉络与内涵。

（三）自我创建：统战文化需要被传承

中华文化自形成以来历经几千年风霜与考验，从未间断。统战文化作为统一战线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文化自觉视角能够为文化主体进行文化的自我创建提供主动性。这种要重视并不断发展的前瞻眼光有助于推动统一战线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文化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当下，对于统战文化进行自我创建有助于培养统战文化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及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统战工作都是我们全党都要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的一项工作，只要统战工作不中断，蕴含于其中的统一战线文化的内涵就会越来越丰富，因此在文化自觉的视角下，对于统战文化进行自我创建

也是必然要求。

三、文化自觉视域下统一战线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一）发掘统战文化的人文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7]统战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我们要善于发掘蕴含于统战文化中的文化精神符号。一是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崇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统战文化培植了爱国的底色。在革命年代，广大统战成员在国家危难之际展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二是团结精神。团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统一战线继承了团结的优良传统，统战文化承担着凝心聚力的重要使命。同时，中华文化强调“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又为统战文化融入了“求同存异”的文化基因，成为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价值指引。三是开放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兼容并包”的开放传统，将和谐、包容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与修养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战文化为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提供文化力量的支撑，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大团结大联合”等具有统战风格与特色的表达方式，发挥浸润人心、凝聚人心、争取人心的价值。^[8]

（二）总结统一战线的光辉实践

统一战线是一种特殊的联盟，即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的联盟。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与奋斗目标铸就了统战文化的标识，并为其提供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统一战线文化遵循着文化的一般形态与科学理论中蕴含的价值规律。在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滋养下，在一百余年统战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统战文化。

在实践过程中，统战文化随着长期统战工作的

具体实践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统一战线文化不断积淀着爱国和团结的因素。其中国共双方合作的基础，即允许共产党员可以以其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就具有统战文化中团结合作的文化元素。当时的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在当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就体现了统一战线工作中通过合作求得团结，通过更大的团结取得斗争胜利的统战文化意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战文化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张闻天在陕甘宁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提出了“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思想上进行的统战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多党派之间、与多民族之间形成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统战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多地突显出包容、和谐、团结等文化内容。统战工作在这一时期也不断丰富和扩展，制度政策也在不断完善，统战文化呈现出与实践同进步，不断丰富和拓展的过程状态。在爱国统一战线中，统战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求是》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强调统战文化在发挥感召力、增强凝聚力、提升软实力等方面大有作为。^[9]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中，统战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文化的重要作用。全国各地积极主动承担保护与传承统战文化的责任，推动了统战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三）兼顾统战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统一战线文化不仅与我国具体的统战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同时也在不断借鉴和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民族角度来看，统战文化能够固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牢牢坚守住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对于文化发展而言，“守正”是不迷失方向与自我的关键。我国的统一战线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发展的自身特点，其中多党合作的文化、民族团结的文化、各阶层人士的报国文化、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同根同族文化等，都为统战文化注入了本民族成长发展的独特文化价值。这

种文化的民族特点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世界角度来看，统一战线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倡导与各个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文明互鉴。通过对外传递统战文化中的“团结”“包容”“和谐”等底蕴特质，充分展现可亲可敬的统战形象，让以美西方为主所谓的统一战线“阴谋论”不攻自破。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着力加强统战文化体系建设，在主动引领中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决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既要胸怀天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又要坚守文化主体性，在开放中实现文化创新性发展。

四、文化自觉视域下传承统一战线文化的路径分析

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存在形态，它的内部结构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四种形态。^[10]统一战线的文化形态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步积累的，包括着物质实体、制度建设、精神价值以及与这些相对应的具体行为的总称。

（一）传承物质文化：盘活统战遗址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当中，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和历史佳话，这些物质文化遗产都镌刻着浓厚的统战基因，沉淀着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因此，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统战文化遗址的文化传播功能，对于我们进一步传承发展统战文化具有巨大的意义。首先，进一步加强对于统战文化遗址的保护力度。对各类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精心修缮。进一步加强对于统战文化的保护力度，开展文物的普查并整理收录各类统战文化旧址。重庆市联合四川省开展统战文化的资源普查工作，并编撰了收录有近二百个统战历史旧址的集群名录，通过统战遗址的普查进一步盘活统战物质文化。其次，积极打造“统战地标”。天津市具有丰富的文化古迹资源，其中包括大量的名人故居。因此，天津市河北区就利用梁启超纪念馆，打造“统战地标”，发挥好统一战线教育实践基地的作用，利用地标为媒介传播内涵丰富的统战文化。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统战资源的整合与活化利用。此外，要成立统一战线文化传承的研究与交流中心，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物质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研究阐释。同时，加强对于文化保护人才的培养，致力于提升统战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撑。最后，还要加强文化的创新转化。通过互联网技术盘活统战物质文化，利用VR、AI等技术让更多统战旧址文化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发挥出更大的文化价值，带给人们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同时，可以通过开发文化产品，利用吸引年轻人的文创产品向外传播统战文化的内涵，让更多青年人自觉加入到统一战线文化的传承中来。

（二）传承制度文化：高质量推进统一战线的制度建设

制度的文化形态是统战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路线策略、制度规则等，对于统一战线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性保障。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传承统一战线的顶层设计，对于制度、政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继承。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统一战线的生命线。^[11]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其最后失败的原因除了有国民党右派的敌对、分裂和联合绞杀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和党的领导人的妥协退让，丧失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给了我们党深刻的经验教训，自此，无论在哪个时期，我们都牢牢的把握住了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在新时代，我们也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其次，必须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建立健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与创新其运行机制。最后，要对已有的制度文件进行宣传教育。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等，通过统战相关课程来进行教育宣传。

（三）传承思想文化：以“合”文化画出更大

同心圆

思想文化是统战文化的基本内核，体现为统一战线的精神、思想、观念、意识、智慧等，属于统战文化更深层次的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挖掘和发扬。首先，我们要挖掘好、讲述好统战故事。在中央及各省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课程安排中适当增设统战故事的传播工作。如“延安窑洞对”“彝海结盟”“三顾特园”等，向统战对象传递爱国、团结、和谐、包容的统战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品格，展现统战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品格。其次，我们要从百年统战工作中不断汲取智慧，通过其中的观念与意识的总结为今后做好统战工作、丰富统战文化提供强大的借鉴意义。要不断加强统战文化的精神建设，以“合”文化画出最大同心圆。各地应该加强统战理论研究会的创建，汇集更多的统战文化研究者，通过研讨交流不断增进大家对于统战文化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最后，应该不断加强统战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丰富传播统战文化的形式，比如举办统战音乐会、歌会、演讲活动等，增强统战文化的传播力度。

（四）传承行为文化：以统战之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统一战线行为文化是理论与实践、制度与价值、传统与创新的动态统一体，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和制度化的行动路径，将统战成员个体行为凝聚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集体合力。统战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战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中不断发展壮大，因此，蕴含于其中的统战文化也以实现民族梦想为精神指引。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统战行为文化的影响力，推动统战成员以更坚定的行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当下的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当中，蕴含在统战文化中的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创造精神能够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现注入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传承已有的统战行为文化，不断丰富统战文化的类型。进一步传承多党合作文化、民族团结的文化、宗教和顺文化、阶层信义文化等，以统战文化推动实践工作，使各项实践工作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以统战之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使统一战线的文化价值能够发挥最大效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J].求是, 2022-11-1.
- [2] 陈喜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推进文化统战和统战文化工作 [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01):1-12.
- [3] 费孝通.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58.
- [4]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6:195.
- [5][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求是, 2023(17):4—11.
- [6] 张晓松, 朱基钗.习近平: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象征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1/content_5422998.htm, [2019-8-21].
- [8] 孙德魁.统战文化的底蕴源流、发展脉络及未来展望 [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02):143—155.
- [9] 杜青林.大力加强统战文化建设, 求是, 2012(07): 7—9.
- [10] 俞佳奇, 秦宣.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J].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06):38—52.
- [11] 刘晓泉, 龙文祥.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百年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 [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03):18—21.

【责任编辑：陈童敏】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潮州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研究

肖 錄，陈驰欣，黃秀芝，林润锋，蔡润东，罗兰帆

(潮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潮州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迎来新的重大机遇。潮州文化能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成分，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实践印证，并拓展结合空间。从“第二个结合”蕴含的大历史观和文明观出发，系统推动潮州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使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潮州文化；文化传承；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5)03-0101-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在长期坚持的“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走过了两者“能否结合”到“如何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2020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视察时深情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州文化是源自粤东地区韩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一代代海内外潮州人共同创造、共同传承、共同

享有的区域文化，涵盖了当代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区域文化的独有名号，界定了其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定位标识。潮州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是中华文化自化更新的一个缩影，其与母文化一样，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成分。同样，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实践印证，能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向未来展现“第二个结合”真理力量作出更大贡献。

一、从“第二个结合”理论视野审视潮州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潮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支脉，其发展与演变同样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激活与改造。面向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从理

收稿日期：2025-05-15

基金项目：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重点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潮州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肖錄（1972-），男，中共潮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研究方向为市情、党建；陈驰欣（1990-），女，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员，研究方向为潮州文化；黃秀芝（1986-），女，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员，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潮州文化；林润锋（1997-），男，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蔡润东（1982-），男，中共潮州市委党校科研科科长，研究方向为党建、潮州文化；罗兰帆（1985-），女，中共潮州市委党校培训科科长，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

论走向实践，可以放在潮州文化这样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区域文化场景来解析；深入研究潮州文化，不能脱离“第二个结合”这个理论视野。

（一）源流关系：潮州文化的优秀特质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有学者认为，潮州文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在潮州地区与海外潮人聚居地的系统性表现形式，两者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潮州文化与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其本身就包含了母文化的显著价值特征、优秀文化特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让潮州文化同样具备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天然属性。在讲仁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以“孝”为先，潮州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注重家庭与亲情，注重家族观念等“孝”文化的内涵。在重民本上，潮州文化保留了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和士大夫精神鞠躬尽瘁、爱民如子的政治责任感，从韩愈、吴均等治理潮州的历代官贤身上，均得到体现。在守诚信上，“信义”在潮州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潮州人历来崇信重义且声名远播。在崇正义上，潮州文化中保留着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的精髓，祭祀的神明也大多是为民族大义与百姓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在尚和合上，潮派建筑鲜明体现着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在潮汕地区很多古村落至今都保留着很多希望能“纳气聚财”的“风水池”。在求大同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同样也是潮州文化中对于社会发展的美好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在潮州文化中，多能找到具体的实例印证，这充分说明理念上二者是源流关系，更说明潮州文化是母文化参与到“第二个结合”历史进程中的地方缩影。

（二）结合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潮州文化的演变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互相交融的过程中，潮州文化也必然经历了激荡与影响。作为

全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广东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之一，潮州这片红色土地留下了茂芝会议、“七日红”等英雄赞歌。在近代，“五四运动”不仅极大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潮州的传播，大大解放了潮州人民的思想，而且也为潮州地区的工农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潮州人更加广泛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影响与熏陶，在潮州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批如彭湃、李春涛、洪灵菲、柯柏年、陈波儿等进步青年与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身上的文化血脉与基因中也浸润着潮州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之后，不但没有丢掉之前的优秀品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之下塑造出了共同指引他们革命到底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进而引发了潮州文化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马克思主义通过影响与改造潮州无数革命仁人志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促进了潮州文化在近现代的演变、传播和创新。潮州文化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激活与改造，在守正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吸纳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形成了勇立潮头与追求理想等新的精神特质，散发出更加独特的魅力。

可以说，近代以来潮州文化的创新发展的历程就是接收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改造的过程，让今天的潮州文化从传统文化中脱胎换骨，具有更加鲜明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三）成果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潮州文化的创新发展是“第二个结合”在地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经产生，就为粤东地区改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引领与方向指导作用。

新时代以来，潮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重托、感恩奋进，锚定“打造文化强市建设标杆”目标，加快潮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的繁荣兴盛重振千年古邑历史荣光。大力实施潮州文化大传播大

发展工程，推动潮州获评“中国秀美之城”“世界美食之都”，频频亮相中央、省级主要媒体，成为了“流量高地”“网红打卡地”“文旅目的地”。

潮州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朝着“打造文化强市建设标杆”奋斗目标迈进，让潮州文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不仅充分展现了“第二个结合”的真理力量，更为潮州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四）理论反哺：潮州文化创新发展能够为拓展“第二个结合”理论空间作出贡献

潮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区域优秀传统文化一样，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方面，提供了研究样本。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潮州文化与中华文化从属关系，对潮州文化核心内容如数家珍，这表明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和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思考，充分反映了潮州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文化在作为研究对象方面发挥了作用。可以说，潮州文化与包括广府文化、泉州文化、敦煌文化在内的全国各地的优秀地域文化一起，成为凝练锻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个体样本。

另方面，丰富了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视察时分别对保护广济桥和潮州古城、加强非遗传承等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强调“要珍惜和保护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要彰显城市特色，增强文化旅游内涵，让人们受到更多教育”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丰富理论思维、拓展理论视野提供了新的源泉。

再方面，拓展了结合空间。“第二个结合”归根结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党的理论创新必然不断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也将深化拓展

并取得新的理论成果。面向未来，吸收真理力量、融入时代大潮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潮州文化仍然会以新的姿态参与到“第二个结合”的革命性锻造中来，这就为两者的深度结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事实证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支脉的潮州文化，不仅能够在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发挥独特价值，而且能够通过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新之路，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参照样板。

二、潮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近年来，潮州文化在新时代创新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传承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短板，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源、文化精神、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四个方面。

（一）在文化资源整合方面，品牌效应尚未彰显

潮州文化资源丰富，但存在零敲碎打、各自为战的情况，综合效益不够大，文化品牌叫得不响，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较欠缺。一方面，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不深，对于潮州文化的起源、发展缺少系统性、权威性的论述，内涵众说纷纭，缺乏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重磅成果。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有待加强，许多文化遗址的建设与修缮进度不如预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交叉联动不足。

（二）在精神特质弘扬方面，教育功能没有很好发挥

一是文化特质研究众多但共识不足，学界对潮州文化特质界定多样，缺乏全社会层面的普遍共识。二是文化理念创新度和时代性不足，部分潮州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心态，导致潮州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部分内容和形式与现代生活脱节，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创新。三是潮州文化的教育运用不足、重点对象不突出，在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对潮州文化的融入与传授较为浅显和零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教育

目标受众定位模糊，没有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教学策略。

（三）在转型创新发展方面，赋能经济发展存在短板

一些非遗文化缺乏生命力，濒危非遗项目生存土壤干涸，代表性传承人存在数量较少、年龄过大、青黄不接的问题。二是文化旅游陷入赔本怪圈，存在规划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住宿行业日趋饱和，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下降，文旅税收间接受到影响。三是文化产业难以升级，文化产业结构待优化，经营分散，存在“小、弱”的情况，多数企业沿袭传统管理和运作模式，管理水平低。四是文化体制改革不快，文化管理部门职责重叠、交叉、错位、模糊等问题仍然存在，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文化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程度不高，财税金融体制仍需升级。

（四）在文化宣传拓展方面，对外传播能力有待提升

一是在汕潮揭文化圈中“潮州文化”凝聚力不足，同一地域文化内部的话语权纷争，不利于潮州文化产生矩阵效应。二是在国内潮人和海外华人中以文化为纽带发挥作用不够，暂未有破局创举。三是走出去宣传潮州提升潮州文化影响力需要努力，全方位、高规格的宣传未能达到“爆点”效果，外文宣传稍显乏力，专业性和持续性不足。

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一是对“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成果学习领悟不深透，二是运用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产出文化建设成果有待转化，三是利用“潮州文化”优秀特质推动“第二个结合”纵深发展的文化自信不足。因此，潮州文化要破局突围、浴火重生，必须正视和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深化文化资源挖掘并强化品牌塑造，加强文化教育以弘扬其精神特质，推动文化创新融合赋能经济发展，并拓宽传播渠道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围绕推动潮州文化创新发展，打造彰显“第二个结合”真理力量的中华文化之窗

当前，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打造文化强国对示范窗口建设的迫切需求，让处于“两个窗口”^①前沿阵地的潮州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潮州文化根基深厚、现存载体繁多，海内外影响力较大，推动潮州文化创新发展，能为我们党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提供丰富养分和现实范例。

（一）坚持系统观念，在挖掘资源上打基础，强化潮州文化引领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只有坚持系统观念，科学分析潮州文化的文脉基因，做好文化遗产的保育活化，实现多种资源的有机整合，才能充分挖掘潮州文化发展潜力。

1. 深化实施文脉基因的探源工程。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象山文化、浮滨文化”“地方汉语方言（潮州话）”“潮州文化的海外传播”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理清潮州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明确其发展脉络、独特特质及背后的发展逻辑，确定其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位置与作用，把握共性与个性优势。

2. 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的要求，奋力做好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工作，让历史与当下相得益彰。如在非遗保育活化工作方面，必须持续开展非遗资源普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非遗代表性项目管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好非遗记录工程，筛选出适宜与工商业、旅游业相融合的非遗名录，对可创新、可转化、可推广的项目，从顶层设计上加大指导和扶持。

3.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资源整合。要突出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地方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的生动场景”，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既要展现“潮州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要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

（二）坚持自信自立，在思想教育上下功夫，增强潮州文化凝聚力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度和立党

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党的理论与工作创新的基本立足点，更是潮州文化实现高质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新时代，潮州更应秉承坚持自信自立，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潮州文化的光荣使命，在不断培育优秀城市精神特质的过程中，将潮州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

1. 以“潮州文化”为载体，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阐释工作。组织高校、党校教学科研团队将潮州文化研究融入“第二个结合”的研究范畴中，通过开展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和创新形式的宣讲工作，从潮州文化的实践层面进一步论证、宣传“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性、真理性、指导性。用潮州在文化溯源、价值提炼、非遗保护、文化教育、文化产业等工作实践中取得的系列丰硕成果形成系列课程、研究成果、文化展览、文艺作品、旅游+研学路线等，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伟力，为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提供助力。

2. 运用马列原理激活潮州文化，凝聚粤东地区奋进力量。坚持以文化人，在深化和进一步推动主旋律弘扬工程、潮州文化大发展工程、潮州文化大传播工程、高品质文化供给工程、文明质量提升工程的有效实施过程中，在系列“创文”“创卫”的具体工作中，通过创作推出一批彰显中国精神、潮州特色的文艺精品，推动文化场所提质增效，规划建设新文化地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将这些优秀的文化特质融入到市民的血脉中。

3.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改造文化理念，争取潮州文化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的“包容性”，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世界格局和开放胸怀的突出特性。现代的潮州，地处原潮州府的核心地带，拥有历代潮州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更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自信自立，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自觉扛起新时代弘扬潮州文化，推动潮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旗，实现与原潮州府所辖地各现其他兄弟城市在推动传统文化发展上的求同存异、止纷息争，促成各类优质资源的有机整合，推动各城市树立“大潮州”概念，形成发展合力。

（三）坚持守正创新，在破局突围上探新路，激发潮州文化生命力

坚持守正创新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党的理论与工作创新的主要着力点。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探索潮州文化的发展新路径。

1. 以观念创新谋划文化建设转型。树立系统协调的文化发展观念。将潮州文化视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将其融入到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技术细节中，将潮州文化作为“何以潮州”的IP；注重其与各领域的协调发展，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树立全民共建共享的文化发展观念。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转变政府主导的文化发展模式，鼓励企业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创新文化运营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2. 以技术创新实现非遗保护转型。非遗保护应积极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焕发新活力，借力技术创新突破非遗传承的时空局限，提升非遗传承的效率与效果，从根本上解决因传承人流失而导致的传承困境；借力技术创新重塑非遗的传播生态，营造出全民关注非遗、积极传播非遗的良好社会氛围，有效扭转非遗受众群体缩小的不利局面；借力技术创新推动非遗的创新发展与市场接轨，提升非遗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确保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

3. 以业态创新实现文化经济转型。在市场开拓方面，要坚持线上线下相融合和多元协同机制，通过塑造品牌和产品创新，增加文化附加值。要立足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推动不同产业间的跨界合作，拓展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传播渠道与受众范围。在对象开拓方面，要抓住不同年龄层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精准定位，开展个性化服务。要在内容上打好“怀旧牌”，在开发上打好“个性牌”，在营销上打好“福利牌”，在服务上打好“情感牌”，加快推动文化消费升级。

（四）坚持胸怀天下，在拓展空间上做文章，

提升潮州文化影响力

坚持胸怀天下是我们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必然要求。我们以世界眼光来客观分析潮州文化的重要作用，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视角来谋划潮州文化的发展定位，在拓展空间上做好文章，不断提升潮州文化影响力。

一是要以文化宣传扩大传播面。文化宣传应超越文化群体界限，促进传播与交流。地域传播上，秉持国内国际双向联动，与全球文化机构、高校合作，以多元形式展示潮州文化，融入国际交流网络。受众群体上，聚焦青少年，将潮州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利用新兴网络平台吸引年轻一代。互动传播上，结合商贸活动，塑造潮州特色营商环境，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是要以文化纽带做活“侨”的文章。新一代侨胞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侨二代”在跨文化环境中成长，需关注其文化认同。构建多层次、沉浸式的潮州文化体验体系，解码并重构潮州美食、音乐等特色元素，打造国际文化品牌活动。运用前沿技术构建情境化、互动式侨文化展馆，立体呈现侨乡文化。挖掘“侨二代”典型人物，讲好侨乡故事，吸引他们深入了解与传播。

三是要推动潮州文化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故事。潮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拥有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要深度挖掘潮州木雕、潮绣、潮州菜等文化符号，展现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用好国际平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潮州文化走向世界，助力中国叙事体系构建。借助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主流媒体合作，提高中国声音的全球传播力。

注释：

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既是展示我国改革开发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中共潮州市潮安区委，潮安区人民政府编著. 潮派建筑与道德文化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 [3] 黄挺. 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4] 黄挺. 潮汕文化源流 [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11.
- [5] 苏仕日，达海军. 潮州密码 [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24.3.
- [6] 陈平原，林伦伦，黄挺. 潮汕文化三人谈 [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
- [7] 贾玉明.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六个必须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6(06).
- [8] 杨佳欣，陈燕. “第二个结合”新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路径探析 [J]. 北京文化创意，2023(S2).
- [9]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7(04).
- [10] 张少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第二个结合”：发生逻辑、实践历程和深化路径 [J]. 理论研究，2023(06).

【责任编辑：柯翌嘉】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探究

陈英杰

(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河源 517000)

摘要: 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生成前提、外在表征及内在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 为科学解剖及探究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提供了理论“手术刀”。在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样态及劳动类型发生了巨大转变,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外在肌层新生出了一些“积极”变化, 如部分生产资料“复归”数字劳动者、雇佣松动下数字劳动者类本质浮现、劳资关系由零和对抗转向形式上共赢等。但回归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批判要义可以透视发现, 数字资本增值的内在逻辑未曾改变, 生产资料私有制依旧存在, 只不过在数字技术魅惑的遮蔽下, 数字资本家以更加隐秘的手段垄断操控核心数字生产资料, 强化对于数字劳动者的剥削规训。

关键词: 数字经济; 资本主义; 劳资关系; 数字劳动

中图分类号: F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5)03-0107-06

恩格斯明确指出,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79}。只有紧紧抓住劳资关系这一“轴心”才能撕裂资本逻辑幻化的华丽外衣, 透视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 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展开深入研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资本形态由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步演变至现阶段的数字资本, 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此过程中深刻改变了日常生活世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笔下的广义数字劳动范式成为当今至关重要的劳动类型,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外在肌层产生了一些“缓和”的新生变化, 部分西方学者开始鼓吹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过时论”“无用论”, 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拟赛博空间以新面目悄然滋长。只有回归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轨道, 科学运用这把理论“手术刀”深入解剖数字经济时代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变”与“不变”的内在肌理, 才是真正回应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之辩的答案出处, 也是加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一、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之基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演变的重要工具, 拥有着跨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但其本质仍未跳出马克思分析批判视域, 只有植根马克思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之基, 才能廓清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迷思。由此, 必须把握马克思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批判理论的以下三个要义。

(一) 劳资关系生成前提——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

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耦合的基点。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必须满足“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2]821}, 即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劳动者成为“自由的工人”与资本家建立雇佣关系的前提条件所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资本家借助圈地等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手段逐步完成了劳动者与自身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 大批自由劳动者为了生存只

收稿日期: 2025-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研究”(20FZSB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英杰, 女, 硕士研究生, 河源市委党校(河源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能将自身劳动力作为廉价商品出卖，而资本家则需要活劳动工具实现手中资本价值总额的增值，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劳资关系的耦合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下的必然结果。

生产资料的分离必然导致和强化劳资地位的不平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助产婆”的帮助下，催生出了劳资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3]生产资料的分离就意味着构建起的雇佣关系中劳资双方不可能势均力敌，“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2][3]}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更是加速形成了“资强劳弱”力量对比格局，少数人依靠原始资本积累摇身一变成资本的代言人，而多数劳动者为了生存繁衍只能出售劳动力与资本家建立雇佣关系，看似公平的等价交易实则是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后的无奈抉择，在实际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只能通过让渡劳动力使用权以获取微薄工资。显然易见，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从确立起就决定了两者不平等的地位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归属支配问题起着决定作用，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强势围猎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则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

（二）劳资关系外在表征——对立中存在张力

对立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文明与野蛮的“双面性”，不可置否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增值本能决定了其对于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对等关系之中。^[4]资本家借助过去“死劳动”的物质形态操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让“活劳动”异化成为服务“死劳动”增值的永动机，并企图借助“物”的外在表象遮蔽雇佣劳动中存在的这种根本性颠倒的权力关系，虽然资本家也在调节劳资矛盾，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由此，阶级矛盾只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愈演愈烈。

资本主义劳资对立关系存在内在张力，特定时空下得到动态缓和。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呈现出多样化特

点。首先，工人阶级联合斗争影响劳资关系变化。在传统产业资本发展初期，工人阶级尚未觉醒自为意识，只能被动接受资本宰制。但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工人阶级团结联合起来开展罢工游行等运动，而且随着资本规模愈大，劳资冲突爆发后资本家所遭受损失也就越大，不得不向工人做出一定妥协。其次，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影响劳资关系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为了“千年王国”的延续，不得不采取外在手段来遏制野蛮剥削的过火现象。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劳资关系变化。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危机混乱，在经济向好情况下，劳动力商品供不应求，劳动者生存条件得到改善，但在经济萧条时期，资本收缩削减工人，劳动者生存条件随之恶化。

（三）劳资关系内在本质——劳动从属于资本

在资本那里天然拥有对于劳动的支配权力，劳动从属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双重规定性，既是用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工具、生活资料等物质资料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2][27]}，通过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来交换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增大已有的积蓄劳动，并且资本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拥有对于活劳动及其劳动产品的绝对支配权力。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宝贵的再生性力量出售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工资其实质是“雇佣工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3][714]}。特别是工资具有不可再生性，劳动者就必须不断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维系工资交换，而资本就在不断交换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壮大自身，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依附并隶属于资本。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从“形式从属”逐渐转向“实际从属”。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动者可以凭借手工业技艺和资本家有所谈判，但其雇佣劳动过程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已经开始作为异己的存在统治劳动者，“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就越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5][372]}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广泛应用机器，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以机器为主导的大工业将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过程分工肢解为机械的流水线操作，“机器则取

代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6][185]}，劳动者的独立性生产被规模化协同生产所取代，沦落成为大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从“利用机器”的主体地位跌落成为“服务机器”的运转手段，这也表明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失去了议价能力，对于资本家的实际依附进一步深化增强。

二、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外肌新变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样态及劳动类型都发生巨大转变，资本主义在维持自身生命机制过程中加速新陈代谢，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新细胞的作用下加快了外在肌层旧角质层地脱落，不可置否表面上新生出了一些“积极”变化。

（一）部分生产资料“复归”数字劳动者

在数字经济时代，部分生产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复归”数字劳动者手中，数字资本家没有完全排他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首先，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数据原料所有权属性模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逐渐成为数字劳动生产过程的特殊原料，但数据具有虚拟性，主要来源自数字产消者使用互联网服务时产生的活动足迹，但这些数据原料所有权在现有法律体系界定中却比较模糊，数字资本家诱导数字产消者签订不合理的协议进行商业化盈利，不过数字产消者作为数据原料生产者依旧可以合法使用这些数据资源。其次，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平台资料面向劳动者开放共享。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既是介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充当劳动者活动传导体的物或者物的综合体，又包含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7][21]}数字平台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下生产过程的重要劳动资料，一方面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在互联网企业雇佣下的数字劳动者提炼加工数据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成为数据原料生产的重要场所。在网络效应的驱动下，数字资本家不再排他性占有平台，而是使用各种策略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平台，比如成为某平台用户后，就可以免费享有绝大部分权限及资源。最后，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与劳动者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

成为劳动者的“活动的器官”，延长了劳动者的“自然的肢体”^{[7][209]}。在日常生活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拥有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无形中成为一名数字产消者进行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化劳动工具并非传统雇佣劳动下资本家私人的生产资料，而是归属于数字产消者个人所有。

（二）雇佣松动下数字劳动者类本质浮现

不同于工业经济下福特制标准流水化的刚性积累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弹性生产时空下的资本积累制度一跃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方式，资本主义劳资雇佣关系出现了“松动”现象，数字劳动者的类本质有所浮现。

首先，数字信息技术突破生产劳动的时空场域限制。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重塑了生产劳动面貌，远程办公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弹性工作制度成为常态，数字生产劳动突破超越了以工厂等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家庭等各种社会场景都可以进行劳动，数字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劳动地点等方面拥有了一定自主选择权。其次，数字劳动生产过程实现了“无资本家在场”的状态。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泛雇佣关系、去劳动关系化”的劳资关系模式成为数字经济下的重要范式，一方面游走于数字平台的数字产消者没有与资本家签订明确雇佣合同，虽然无偿利用闲暇时间生产数据原料，却没有固定的劳动指标约束，在劳动过程不会面临到来自资本家强制的外在监督。另一方面，外卖员、跑腿、托客等自我雇佣式的数字零工处于一种非标准化的松散雇佣状态，数字资本家借助数字平台向数字劳动者发送指令，两者在虚拟赛博空间中完成劳资交互性互动，减少了“面对面”下的直接摩擦，数字劳动者也可以随时更换平台以调节身心压力。最后，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彰显。在数字经济图景下，资本增值逻辑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向休闲领域扩张蔓延，休闲娱乐与劳动工作的界限变得混沌不明，特别是“玩劳动”的出现使得劳动具有娱乐休闲属性，数字劳动者可以依据个人偏好自主选择劳动时间和劳动内容，大多时候在形式上是主动参与并享受劳动过程，而非像以往那样像“逃避瘟疫”一般抗拒劳动。

（三）劳资关系对抗缓和并转向形式共赢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尖锐对立性有所弱化，从面对“巨大他者”强制剥削的激烈对抗到面对“单个自我”柔性剥削的互惠共处，劳资关系也从零和博弈转向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共赢。

首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尖锐对立性在当代社会弱化。在传统工业经济下，社会阶级结构趋向简单化，除了少数大资产者以外，绝大多数人群呈现无产阶级化，两者摩擦对抗尖锐。但随着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趋于橄榄型，使得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矛盾出现了间接化、隐蔽化趋势。其次，数字劳动者成为“工人——企业主”的复合主体。正如韩炳哲认为在现代功绩社会下，资本家变得更加精明狡诈，将工人塑造成为“自我孤立、自我斗争、甘愿自我剥削”的企业主。^[67]在互联网企业中，高级技术工程师起到关键作用，掌握着数字机器运转的核心代码与技术，数字资本家便以高薪、股份等形式套牢这部分数字劳动者，也使得高级技术工程师转变成为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小企业主，自觉自愿地剥削自我。最后，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从零和博弈转向一定程度的形式共赢。秉持经济理性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在传统产业资本时期陷入囚徒困境，劳资关系处于零和博弈的对抗之中。但随着两大阶级的矛盾对立在当代资本主义下有所缓和，两者在某些方面实现合作共赢。一方面，数字产消者依靠数字资本家提供的数字平台更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数字资本家则获取了所需的数据原料。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为闲置人力资源搭建了拥有海量信息的数字平台，供需双方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劳动任务快速匹配，使得就业困难的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再度商品化获得劳动收益。

三、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内辑不变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外在肌层虽然新生出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资本增值的扩张本性未曾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依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具有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只不过在数字技术赋魅下，数字资本以更加

隐秘手段遮蔽对于劳动者的规训与剥削。

（一）数字资本垄断操控核心数字生产资料

部分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复归”数字劳动者并不意味着劳资耦合的基点在质的意义上完全消融，复归于数字劳动者的部分生产资料是数字资本家处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主动让渡的非核心生产资料，而核心数字生产资料依旧牢牢把控在数字资本家手中。

首先，数字资本掌控着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典型代表，并且动态不完全竞争激烈状态下引发的巨大规模效应使得少数寡头平台趋向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垄断与殖民，数字资本织造了一张平台化社会下人们不可抗拒的数字大网，剥削范围及数量空前广泛，而数字资本家作为平台所有者，利用雇佣数字劳动者挖掘提炼平台云端上传的海量数据，并占有这些数字劳动产品进行盈利，数字劳动者依旧处于自身劳动产品的异化支配之下。其次，数字资本垄断着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核心软件的所有权。劳动者所拥有的手机等劳动资料只是承载数字机器的外在躯壳，而智能算法下的软件程序才是支撑数字机器运转的“灵魂”要件，这些核心软件程序则是数字资本家的合法私有物，一旦核心软件程序停止运行，这些智能设备就变成毫无意义的“废铜烂铁”。最后，数字资本强化了对于数字劳动者的实际吸纳。数字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普照的光”，其“特殊的以太”形成了对于数字劳动者的充分吸纳和深度剥削。^[7]雇佣数字劳动者虽然掌握一定数字技能，但是很难实现数字技能的快速变现与价值增值，对于数字资本力量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而数字产消者生产劳动是无酬的，劳动产品又被无偿占有，在线时间越长，剥削也就越深，数字平台特有的社会胁迫性则使数字产消者无法轻易离开平台，不得不接受来自数字资本的盘削。

（二）数字技术赋魅下强化数字劳动者剥削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功能，但在实际应用中又往往被资本家所招募利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数字资本隐蔽剥削数字劳动者的有力工具。

首先，算法内嵌数字资本的主观增值意图。算

法本质是一种人造技术产物，在数字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会在多重维度下不断更新对于数字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更为隐蔽的剥削手段。算法可以量身打造数字景观，使得数字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柔性诱导中逐渐式微，无形中臣服于算法逻辑建构下的景观堆积世界，物化成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且算法具有不透明性和模糊性，^[1]使得数字劳动者在生产劳动“黑箱”中处于被动状态，实质上强化了劳资双方权力的不对称性。其次，数字平台成为流动“生产车间”，借以虚假自由之名进行精巧剥削。一方面，数字平台雇佣下的数字劳动者在心理层面感觉到了劳动自主，实际上却深陷“自由茧房”幻境之中，平台显示的劳动选择是符合资本预期的算法结果，数字劳动者处于信息劣势之中。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借助手机等智能设备中实现生产劳动的“无所不在”，数字劳动者要严格遵循平台规则，在泰勒主义和绩效激励双重规训控制下往往陷入生产过劳困境之中。最后，虚拟赛博空间棱镜投射下的数字劳动者孪生体成为可量化的数据原料，在全景敞视监狱中呈现数字化赤裸状态。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化技术在现实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映射出虚拟赛博空间，同时借助数字劳动者在互联网留下的各种数据在虚拟赛博空间投射出数字孪生体以供深度剥削，数字孪生体成为数据原料移动供应库。而且，虚拟赛博空间在数字资本的隐秘操控下化身为全景敞视监狱，通过数字化中央瞭望塔全方位监控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者呈现出数字化赤裸状态。

（三）数字劳资双方不对等下矛盾暗自涌流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关系处于不断调节之中，虽然在某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劳动者的妥协，但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劳资双方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依旧处于利益对立状态，两者的矛盾斗争暗自涌流。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新形式下的劳资在生存状态的两极分化。数字技能水平使得数字劳动群体内部逐渐分化，技术性强的雇佣数字劳动者居于顶端地位，而外卖员等数字零工群体从事着低技能的工作，成为底层主力军，并呈现出极强的不稳定性。同时，这种不稳定的劳资关系将既有劳资矛盾巧妙转嫁给数字平台，数字平台成为传达资本意

志和控制劳动者的“中间人”，而数字零工只能在平台建构的规则框架中不断强化劳动同意，异化程度加深。其次，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新形式下的劳资在收入上的两极分化。数字资本家和数字劳动者在劳动收益分配格局中的鸿沟扩大，呈现出马太效应。技术性数字劳动人员的薪资福利虽然较高，但其所创造的利润价值与劳动收益远远不成正比，数字虚拟产品可以在无限复制中重复获利。数字零工的“性价比”则在算法的宰制下提升至极致，数字资本家可以从计件劳动制中不断抽取中介费，以廉价方式获取“产业后备军”。数量庞大的数字产消者则被排除在传统雇佣体系之外，无须为其生产劳动支付报酬，数字资本家成为最大的利润赢家。最后，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新形式下的劳资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诸多传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将大量资金注入互联网企业之中，而数字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融入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处于原子化的孤岛状态。在“人机共存”的智能化时代，资本逻辑的介入使得数字产消者无法真正自主决定信息圈，囿于资本堆砌的数字乐园之中。同时，承接众包任务的数字劳动者也是分散各地独立完成任务，无法构建起劳动者集体身份认同意识，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对抗数字资本的霸权宰制，劳资关系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数字资本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重要生产要素，数字劳动职业则成为容纳大众就业的新型“蓄水池”，科学认识和把握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是有利于依法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有序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数字资本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作用，续写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特点与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新篇章，早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 张恂.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样态及本质透视——基于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框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01):76–82.
- [4] 钱智勇.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的双面性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02):98–10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7] 李弦.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03):14–23.
- [8] 詹纳吉·浦若迪尼克, 陈文旭. 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逻辑 [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06):125–136.

【责任编辑：余伟】